# 备注

《盐铁论》我最初是在看《中国是部金融史》，霍光和桑弘羊的争权之事时所看到的。

《中国是部金融史》对于《盐铁论》的评价原文：

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《轮台罪已诏》之后八年，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，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“盐铁论战”。为记录这场论战，桓宽写下《盐铁论》全书共六十篇，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，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《就业、货币与利息通论》。

# 前言

汉昭帝始元六年(前81)，汉朝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接受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，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。会上以文学、贤良为一方，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，就是否罢盐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汉宣帝时期，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进行整理，形成《盐铁论》这部名著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对盐铁会议以及《盐铁论》成书过程有简要的记载。《汉书·昭帝纪》载：“六年……二月，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、文学民所疾苦。议罢盐铁榷酤。”同年又载：“秋七月，罢榷酤官。”《汉书·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》论赞说：“所谓盐铁议者，起始元中，征文学、贤良问以治乱，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，务本抑末，毋与天下争利，然后教化可兴。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，制四夷，国家大业，不可废也。当时相诘难，颇有其议文。至宣帝时，汝南桓宽次公，治《公羊春秋》，举为郎，至庐江太守丞，博通善属文，推衍盐铁之议，增广条目，极其论难，著数万言，亦欲以究治乱，成一家之法焉。”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桓宽之所以将这本书取名为《盐铁论》，是因为朝廷仅仅接受文学、贤良的部分建议而废除酒类专卖，仍然继续保留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，“故宽作是书，惟以盐铁为名，盖惜其义不尽行也”。

这次盐铁会议是在汉武帝长期内外经营之后召开的。汉武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生涯中，充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，内兴功利，外伐四夷。这些政治军事大手笔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。为了弥补空虚的国库，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：元狩四年（前119），汉武帝采纳东郭咸阳、孔仅的建议，实施盐铁官营。同年汉武帝下诏初算缗钱，对商人征收财产税。元狩五年（前118），朝廷下令铸造五铢钱。元鼎元年（前115），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，试行均输、平准。所谓均输，是在郡国设置均输官，负责收取各地民众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品，再拿到附近价高的地方出售，将钱交给中央。所谓平准，是中央设置平准官，用价低买进、价高卖出的方法平抑物价。元封元年（前110），在全国推行均输、平准之法。元鼎三年（前113），汉武帝下令告缗，罚没偷漏税商人的财产。天汉三年（前98），汉朝推行酒榷令，国家实行酒类专卖。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，一方面有效地充实了汉家国库，有力地支持了汉武帝的内外经营，另一方面也重创了当时的工商业者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：“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，民偷甘食好衣，不事畜藏之产业，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，用益饶矣。”汉武帝晚年对自己的内外经营颇有醒悟，征和四年（前89），汉武帝下《轮台诏》，表达了追悔之意：“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修马复令，以补缺，毋乏武备而已。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，与计对……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伤害百姓、糜费天下者，悉罢之。”这个诏书精神，被汉昭帝时期执政大臣霍光忠实地执行，《汉书·昭帝纪》赞曰：“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（霍）光知时务之要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至始元、元凤之间，匈奴和亲，百姓充实。举贤良、文学，议盐铁而罢榷酤，尊号曰‘昭’，不亦宜乎！”霍光本人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，但他的基本思想倾向是明确的。

是否罢盐铁酒榷均输平准，是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。文学、贤良坚决主张罢盐铁官营，他们的主要理由是：（1）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、均输、平准、算缗、告缗、铸五铢钱等经济举措与民争利，朝廷应该还利于民；（2）官府制作的铁器规格统一，质次价高，不适农用，铁官经常不在盐铁商店上班，民众不能及时买到铁器，贻误农时，有些民众不得不用木器耕种，吃无盐的淡食，器用不便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，造成田地荒芜，民众生活贫困；（3）均输、平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，产生了官吏强征贱买、因垄断而导致物价飞涨、奸商囤积居奇等弊端，结果是贫者愈贫，富者愈富，并未带来朝廷所期待的均衡劳逸、方便贡输的好处；（4）盐铁官营支持了汉家外伐四夷的征战，而长期战争影响了民众的基本生活，内地民众苦于兵役和徭役，边境民众则苦于戍守防御，实在看不到盐铁官营给民众带来什么福利；（5）礼义是立国的根基，而权势财利是为政的残贼，不推崇仁义就无法教化民众，不大力务农就无法使国家富强。

桑弘羊等人坚持盐铁官营的理由是：（1）盐铁官营是朝廷为解决征讨匈奴费用而采取的经济政策，如果废除，就会导致边境军费不足，不利于完成汉武帝未竟的外伐四夷大业；（2）盐铁私营为诸侯反叛提供了经济基础，促进了豪强势力膨胀和邪恶势力聚集，造成不法奸商垄断市场，形成“一家害百家”的恶果，因此不能放任盐铁私营；（3）官府资金充足，器具完备，铁器规格和价格统一，盐铁官营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私人都有利；（4）中国古代有“名山大泽不以封”的传统，汉家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完全符合古代的传统做法；（5）实施均输、平准，是为了“平万物而便百姓”，是出于富国足民的目的；（6）战国秦汉之际儒生方士用五行配五方，这说明均衡有无、流通万物是天地之道；（7）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对内极大地开辟了山林川泽的财利，使各种货物越来越丰富，朝廷经费充足，民众生活不再困乏，农业根本和工商末业共同获利，上上下下都很富足，对外则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外国的资财，削弱敌国的经济实力。

由于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是由外伐四夷特别是征讨匈奴所引发，因此在后武帝时代，汉家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制定对待匈奴的政策，也是双方辩论的一个重要论题。桑弘羊指出，中国在东、西、南三方边陲已经消除边患，只有北方匈奴尚未归附，因此汉家要完成武帝的未竟事业，猛追穷寇，继续征讨匈奴，以短痛换取汉家的长治久安，不能让伐胡事业半途而废。他认为中国天子是全天下人的父母，而匈奴却没有向汉天子臣服，这是汉家所不能容忍的。如果不从事征伐和军备，就难以平息暴力侵害，将黎民百姓推向敌人。文学、贤良则痛陈连年征伐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，认为连年伐胡导致士死民疲，使人民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，造成老母在家中垂泣、征人在前线忿恨、怨女在闺中叹息的后果，希望汉家能够休战，与民休息。文学、贤良指出，匈奴住在沙漠之中，过着茹毛饮血的野兽般生活，中国没有必要用礼义去要求匈奴，尤其没有必要牺牲无数将士的生命，去占领匈奴所居的不毛之地。文学、贤良高举孔子修文德以来远的旗帜，主张朝廷放弃武力，运用文教德化的方法来感化远方异族，与匈奴和亲，用道德感化的力量使匈奴主动前来归附汉家。

除了辩论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、均输、平准、算缗、告缗、铸五铢钱等经济政策以及伐胡论题之外，与会双方还就一系列论题展开论战，诸如对商鞅、邹衍、李斯、晁错、颜异、狄山、主父偃等人的评价，如何看待儒学价值、贫富原因、孝养父母、汉代奢侈风气、官员贪腐、真假儒生、国家安全等问题，天子诸侯的园池是存是废，当世要务是什么，要不要开拓边疆，要不要遵守先王之道，什么样的人才是贤人，究竟是以德治国还是以刑治国，朝廷应该坚持王道还是霸道，导致水旱自然灾害的原因是什么，等等。在所有这些论题上，辩论双方都针锋相对，提出截然不同的思想主张。

如何评价这两派完全不同的学术观点？从汉代至今，不少学者都采取一边倒的立场，他们或者站在文学、贤良一边痛斥桑弘羊，或者支持桑弘羊而嘲笑文学、贤良的迂执。本书认为，评价盐铁会议的双方观点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不能持单一的尺度进行衡量，而应该从多角度多层面予以考察。

从学术渊源来看，文学、贤良都是当时的儒生经师，他们熟读五经，思想完全来自先秦以来儒家阐述的经学；而桑弘羊虽然也引用儒家经典，但他更多地杂取法家、纵横家、兵家、阴阳家等百家之说。汉代被学者称为经学昌明时代，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之后，汉家以儒家阐述的五经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。我们从《盐铁论》中看到，身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以及丞相史、御史居然会在朝廷学术会议之上抨击儒学，嘲笑孔子，贬低王道，宣扬百家思想，而桑弘羊这位杂取百家之说的朝廷重臣，居然会深得汉武帝的信任。这说明即使是在汉武帝尊儒之后，汉家官方学术思想并不是一刀切，君主往往会出于朝政的需要而进行调整，台面上所说和台下所行并非完全一致。或许汉宣帝所说的“汉家霸王道杂之”更符合汉家官方思想的实际。

从现实政治需求来看，汉家实施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是由于国家财政紧张，国家财政紧张的原因是汉家内兴功利外伐四夷，特别是征讨匈奴。汉武帝外伐四夷，既有解除边境威胁的现实需要，也有扩张欲望的驱使。汉武帝即位初期，汉家周边存在西南夷、南越、闽越、东越、朝鲜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政权，这些蛮夷邦国虽然对汉家边境会有一些骚扰，但总体上来说他们势力分散，不构成对汉家的军事威胁。但按照中国传统的思想学说，四封之内，莫非王土，食土之毛，莫非王臣。凡是日月所照之处，都应该是中国天子的臣民。就是根据这一思想，汉武帝调兵遣将，将东、西、南方向的蛮夷邦国直接纳入中国版图。北方的匈奴属于另一种情形，他们在汉初崛起，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，构成汉家长期以来最大的外在威胁。讨伐匈奴并非穷兵黩武，而是为了保卫中国边境的需要。对于像匈奴这样不懂礼义的少数民族，运用所谓修文德以来远的方式来诱使他们归附，在汉武帝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，只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它们打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汉武帝讨伐匈奴，有他的正义性与合理性。而要打仗，就不能没有钱。汉家国库的钱用光了，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，汉家采取了官营盐铁、置酒榷、均输、平准、算缗、告缗、铸五铢钱等一系列经济政策，这些举措有效地充实了汉家国库，保证了战争所需的费用。在汉武帝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，桑弘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应该说他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功的人物。文学、贤良不加区别地一味否定汉武帝外伐四夷，显然是不适合的。

从形势变化的角度来看，西汉武、昭之际形势变化甚大。西汉前期，汉家军事实力不及匈奴，因此对匈奴采取委曲求全的和亲政策，连匈奴单于写信侮辱吕太后，汉家都被迫强忍了。汉武帝即位之后，凭借文景时期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，发动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征讨匈奴的战役，基本奠定了汉胜匈奴败的战略格局。但是，长期的对外征战，极大地损伤了汉家自身的元气，到汉武帝末年，已经达到“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”的程度。连汉武帝本人晚年也对连年征伐产生深刻的反省。到了汉昭帝时期，汉家迫切的政治需求是与民休息，医治长期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。此时匈奴虽然未能向汉家臣服，但已经实力大损，不再构成汉家的军事威胁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汉家继续发动伐胡战争，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。如果说在当年匈奴威胁汉家形势下，桑弘羊此前支持汉武帝伐胡，是正确的举动，那么在汉家虚耗、匈奴不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，桑弘羊继续倡导伐胡，这就是非常错误的了。好在当时汉家主政的霍光深谙形势变化，采取与民休息政策，才使汉家逐渐恢复元气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学、贤良在昭帝时期主张罢盐铁、停止伐胡，有着充分的理由。

从文学、贤良的言论来看，他们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。大约从孔子开始，中国知识分子即以捍卫王道文化传统为己任，他们认为，治国的正确思想不在统治者手中，而在自己的手里，因此他们站在王道理论高度，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，力求以王道文化传统来矫正现实政治的弊端。这是孔子树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。《盐铁论》中的文学、贤良所继承的就是这一优良传统，他们要用理想主义光辉来照亮现实，用王道文化传统批判现实政治。他们诵法先王，推崇教化，强调农本，鄙弃末利，伸张王道，贬黜霸功，“辩难侃侃，无少假借，不降其志，不馁其气”（《张之象刻本〈盐铁论〉自序》）。虽然他们或有迂腐的因素，但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。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特别需要强调的是，有不少文学、贤良来自民间，他们亲眼目睹了盐铁官营、讨伐匈奴等举措给底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，而这些恰恰是身居庙堂之上的桑弘羊等人了解甚少的。

在盐铁会议上，辩论双方都表现出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的良好风范。文学、贤良面对丞相、御史大夫这些朝廷重臣，不是察言观色，不是见风使舵，没有为现实政治作缘饰，也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，而是仗义执言，指陈弊政，不假辞色，痛快淋漓，他们身上保留了战国处士议政的遗风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气节和风骨。当然，汉家允许士人议政，最高统治者汉昭帝和霍光给文学、贤良以有限的支持，也是文学、贤良敢于放言畅论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桑弘羊等人虽然位高权重，但他们在盐铁会议上并不占上风。值得注意的是丞相田千秋、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炙手可热的权贵虽然被文学、贤良痛批，但他们并没有惩罚这批文人，也没有用权势钳制文学、贤良的言论，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去和他们讲道理，在面对批评时也只是“默然”或“怫然”而已。文学、贤良激烈批评朝政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类似于秦王朝焚书坑儒的灭顶之灾，反而受到朝廷“列大夫”的封爵。

《盐铁论》作者桓宽的思想立场，完全站在文学、贤良一边。《盐铁论》某些篇章的名称完全是从文学、贤良的思想立场拟定的，例如，《力耕》是坚持农业根本而反对朝廷发展官营工商业，《非鞅》是对商鞅变法的批判，《刺权》是对权贵的讥刺，《刺复》是对大夫言论的讥刺回复，《刺议》是对丞相史之议的讽刺，等等。书中不时出现对大夫、丞相史、御史的负面描写，例如，“大夫不说，作色，不应也”（《相刺》），“丞相史默然不对”（《刺议》），“大夫视文学，悒悒不言也”（《国疾》），“大夫勃然作色，默而不应”（《救匮》），“大夫默然不对”（《备胡》），“公卿愀然，寂若无人”（《取下》），“大夫俯仰未应对”（《刑德》），“御史默然不对”（《诏圣》），“大夫抚然内惭，四据而不言。当此之时，顺风承意之士如编，口张而不歙，舌举而不下，暗然而怀重负而见责”（《大论》）。这些文字显然是将桑弘羊等人视为反面角色。在全书最后的《杂论》中，桓宽假借“客曰”，热烈赞扬文学、贤良“智者赞其虑，仁者明其施，勇者见其断，辩者陈其辞”的风采，表彰他们“言王道，矫当世，复诸正，务在乎反本”的卓越精神，称颂他们“奋由路之意，推史鱼之节，发愤懑，刺讥公卿，介然直而不挠，可谓不畏强御矣”。而对桑弘羊，桓宽则批评他“摄卿相之位，不引准绳，以道化下，放于利末，不师始古”，“处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果陨其性，以及厥宗”，几乎是用审判的口吻。对于圆滑世故、明哲保身的当朝丞相田千秋，桓宽借用孔子的“彼哉！彼哉”，说明其人实在不足称道。而对于“阿意苟合，以说其上”的丞相史和御史，桓宽直斥他们是“斗筲之人，道谀之徒”，认为他们根本不值一谈。

《盐铁论》的行文方式，用王充《论衡·案书》的说法，就是“两刃相割，利害乃知；二论相订，是非乃见”，将论辩双方观点列举出来，从对话中自然见出是非。《盐铁论》文字受到当时刚刚萌芽的骈偶文风的影响，不少句子需要从骈句互文见义的角度来理解。其文章风格既不像贾谊、太史公文章那样充满情感和气势，也不像汉代奏疏文章那样醇厚遒劲，而是寓讽激于沉壮之中，体现出独特的散文风格。

《盐铁论》文字衍脱讹误之处甚多，经过卢文弨、张敦仁、洪颐煊、孙诒让、俞樾、王先谦、黄侃、陈遵默、杨树达、郭沫若、王利器、徐复等前贤时修的校勘整理，虽然基本通顺可读，但不能确保这些校勘删改百分之百正确。本书文字以王利器《盐铁论校注》（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）为底本，参校清张敦仁覆刻涂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及其他版本。注译过程中对前贤时修的研究成果多有吸取，对王利器《盐铁论校注》一书借鉴尤多，凡此都尽量随文注明。由于个人学力不够，虽然力求准确地进行注译，但本书仍可能存在诸多不尽人意处，在此盼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陈桐生

2014年12月26日

# 卷一

## 本议第一

本篇题为“本议”，记载盐铁会议所讨论的基本议题——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和均输、平准政策，属于全书纲领性的篇章。文学认为，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、均输、平准等经济举措与民争利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，希望朝廷废除。大夫指出，盐铁官营是朝廷为解决征讨匈奴费用而采取的经济政策，废除会导致边境军费不足。而实施均输、平准，则是为了“平万物而便百姓”。文学反驳，认为朝廷应该运用文教和德化来感化远方异族，不能诉诸武力。朝廷的均输平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，产生了官吏强征贱买、因垄断而导致物价飞涨、奸商囤积居奇等弊端，并未带来均衡劳逸、方便贡输的好处。

汉昭帝始元六年，皇帝命丞相田千秋、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朝廷所察举的贤良、文学进行讨论，询问民间疾苦。

文学说：“我私下听说治民的方法，在于防堵骄奢淫逸的源头，拓广道德的端绪，抑制工商末利，开辟仁义之途，不要以利益示民，这样道德教化才可以兴盛，风俗才可以移易。如今各郡和诸侯国都有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和均输官署，与百姓争利益，会破坏百姓敦朴忠厚的自然天性，形成贪婪卑鄙的风气。所以百姓从事农业根本的人少，追逐工商末利的人多。形式繁华就会导致内在本质衰败，逐利风气盛行就会使农业根本受到损害。工商末利得到加强就会带来民风奢侈，农业得到加强就会使民风变得诚实。民风诚实就会财用丰足，民风奢侈就会产生饥寒。希望废除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和均输官署，这是推进农业根本、抑退工商末利的方法，对于推广发展农业，是适当的。”

大夫说：“匈奴背叛汉家，屡次侵犯边境。如果防备匈奴入侵，就会劳苦将士；如果不加防备，匈奴就会侵犯不止。已故武帝同情边境民众长期遭受匈奴祸患，苦于边民被匈奴所俘虏，因此修筑边境屏障要塞，修整烽烟燧火，派将士在边疆屯田戍守来防备匈奴。边防用度不足才兴办盐铁官营，设立酒类专卖，设置均输官署，以此增加财货，增长财富，补助边防费用。现在废除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和均输官署，对内会导致国库空虚，对外造成守备用度缺乏，朝廷无法供给边防将士。”

文学说：“孔子说：‘有国的诸侯和有采邑的卿大夫，不怕民众财用不足而怕财富不平均，不怕国家人口少而怕不安定。’因此天子不谈论财富多少，诸侯不谈论利害，大夫不谈论得失。培养仁义来教化，推广德行来安抚。所以近处的民众亲近归附，远方的民众心悦诚服。因此善于取胜的人不必战斗，善于战斗的人不需要军队，善于用兵的人不用阵法。在朝廷修明政治，就使敌人返车退兵。圣王推行仁政，天下无敌，哪里用得着军费？”

大夫说：“匈奴凶暴狡猾，恣意入侵中国边塞，图谋不轨，早就应该诛讨匈奴。当今皇上怜悯百姓不够富足，不忍心让士大夫暴尸原野。你们这些读书人既然不能身披坚甲，手执锐利的武器，没有北面报复匈奴的壮志，又想废除盐铁官营和均输官署，扰乱边防费用，损害军事战略，没有担忧边防之心，这在道义上是不妥当的。”

文学曰：“古时，重视以德服人，轻视用武力征服。孔子说：‘远方民众如果不归服，就应该修治文教德化，使远方民众前来归附。对已经归附的，就安抚。’如今废除道德感化而发动军队进行讨伐，屯田戍守而加以防备，使军队暴露在边塞原野，以此支撑长期征战，向前线运输粮食无休无止，边境将士挨饥受寒，百姓勤劳受苦。兴办盐铁官营，设置均输等牟利官吏来供给军费，不是长久之策，还是废除盐铁官营为妥。”

大夫说：“古代建立国家，开辟农业之本和工商之末的途径，互通物产的有无，设立集市，统一调剂民众各种需求，招致士人和平民，聚集各种货物，农夫、商贾、工匠、军人各得所求，互相交换之后各自回家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说：‘会通变化，使民众不会厌倦。’因而工匠不生产，就会导致农用器具缺乏；商人不开店，就会导致货物断绝。农用器具缺乏，粮食就不能增产；货物断绝，财用就会匮乏。因此，盐铁官营、均输官署，是用来沟通交流积压的货物、调剂缓急的手段。废除它们是不妥当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以道德引导民众，民风就会淳厚；以利益诱导民众，民俗就会浇薄，违背道义而追逐利益；如果以追逐利益为目标，那么百姓就会在道路、集市上交接。老子说：‘贫穷的国家似乎财富有余。’不是贫穷国家拥有很多财富，而是民众欲望众多，民众浮躁。所以，圣王重农抑商，用礼义来节制民众欲望，充实粮食与货物。在集市上，商人不贩卖无用商品，工匠不制作无用器具。因此，商人可以交流积压的货物，工匠可以准备器械，但工商不是治国的根本要务。”

大夫说：“管子说过：‘国家有肥沃原野的丰饶，而民众不能吃饱，是农具器械不完备。国家有山林河海的货物，而民众没有钱财，是商业和工匠不完备。’陇西郡、蜀郡的朱砂、油漆、旄牛尾、鸟羽，荆州、扬州的皮革、兽骨、象牙，江南的楠木、梓木、竹子、箭竹，燕、齐的鱼、盐、毛毡、皮袄，兖州、豫州的油漆、丝绸、细葛布、纻麻布，都是养育生者、葬送死者的必需品，要依靠商人来流通，依靠工匠制成器具。因此上古圣人制作了舟船、船桨，通行于大川河谷，驾驭牛马，到达丘陵平原；到达远方，穷尽深处，用来交换各种货物，从而便利百姓。所以，已故武帝设立盐铁官员，以满足农业生产之用，开创均输来满足民众对财物的需求。盐铁官营和均输政策，是民众取得给养的来源，废除是不妥当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国家有肥沃原野的丰饶而民众却吃不饱，是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；国家有山林河海的货物而民众却钱财不足，是不追求民众实用，过于精巧的奢侈品太多。因此大河装不满漏酒杯，山海货物填不满溪谷沟壑。因而商王盘庚聚民而居，帝舜深藏黄金，高祖禁止商人做官，都是遏止贪婪卑鄙风俗，培养最为诚实的民风。排斥市井商贾，堵塞利益之门，而民众尚且为非作歹，何况在上位的官员亲身牟利呢？传记说：‘诸侯爱好利益 🡪 大夫贪鄙 🡪 士人贪婪 🡪 庶人偷盗。’这是打开求利洞口，为民众设置犯罪的阶梯。”

大夫说：“以前，各郡和诸侯国诸侯都以其地方特产向中央王朝进贡运输，你往我来，十分麻烦杂乱，货物质量低劣，价值甚至不够支付运输费用。因此各郡和诸侯国设置运输官员，以便相互供给运送，而有利于远方的进贡，因此叫‘均输’。在首都开设仓库，以便统一掌管天下货物。物价便宜就买进，物价昂贵就卖出。朝廷掌管实物，商贾无法从中牟取暴利，因此叫‘平准’。推行平准政策，民众就不会失职；实施均输，民众就会均衡劳逸。平抑各种货物价格而便利百姓，并不是打开求利洞口，为民众设置犯罪的阶梯。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向民众征税，是根据他们所擅长生产的产品进行征收，不强征他们所不擅长生产的产品。农民交纳农产品，妇女交纳纺织品或手工制品。如今官府不去征收他们擅长生产的产品，却强征他们所没有的产品，百姓只好贱卖自家的货物，以满足官府需求。近来，有的郡和诸侯国命令民众制作布匹棉絮，官吏肆意刁难，与他们做交易。官吏所征收的产品，不仅有齐、阿的细绢，蜀、汉的麻布，也包括民间所生产的其他产品。官吏用欺诈的手段低价买进民众产品，农民遭受双重痛苦，女工再次交税，没有看到官府运输带来什么平均的好处。官府乱发号令，关闭城门，垄断市场，各种货物都要收购，导致物价飞涨，使商人牟取暴利。官吏自己经营，就会使官吏包容奸商。豪强富商囤积居奇，等待货物缺乏，不法商人和狡猾官吏低价收购，高价卖出，也没有看到什么物价平衡的好处。古代的均输，是用来均衡劳逸，方便进贡运输，并不是为牟利而倒卖各种货物。”

## 力耕第二

本篇讨论农耕的重要性。大夫强调“贤圣治家非一宝，富国非一道”，“富国何必用本农，足民何必井田也”，国家经营盐铁、酒类以及实施均输、平准，都是为了富国足民，对内加强中央对诸侯的控制，对外通过贸易获取外国的资财，削弱敌国的经济。文学认为农业生产是立国之本，从国外换来的珍奇异物既不实用，又价格昂贵，得不偿失。文学的结论是：“理民之道，在于节用尚本，分土井田而已。”双方对农业地位的认识可谓泾渭分明。

大夫说：“君王掌控自然资源，严格管理关卡市场，掌握物价标准，把握贸易时机，调控物资的供求和价格水平来管理民众。丰收时，朝廷储备物资防备饥荒；灾荒时，发行货币和财物；这样做是为了调配有余、补给不足。夏禹遭受水灾，商汤遭受旱灾，百姓陷入贫困，有的人依靠借贷来接济衣食。于是夏禹用历山的金，商汤用庄山的铜，铸成钱币来赎回民众因饥荒而卖掉的儿女，天下称颂夏禹、商汤为仁君。早先国家财用不足，战士得不到粮饷，崤山以东又遭受水灾，齐、赵一带发生饥荒，朝廷就是依赖均输收集的物资，仓库的蓄积，才给养战士，赈济饥民。因此均输的物资，官府仓库中的钱财，并不只是单纯与百姓做交易赚钱来提供军队的费用，也是用来赈济贫困、防备水旱灾害的手段。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，国家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，民众可以按照季节进入湖泊水坝捕捞而官府不会禁止，百姓都到田地劳动而不误农时。因此民众三年耕作可以积余一年的粮食。这就是夏禹、商汤用来防备水旱而安定百姓的方法。如果荒地得不到开垦，田地得不到整治，即使垄断了山林河海的资财，交流各种工商利益，民众仍然不能富足。所以古代鼓励努力从事农业生产，种植繁多，抓紧农时，即使遇上连年灾荒，也不至于陷入贫困。因此衣食是民众生存根本，种植和收割是民众的主要事务。这两方面做好了，就会国富民安。’”

大夫说：“贤君治理国家并非只有一种法宝，使国家富裕并非只有一条道路。管仲以权术欺诈辅佐齐桓公称霸，而纪国因为加强农业而导致亡国。假使治理国家养活民众一定要务农才行，那么舜就不会从事制陶，伊尹也不会去做厨师。因此，善于治国的人，天下人视之为下，我却视之为高；天下视之为轻，我却视之为重。以工商业替代农业，用虚来代替实。如今山林河泽的资财，均输所储存的货物，都是通过调控物资供求和价格来役使诸侯的。汝水和汉水的黄金，精细的丝织贡品，是用来赚取外国和匈奴、西羌钱财的宝物。中国一段没有花纹的丝织品，可以换取匈奴价值很多黄金的物资，且能够损耗敌国的财用。所以外国的骡、驴、骆驼，一头接着一头进入中国边塞，野马和赤毛白腹的马，都成为我国的牲畜，鼠皮、貂皮、狐貉，彩色的毡子，有花纹的毛毯充满皇宫的仓库，璧玉、珊瑚、琉璃，都成为我国的宝物。这样，外国货物不断流入中国，而中国财利不会向国外流泄。外国异物内流就会使国家财用丰饶，财利不外泄就会使民用充足。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，商人流通货物而不欺诈，工匠致力于器物结实而不造假。因此君子无论是耕稼还是打猎捕鱼，都是一样诚实。商人长于欺诈，工匠弄虚作假，窥伺时机牟利而不惭愧，所以刻薄的人更为欺诈，而敦厚的人变为刻薄。从前夏桀宫室中充满歌女，她们穿着绣花衣裙，因此伊尹远走高飞，投奔亳地的商汤，夏朝终于断送在歌女手中。如今骡驴的用处，比不上牛马的功效，鼠皮、貂皮、毡子、毛毯，比不上华丽丝绸实用。美玉、珊瑚出于昆仑山，珠玑、犀牛角、象牙出于桂林郡，从桂林到长安有一万多里。计算耕种采桑的功效，再算一下采集远方珍奇异物的费用，就可以知道一件珍奇异物的价格高出原来的百倍，一捧珍奇之物相当于万钟粮食。上位者喜好珍奇怪物，下层人就会追求奇装异服，重视远方珍奇之物，就会使国家钱财充实外国的国库。所以君王不应珍视无用之物，以此引导民众节俭；不应喜爱珍奇货物，以此使国家富裕。因此统治民众的方法，在于节约财用，重视农业根本，分封土地，实施古代的井田制而已。”

大夫说：“从首都长安到东西南北，经过高山大川，通过各个郡和诸侯国，各个殷实富裕的大都市，都是街道四通八达，商贾云集，万物增殖的地方。因此圣人顺应天时变化，智者善于利用当地特产，聪明人依靠别人劳动发财致富，中等智力的人依靠自己劳动取得财富。长沮、桀溺当隐士，没有百金积蓄；盗跖庄蹻之徒，也不像猗顿那样富有；宛周齐鲁，四大商都的商人遍布天下。因此商贾如此富有，有的人甚至积累万金，这是追求利润、积累盈余所带来的。使国家富有，何必要用农业？使民众丰衣足食，何必要实施井田制？”

文学说：“洪水滔天，才有大禹治水的功绩；黄河水泛滥，才有武帝宣房的功勋。商纣王残暴酷虐，才有周武王与诸侯誓师孟津的谋略；天下烦混扰乱，才有积累盈余的富裕。上古时期是治国的最高境界，民风淳朴，重视农业根本，民众安乐愉快，寡欲少求。那时，道路上少有行人，市朝生出杂草。不耕种吃不饱肚子，不纺织不能遮蔽形体。即使有人群聚集的商业要地，有陶朱公、宛孔氏的经营策略，也没有地方施展技巧。从古到今，不施恩而得到报答，不劳动而有功劳，不曾有过。”

## 通有第三

汉家实行均输政策的宗旨，是通过国家行政力量统管全国物资，调剂有无，实现物资的有效配置。本篇围绕货物要不要流通、要不要调剂有无的问题展开辩论。大夫认为货物流通有利于财富增殖，他从五行配五方的角度，说明均衡有无、流通万物是天地之道，进而又征引孔子关于俭不中礼的言论，说明一味节俭并不是正确的方法。文学则恪守以农为本的信念，主张“王者禁溢利，节漏费。溢利禁则反本，漏费节则民用给”。大夫强调的是货物流通带来的利益，而文学则更多地看到了工商业活动所带来的奢靡风气；前者否定力耕，显然对农业之本不利；而后者反对货物流通，则显然有闭关锁国之嫌。

大夫说：“燕地的涿和蓟，赵地的邯郸，魏地的温和轵，韩地的荥阳，齐地的临淄，楚地的宛和陈，郑地的阳翟，伊水、洛水、黄河流域的东周西周，富裕冠于海内，都是天下有名都市，并不是耕种田地而致富，而是居于五大都市的要道，处于交通枢纽之上。因此物产丰富的地方民众富有，住宅靠近都市的家庭富裕。致富在于筹划，不在于亲身劳动；获利在于地势优越，不在于努力耕作。”

文学说：“荆州、扬州南有桂林的丰饶，内有长江、湖泊的利益，左边有铜陵的黄铜，右边有蜀、汉的木材，砍伐树木，种植庄稼，焚烧草木，播种五谷，以火耕地，以水耨草，土地广阔，财富丰饶。但民众懒惰偷生，喜欢鲜衣美食，即使住在在白茅草屋里，也要歌唱弹琴，过得了一天，过不了一个月，早上唱歌，晚上忧愁。赵地和中山靠近黄河，汇合四通八达的要冲，是天下人必经之路，商贾在路上交叉往来，诸侯交接于道路。然而民众过分经商，奢侈浪费，不愿务农，男女讲究修饰打扮，家中即使没有余粮，仍然弹琴作乐。所以楚地、赵地民众，大都贫穷。宋卫韩梁四地，爱好农耕，凡编入户籍的平民，人人丰足。因此获利在于自我珍惜，不在于地处街道要冲；致富在于节俭，按时耕种，不在于每年派官吏从事于羽鸠赋税的征收。”

大夫说：“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：东方属木，而丹阳、章山却有金铜矿山；南方属火，而交趾郡却有浩瀚的南海；西方属金，而蜀郡、陇西郡却有名贵木材树林；北方属水，而幽州却有沙漠。这些都是天地用来平均有无而流通万物的。如今吴、越的竹子，随、唐的木材，多得用不完，而曹、卫、梁、宋，却用柞木做简陋棺材，有的甚至抛弃尸体；长江、湖泊的鱼类，莱、黄的鲐鱼，多得吃不完，而邹、鲁、周、韩，却以藜藿野菜和蔬菜为食。天地的财利无不丰足，山林河海的货物无不丰富；然而百姓生活匮乏，财用不足，这是财物多少的分布不均匀，天下财物没有疏散的缘故。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，栎木椽子不用砍削，茅草盖屋不用修剪，穿的是粗布衣，吃饭用的是陶碗，把铜铁铸成锄头，糅合泥土成为器具，工匠不制造奇异怪巧的制品，世人不以不能吃穿的东西为宝，人人都安心住在自己居住的地方，喜欢当地风俗，甜美地吃着自己的食物，习惯使用自己的器具。所以远方的货物不去交易，昆仑山的宝玉也运不到。如今世俗败坏，竞相奢侈浪费，妇女手工制品要求极其精细，工匠制品要求极其奇巧，雕琢素朴的东西，崇尚珍奇怪物，开山凿石来寻找金银，潜入深水来寻求珠玑，设置机关陷阱来捕捉犀牛大象，张设网罗来猎捕翡翠，寻求边远地区的宝物来迷乱中国，转运邛、筰的货物，到达东边沿海地区，交流万里之外的财物，耽误时日，耗费功效，无益于实用。所以平民夫妇，忙得精疲力竭，却衣食不足。因此君王禁止暴利，节约不必要的费用。暴利被禁止就会返回农业根本，不必要的费用被节约下来，就会民用充足。所以活着不乏资财，死后不会抛尸荒野。”

大夫说：“古时，宫室有等级制度，车马衣服按照功劳大小而定；栎木椽子和茅草盖屋，并不是先王的制度。君子节制奢侈讥刺俭朴，因为俭朴就会粗陋。孙叔敖为楚国令尹，妻子不穿丝帛衣服，马不喂粮。孔子说：‘不可以这样做，太俭朴就与下级分不出等级。’这就是《诗经·唐风·蟋蟀》创作的原因。《管子》说：‘不修饰宫室，材木就用不完，不充实厨房，禽兽就不会减少寿命。如果没有工商业，农业就无从发展，没有黼黻礼服，女工就不能施展技艺。’因此工商木匠，都是对国家有用的人，能够提供器械设备。工商匠人，并不是今天才有。弦高到东周贩牛，五羖大夫百里奚曾受雇租车到秦国经商，公输班凭借圆规曲尺而成为能工巧匠，欧冶子凭借镕铸技术而成为铸剑高手。《论语·子张》说：‘各种工匠居住在作坊，尽力完成工作。’农业与商业交易，有利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。有些人住在山里或处于湖畔，野草丛生，土地贫瘠，更应该加强财物流通，想办法均衡特产。所以特产多的地方不独自富裕，特产少的地方不独自贫乏。如果各自居住在自己那个地方，吃那个地方的食物，那么有些盛产橘柚的地方就卖不出去，朐县的盐也运不出，毡子地毯都不能上市，吴地、唐地的竹子和木材就没有用了。”

文学说：“孟子说过：‘不违农时，谷子就吃不完。蚕麻按时养织，粗布丝帛就穿不完。斧斤按时节进山砍伐，材木就用不完。按照时节打猎捕鱼，鱼肉就吃不完。’如果无休无止地修饰宫室，增建亭台楼榭，木匠把大木料砍成小木料，把圆木砍为方木，雕刻云气、山林，那么材木就不够用。男子弃农经商，雕刻镂画，描摹禽兽，穷尽事物变化，那么谷子就不够吃。妇女刺绣精细，构成花纹，极尽技巧，那么丝帛粗布就不够穿。厨师烹杀兽胎蛋卵，煎烤调和，穷尽酸苦甘辛咸五味，那么鱼肉就不够吃。当今之世，不怕禽兽不减少，材木用不完，而是怕僭越、奢侈之风无穷无尽；不怕没有毡子、毛毯、橘子、柚子，而是怕没有狭小的茅屋和糠糟。”

## 错币第四

本篇讨论钱币铸造权问题。汉文帝曾经放任民间铸钱，这为藩国诸侯创造了雄厚的经济实力，同时也为奸诈不法之徒提供了聚集的条件。汉武帝将铸钱权收归国家，但新币发行也出现了一些弊病。大夫站在朝廷立场上，坚持由国家统一铸造钱币，认为这是强干弱枝、平息奸伪、均衡贫富的必要手段。文学则认为应该允许民间铸钱，保持货币多样化，反对朝廷与民争利。

大夫说：“流通钱币，交换有无，民众衣食生活费用供给不够，是因为货物被垄断。计算农业收入，再量入为出，而民众还忍饥挨饿，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。一个智慧的人收入可以抵一百个人的劳动收入，愚蠢的人却赚不回本钱。君主如果不加以调整，民间就会产生侵犯他人利益的富户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储存的粮食一百年也吃不完，有的人连糟糠都吃不饱。民众太富有，就不可以用俸禄支使他；民众太强势，就不可以用刑罚来威慑他。如果不分散聚积的财富，均衡独占的利益，就会贫富悬殊。因此君主储备粮食，掌管财用，限制有余，调剂不足，禁止拥有过多的财富，堵塞牟取暴利的途径，这样百姓可以做到家给人足。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，重道德而贱利益，重大义而轻财富。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的时代，道德大义交替盛衰。衰落了就扶一把，倾覆了就安定它。所以夏朝行政风格是忠厚，殷朝行政风格是敬鬼神，周朝行政风格是礼文繁缛，学校的教化，恭让的礼节，鲜明灿烂，现在还能从文献中看到。后来礼义松弛崩坏，因而领取国家俸禄的君子，违背礼义，争夺财富，互相倾轧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储备了百年粮食，而有的人食不果腹。古代当官的人不种植收割，打猎的人不会捕鱼，守关、打更的人，都有固定俸禄，不得兼有职务以外的收入，不得将利益一网打尽。这样，愚蠢的人和智慧的人都会同样有收获，不会互相倾轧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说：‘那里有漏掉的一把庄稼，这里有丢下的谷穗，它们属于寡妇的利益。’这几句诗说的就是不将利益一网打尽啊。”

大夫说：“商汤、周文王继承夏桀、殷纣王衰世，汉朝乘秦朝弊政之机而发迹兴盛。行政风格有的质朴，有的富于文采，并不是随意改变传统法度。风俗变坏就要改变法度，并不是一定要改变古代传统，而是要拯救失误扶持衰世。因此教化与风俗一起改变，货币与时世一起变易。夏朝的钱币是黑色贝壳，周人的钱币是紫色贝壳，后代则用金钱刀布做货币。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衰，这是事物由始到终的运动。因此山林川泽不征赋税，就会导致君主与臣民同等利益；刀币不禁止私人铸造，就会使真假货币并行于市。臣民富裕就会竞相奢侈，私人操纵财利就会互相倾轧。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，有集市而不用钱币，各人以其所有去交换所无，拿布帛去交换蚕丝而已。后世即有龟甲、贝壳和铜钱，几种货币交替使用。钱币屡次变化，民众因此越来越虚伪。要以质朴去补救虚伪，用礼义防止过失。商汤、周文王继承夏桀、殷纣王衰世，改革法度，改变教化，使殷、周王道兴盛。汉初乘秦朝弊政机会，而不去改变法度和教化，反而积蓄财利，改变货币，却想着要返回农业根本，这如同用煎熬去防止烧烤，用烧火去防止水的沸腾。上位者爱好礼义，民众就节制自己；上位者爱好财货，下民就追求财利。”

大夫说：“汉文帝放任民众铸造钱币、冶炼铁器、煮制食盐。吴王刘濞擅自垄断沿海湖泽，文帝宠臣邓通垄断西山铜器。崤山以东奸诈狡猾的人，都聚集到吴国，秦地、雍地、汉中、蜀郡的奸民都依附邓通。吴王、邓通钱币遍行天下，因此朝廷才有铸钱的禁令。管制法规一旦确立，奸诈作伪之风平息，民众就不期望非法所得，而各自从事本行，这样，他们不返回农业根本又做什么？因此国家统一铸钱，民众就不会产生二心；货币由国家发行，下民就不会产生疑问。”

文学说：“往古时候，货币多样，财物流通，民生安乐。后来，渐渐去掉旧钱币，另发行银锡龟龙钱币，不少民众巧妙使用新币。钱币屡次改变，民众越发怀疑。朝廷于是下令废除此前天下各种钱币，命令水衡都尉属下均输官、钟官、辨铜令三官统一铸钱。主管铸钱官吏和铸钱工匠从中牟利，有些钱币不合规格，因此铸出来的钱有薄厚轻重之分。农夫不习惯新币，拿熟悉的旧钱币来与新币比较，相信旧币，怀疑新币，不知真假。商贾用质量好的钱币换取质量差的钱币，用半数真钱换取成倍的假钱。要买进就要损失实利，要卖出就怕失去常理，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大。对铸造伪币虽然已经有了国法，但货币有好有坏的现象和过去一样。选择真钱会导致货物的积压，用钱的人尤其痛苦。《春秋》说：‘谋划赶不上蛮夷就不要实行。’因此君王者对外不垄断河海川泽以有利于百姓的使用，对内不禁止铸钱以便沟通民间的交易。”

## 禁耕第五

本篇题为“禁耕”，意谓盐铁官营极大地伤害了农耕。大夫认为，盐铁私营为诸侯反叛提供了经济基础，促进了豪强势力膨胀，造成不法奸商垄断市场，形成“一家害百家”的恶果，因此不能放任盐铁私营。文学指出盐铁官营对农耕造成诸多不便：“县官笼而一之，则铁器失其宜，而农民失其便。器用不便，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。草莱不辟，则民困乏。”文学来自民间，他们反映的盐铁官营的负面影响，是高居庙堂之上的大夫所不知道的。

大夫说：“平民有宝贵器物，尚且放进箱笼柜厨里面收藏，何况君主的山林河海呢？出产盐铁的地方，一定是在深山穷泽之中，不是豪强富商就不能开采盐铁。过去，盐铁尚未收归国有，布衣平民中有朐邴，君主中有吴王刘濞，他们都是最初引起盐铁官营的话题。吴王刘濞垄断山林川泽的丰饶特产，减少对百姓的赋税，赈济穷人，成就私人的威信后，叛逆心思就产生了。如果不早日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而忧患他的反叛后果，就如同挖开吕梁的决口，水势浩大，所伤害的民众一定很多。姜太公说：‘一家伤害百家，百家伤害诸侯，诸侯伤害天下，都是王法所禁止的。’现在如果放任民众私自经营盐铁，废除盐铁官营来帮助豪强，满足他们的贪心，众多邪恶之徒群聚一起，豪强私门结成党羽，那么对豪强就日益难以控制，割据势力作奸局面也就形成了。”

文学说：“平民把财富藏在家里，诸侯把财富藏在封国，天子把财富藏在海内。因此平民以院墙作为箱笼，天子以四海作为橱柜。天子驾临诸侯国，从大堂前东阶登堂，诸侯交纳城门钥匙，手执写有自己姓名和官职的策书而听命天子，表示不敢以主人自居。所以君王不聚积财富，而是藏富于民，远离工商浮末财利，用礼义去教化民众。礼义确立了，民众就会被在上位的人所教化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，即使商汤、周武王还活在世上，也用不着忧虑。工商业的事务，像欧冶子那样铸铜炼铁，又有什么奸邪能形成呢？孟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三桓在鲁国专权，范氏、中行氏、智氏、韩氏、赵氏、魏氏六卿分掌晋国大权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掌管了盐铁。因此权势财利深藏的地方，不在山林河海，而是在朝廷；一家害百家，是在萧墙内部，而不是在平民朐邴。”

大夫说：“山林河海有了不得私自开发的禁令，平民就不会互相倾轧；物价贵贱有了公平标准，民众就不会生疑。朝廷设立衡量器具，规定公平标准，人人都称心如意，即使让五尺儿童到集市去买东西，也没有人能够欺骗他。现在如果废除了盐铁官营和均输、平准，那么豪强就会垄断资源，独占财利。决定市场物价高低的人住在民间里弄，物价高低由他们说了算，或贵或贱没有标准，他们端坐在家里而成为富豪，这是培养豪强、抑制弱民，将财物藏于盗跖手里。培养豪强抑制弱民，平民就受到损害；如同杂草多了必然会损害五谷。一家伤害百家，不在平民朐邴，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山林河海，是财用的宝贵来路。铁器，相当于农夫的敢死卫士 🡪 消灭田野杂草这些仇敌 🡪 开辟田野 🡪 五谷丰收。将财用的宝贵来路打开 🡪 百姓就会丰足，民众的财用就得到保障 🡪 国家就富裕起来 🡪 进行礼义教化 🡪 民众就会在道路上谦让，工商业者就不会互相欺诈，人们怀着敦厚朴实的感情互相交接，而没有人以利相交。秦楚燕齐各地，土地产出能力不同，土质硬软程度不一样，农具大小各有用途，地区风俗不同。朝廷笼统规定统一规格 🡪 铁器就失去因地制宜的特点，农民失去方便 🡪 农夫就会在田野疲劳不堪，荒原草地得不到开辟 🡪 平民百姓就会陷入贫困。煮盐冶铁，大都依傍深山大川，靠近炼铁所需山林木炭之处，地势遥远，劳动强度大。各郡轮流服役的更卒大多不能忍受，官府便责令他们用钱雇人代为服役。有的县邑按照户口征收生铁，而压低收购价格。陕西等六郡按照各道方位挨次出钱雇车雇人转运盐铁，既麻烦又费钱，百姓对此深感痛苦。我只看到一个盐铁官员伤害了千里之内的百姓，没有看到朐邴带来了什么祸害。”

## 复古第六

儒家是一个复古色彩非常浓厚的学派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高举古代文化传统的旗帜。在盐铁会议上，文学、贤良最擅长的手法就是以古代传统对照当代。本篇以“复古”为题，但是对于古代制度的内涵，辩论双方却有不同的理解。大夫提出：“古者，名山大泽不以封，为下之专利也。”大夫以此为据，说明汉家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完全符合古代传统。这是大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运用文学、贤良的手法来驳倒对方。文学虽然也提及五帝三王之道和六艺之风，但却不能具体回应大夫“古者，名山大泽不以封”的观点，只能以《诗经》诗句为据，说明朝廷官员不应该谋取权势和财利。

大夫说：“前任扇水郡都尉彭祖请假回家办理父母丧事，向朝廷汇报说：‘官营盐铁都是优质产品，这一点十分明显。从事煮盐炼铁的更卒和刑徒，吃饭穿衣都由朝廷提供，铸作铁器，朝廷下拨的经费很多，对民众没有妨害。有些不良官吏，不执行朝廷禁令，因此民众感到烦扰和痛苦。’朝廷禁令的本意，国家统一经营盐铁，并不是单纯为了财政收入，同时也是建设农业，抑制工商业，瓦解地方豪强朋党集团，禁止社会过度奢侈风气，杜绝兼并的门路。古时，名山大泽不会分封给诸侯，防止诸侯垄断名山大泽的利益。山海的财利，广大湖泽储藏的财富，是天地的宝藏，都应该属于少府所管。陛下不营私利，将山泽归属于大司农掌管，以此来帮助百姓。食用经商浮利的奇诡豪民，喜欢垄断山林河海的货物，以此发家致富，奴役盘剥小民百姓，因此阻挠盐铁官营的人很多。铁器和兵器，对天下有很大用处，不宜让众多庶民经营。以前，豪强大户，获准经营山海财利，采矿铸铁，煮海水制盐。有的一家大户聚集徒众，甚至多达一千多人，这些人大都是收容流放的罪犯。他们远离乡里，抛弃祖坟，投靠豪强大户，聚集于深山穷泽之中，从事奸诈欺骗的勾当，实施结党营私的权谋，轻易为非作歹，问题就大了！现在，朝廷拓广进贤授能的途径，慎重地选择郡守都尉，不必废除盐铁官营而可以安定民众。”

文学说：“扇水都尉所说的话，是当时的权宜，一时的办法，不可长久施行而传于后世，这不是圣明君王用来统治国家、治理人民的举措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云：‘这些谋划可哀，不学先人法式，不以大道为常，只听浅近之言。’这是诗人讥刺那些不理解王道，而善于谋取权势财利的人。孝武皇帝外攘夷狄，平定百越，屡次用兵，粮食不足。因此设立屯田官，实行国家统一铸钱，献粮食给国家就可以拜官，拯救危急，补助不足。如今陛下继承孝武皇帝创建伟大功业的勤勉，养育劳累疲倦的民众，这正是处于用烂稀饭喂养病人的时候；朝廷公卿应该多思考如何安定凝聚百姓，兴利除害，以仁义辅佐圣明君主，修治润饰汉家宏图大业。当今圣明君主即位已有六年，朝廷公卿没有请求皇帝减除不急需的官员，罢黜机诈谋利的小人。人们期待权衡轻重已久，民众确实对上面有很大期待。陛下宣明圣德，昭示光辉，下令各郡国贤良、文学之士，乘坐传车到公车署，讨论五帝、三王之道，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的教化，上书陈述安与危、利与害的分野，旨意非常明确。如今公卿辩论，仍然没有定论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守持小节而遗漏大体，怀抱小利而忘记大利啊。”

大夫说：“屋檐栋梁之内，燕雀不知道天地之高；土井内的青蛙，不知道江海之大；穷困的夫妇，不知道国家的谋略；肩挑背负的小贩，不知道猗顿的富有。已故武帝分析外国的利弊，估计匈奴、南越的兵力，认为敌国兵力脆弱而容易制服，用力较少而功劳很大，因此根据形势变化来主导外伐四夷，使汉朝的疆域依山临海，并把长城连成一片，北边攻取河套以北地带，开辟直通匈奴地区的道路，可惜他的功业没有最后完成。当年周文王接受天命，征伐崇国，在丰地建立都城。周武王继承文王事业，车载文王木主去征讨殷商，一举攻破商都，擒获殷纣王，完成周王朝大业。曹沬抛弃三次战败的耻辱，而收复被齐国侵占的土地。管仲背负当世不好的名声，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主功业。因此志向大的人不计较小节，通达权变的人不拘泥世俗之见。目前主管官员思考的是如何施展姜太公的计谋，完成已故武帝未竟之业，志在消灭匈奴，活捉单于，因此没有时间去思考门外汉的观点，而采用固执迂腐的儒生的意见。”

文学说：“燕雀离开了鸟巢就有被鹰隼抓捕的忧患，土井青蛙离开居所就有被蛇鼠吞食的危险，何况翱翔于千仞高空而畅游四海呢？它们遇到的祸患一定更大了！这就是李斯为什么折断翅膀，赵高沉没深渊的原因啊。我只听说过周文王、周武王接受天命称王，讨伐不义的殷商王朝来安抚各位诸侯大夫，没有听说损害中原各诸侯国来征讨夷狄。从前秦始皇经常动员天下人力来征讨匈奴南越，竭尽天下财用来供给战争费用，然而最终不能完成。以百万大军供秦始皇驱使，这是天下人都听说的。况且屡次作战就会使民众疲劳，长期用兵就会使军队疲惫，这是百姓感到痛苦，而固执迂腐的儒生感到忧虑的啊。”

# 卷二

## 非鞅第七

汉家内兴制度外伐四夷，形式上类似于战国的商鞅变法。因此大夫试图通过歌颂商鞅，来为汉家盐铁官营寻找历史依据。由此引发辩论双方对商鞅的评价，评论商鞅实际上是评论汉家的经济军事政策。大夫认为商鞅内立法度，外收山泽之税，最终国富兵强，为后来秦朝统一奠定基础。文学指出，商鞅“弃道而用权，废德而任力，峭法盛刑，以虐戾为俗，欺旧交以为功，刑公族以立威，无恩于百姓，无信于诸侯，人与之为怨，家与之为雠”，不仅使自己五马分尸，也为秦朝的短命埋下祸根。

大夫说：“从前商鞅担任秦国丞相，在朝廷之内建立法度，严明刑罚，整治政令教化，使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容身之地。在地方上兴办获得百倍厚利的事业，征收山林湖泽的赋税，国家富有，民众强盛，武器装备齐全，粮食蓄积有余。所以征伐敌国，开拓疆域，不向百姓征税，而军费充足。秦国财利费用取之不竭，而民众并不知情；疆域拓展到西河，而民众并不感到征战的痛苦。盐铁官营的好处，是用来帮助百姓解决急需，补足军费开支，尽力蓄积粮食，以防不足，盐铁官营好处很多，对国家有益，对民众无害。百姓有什么痛苦，文学又有什么忧患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文帝时期，没有盐铁官营而民众富裕；如今有了盐铁官营而百姓贫困，没有看到盐铁官营的好处，反而看到盐铁官营的害处。况且财利不从天上来，全部取于民间，却说获利百倍，这是策略的失误。无异于愚蠢的人反穿皮裘背负柴火，爱惜皮裘的毛，不知道皮板被磨损了。李子梅子今年果实结得多，来年肯定结得少；新谷成熟了，旧谷品质下降。即使天地也不能两方盈满，何况人事呢？因此对彼有利，一定对此有损，如同月亮、太阳不能同时照耀，白天和黑夜互有长短。商鞅严刑峻法，崇尚财利，秦国民不聊生，都去向秦孝公哭诉。吴起兴兵攻战，楚人骚动不安，都去向楚悼王哭诉。后来楚国日益危险，秦国日益削弱。因此财利蓄积了，民怨也积累了；地域拓广了，灾祸也构成了，哪里有什么秦国财利取之不竭而民众并不知情，疆域拓展到西河而民众并不感到征战痛苦呢？如今朝廷沿用商鞅的策略，对外像吴起一样频繁用兵，征夫在路上勤苦，思妇在家中挨饥受冻，老母亲号哭，单身女子叹息。文学即使想无忧无虑，又怎么做得到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秦国任用商君，国家富强，最终成就帝业。到秦二世胡亥时期，奸臣赵高独断专权，公平得不到伸张，导致六国诸侯起义叛离，秦朝宗庙毁坏。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十五年》说：‘不用说郑厉公夺权了，因为祭仲已经死亡了。’善于唱歌的人能够使他人接续自己的歌声，善于首创的人能够使他人继承自己的功业。独木轮车的车辋，是上古诸侯生病时发明的。西周王道的成功，是周公的功劳。有裨谌的草创，没有子产的加工润色；有周文王、周武王的规矩，没有周公、姜太公的配合，周朝功业就不能成就。现在以赵高灭亡秦朝而非难商鞅，如同以崇侯虎扰乱殷朝而非难伊尹。”

文学说：“善于凿榫眼的人，凿出的榫眼周严而不脱落；善于打地基的人，砌出的高墙牢固而不倒塌。伊尹以尧、舜之道作为殷商王朝的基础，商汤的子孙继承王位，经历百代而不断绝。商鞅以严刑峻法作为秦王朝的基础，因此到了秦二世就被夺权。刑法已经非常严峻，又颁布相坐法令，制定诽谤法，增加肉刑，百姓胆战心惊。苛捐杂税已经很多，又在地方禁止任意开发山林河泽，在朝廷设立牟取百倍利益的机构，民众没有说理的地方。崇尚财利，鄙视礼义，倡导武力，推崇武功，秦朝并不是不能拓展疆域，但就像一个人得了浮肿病，喝水越多病越重。你只知道商鞅为秦国开创帝业，不知道他将秦国引向灭亡的道路。歪歪斜斜的榫眼，即使是能工巧匠鲁班也不能做好榫头。由一畚箕土打成的地基，即使是高明瓦匠也不能砌成高墙。如同秋天蓬草遭到霜打，遇到风吹就会凋落，即使有十个子产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因此，名医扁鹊不能使白骨生肉，仁人微子、箕子也不能保存即将灭亡的殷国。”

大夫说：“说起来并不难，做起来才是难事。因此贤明的人脚踏实地，建立功业，不是只说空话。从前商君懂得开发什么和堵塞什么的道理，凭借当世的权力，为秦国增长财利成就帝业，所以能够吞并近邻，消灭远国，制服燕、赵，凌驾齐、楚，山东诸侯整顿衣襟，向西面望风归服。后来，蒙恬征讨匈奴，开拓疆域，渡过黄河以北，势如摧枯拉朽。这是因为继承了商君遗留下来的谋略，平时加强整顿和准备。因而一举手就有利，一行动就有功。蓄积财利，运筹策划，这是国家富强的原因。因此，废除盐铁官营而归之于民，这是没有看到国家重大政策，不懂得大道理。”

文学说：“商鞅开发和堵塞的思想，并非不能施行；蒙恬驱逐匈奴千里之外，并非无功；威震天下，并非不强；诸侯望风西面归服，并非不听从；然而这些都是秦灭亡的原因。商鞅用权术危害秦国，蒙恬以得到千里土地灭亡秦国社稷：这两人，只知道利益而不知祸害，只知前进而不知后退，因此最终自身惨死，而众人随之失败。这是浅薄智慧和愚人计谋，哪有什么大道？所以说：‘小人先迎合而后背叛，当初虽然乘马得意，最终必定血泪涟涟。’说的就是商鞅、蒙恬。”

大夫说：“贤淑美丽的女子，被驼背丑女所嫉妒；贤明智慧的士人，被卑贱无能的人所厌恶。所以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，公伯寮在季孙氏面前诋毁子路。商鞅起于平民，从魏国进入秦国，一年就担任秦国宰相，改革法度，修明教令，秦国得到大治。因此军队出动，魏国割地求和；军队休整，国家富强。秦孝公大为高兴，将於、商地方五百里封给商鞅，功勋如丘山，美名传后世。世俗之人不能做出商鞅的功业，因此互相嫉妒他的才能，诽谤他的功绩。”

文学说：“君子进身仕途一定要以正道，退隐一定不要失去礼义，处于高位而不要骄傲，功劳多而不夸耀，地位尊贵而行为谦恭，功绩甚大而通情达理；因此世俗不嫉妒他的才能，不嫉妒他的功业。商鞅抛弃正道而使用权术，废除道德而任用强力，严法重刑，以残暴凶狠为风俗，欺骗老朋友公子卬来建立功业，施刑贵族公子虔、公孙贾来树立威信，对百姓没有恩情，对诸侯不讲信用，人人结怨，家家仇敌，虽然因为军功而被封为商君，但这如同吃毒肉太饱而遭到毒害。苏秦倡导合纵，统一协理山东六国，功业不可谓不大；桀、纣与尧、舜并称，名字至今不消亡，声名不可谓不长；然而被历史否定的人不足为贵。因此对事业不能随便赞美，对名声不能随便传颂。”

大夫说：“白色丝织品在黑色染料中不能避免被污染，圣贤不能在乱世中自我保全。所以箕子被囚禁，比干被剖心。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称霸，夫差无道，杀死伍子胥，将尸体装进皮袋浮于江中。乐毅在燕昭王时期建立大功，但却被燕惠王怀疑。人臣为节操牺牲自己，只是遇到平庸的君主而不被任用。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，最终消灭强大的吴国，最后越王却令他自杀而死。这都是骄横的君主背弃恩德，听信谗言，不考虑他们功劳的缘故，难道是他们自身的罪过吗？”

文学说：“比干被剖心，伍子胥尸体被装进皮袋浮于江中，并不是他们轻率地触犯君主而危及自身，也不是他们强行劝谏以求名。而是忧伤、忠诚的心在胸膛跳动，忘记祸患在身外发生，志在纠正君主过失，拯救民众，因而身死而不怨恨。君子能做正确的事情，但不能抵御别人的非难，即使遭到刑罚杀戮，也不是他们的罪过。所以比干被杀死，殷人怨恨纣王，子胥被杀死，吴人痛恨夫差。而秦国民众怨恨商鞅之法，超过个人的私仇，因此孝公去世当天，秦国全国民众围攻商鞅，商鞅仰天叹息：‘哎呀，秦国朝政的弊病，竟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了！’商鞅最终被五马分尸，亲族被夷灭，成为天下笑柄。这个人是自杀，而不是别人杀死了他。”

## 晁错第八

本篇记载大夫与文学围绕晁错忠奸问题而展开的论辩。晁错是西汉文景时期著名政治家，因主张削藩而激化了中央与藩国的矛盾，吴楚七国打着“清君侧”旗号反叛，汉景帝迫于藩国压力而诛晁错。文中大夫将晁错与淮南王、衡山王反叛相提并论，指责晁错咎由自取。文学指出，晁错是为了汉家万世之安而与诸侯结仇，为主而死，堪称汉家的“信士”。晁错行事其实与桑弘羊相似，都是考虑汉家的利益。此处桑弘羊指责晁错，应该是另有用意，他是以晁错故事来警告文学、贤良不要因反对盐铁官营而激化矛盾，以免惹祸上身。

大夫说：“《春秋》的一个笔法是，对君主和父母双亲不能有图弑之心，如果对君主和父母有图弑之心，就一定要格杀勿论。因此臣下之罪，没有比弑君更重的，人子之罪，没有比弑父更重的。从前，淮南王刘安、衡山王刘赐集门客著书，招揽四方游学之士，山东儒、墨之徒都聚集在江、淮之间，他们在一起讲议讨论，著《淮南鸿烈》数十篇。但他们最终违背君臣大义，不守臣道，教唆淮南王刘安、衡山王刘赐谋反叛逆，自己被诛，殃及宗族。晁错鼓动汉帝改变祖宗常法，不遵守分封制度，逼迫刘氏诸侯宗亲，削减诸侯封地，导致藩国不附中央，刘氏骨肉疏离不亲，吴、楚七国积怨反叛，景帝不得不下令将晁错斩于东市，以此抚慰三军之士，向天下诸侯谢罪。这个晁错究竟是被谁杀死的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孔子不喝名叫‘盗泉’的水，曾子不进入名叫‘胜母’的里巷。不合仁义的名字尚且厌恶，何况做不合臣道和子道的坏事呢？因此，当陈成子弑齐简公时，孔子沐浴上朝，将此事告诉鲁哀公，请求讨贼。崔杼弑齐庄公，陈文子虽有四十匹马，却宁愿舍弃而离开齐国。《礼记·表记》说：‘君子可以让他尊贵，可以让他贫贱，可以对他用刑，可以将他杀死，却不可以让他作乱。’至于那些外表道貌岸然而内无其实，口头诵读经文而行为却不遵其道的人，其实是盗贼，他们本来就是与盗贼一伙，不能见容于君子的区域。《春秋》的笔法之一是，不以少犯众，即使是施行诛绝之义也要有所限制，这是因为《春秋》不愿扩大怨恶的范围。因此，帝舜诛杀的是鲧，举荐的是禹。因为美玉上有点瑕疵，就抛弃玉石，因为一人有罪，就罪及众人，那么天下就没有美丽宝玉和诚信之士了。晁错对皇帝说，诸侯地盘太大，他们富贵就会骄奢，形势紧急就会联合反叛。因此晁错建议，借吴王刘濞过错而削除吴国的会稽郡，借楚王刘戊的罪过而削夺楚国的东海郡，以此来削弱诸侯势力，分散诸侯权力，这是为汉家万世安全考虑啊。春秋郑国商人弦高欺骗秦国，却是郑国的忠信之臣，晁错忠于汉室而成为吴、楚诸侯的仇敌。人臣各为其主而死，各为其国而用，这就是春秋晋人解扬忠于晋国而欺骗楚国的原因啊。”

## 刺权第九

本篇的主旨是讥刺权贵。大夫炫耀“官尊者禄厚，本美者枝茂”，“夫贵于朝，妻贵于室”，嘲讽平民“居编户之列，而望卿相之子孙，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，无钱而欲千金之宝，不亦虚望哉”。文学则指出，做官应该以天下为己任，而不是为了厚禄和妻子荣宠，“君子之仕，行其义，非乐其势也。受禄以润贤，非私其利”。两相对比，思想境界的高低是显而易见的。这说明地位高不等于认识水平高，官大不等于思想境界大。

大夫说：“现在越地的具区泽，楚地的云梦泽，宋地的钜野泽，齐地的孟诸泽，具有国家的财富，是霸王的资源。君主统一控制这些资源财富就强盛，不禁止他人占有就灭亡。当年齐就是将国家的肠胃——储藏物产大权——让给他人，导致卿大夫强盛而不可控制，枝叶过大，压断树干，让大夫垄断了大海的资源，独占了鱼盐的财利。大夫田氏势力大到足可以役使民众，恩惠足可以笼络臣下，所以齐国民众背叛君主而归附田氏。国家大权转移到大臣手中，政权坠入大夫采邑，君主微弱而田氏强盛，沿海运送鱼盐的车子多达三千辆。失去资源根本，其他末事就不可收拾了。如今山川海泽的资源，并不仅仅是云梦泽和孟诸泽。铸铁煮盐，其地势一定是在深山幽谷，为民众所罕至之处。奸诈狡猾之徒往来于深山大海之间，恐怕他们会生出大乱。他们凭借财利而骄傲自满，破坏了朴实风气，助长了虚假作风，这样重视农业根本的人就更少了。大农令属官盐铁丞东郭咸阳、孔仅等人上书请求：‘希望招募百姓自己出钱，用官府提供的器具煮盐，再由国家收购，以杜绝虚浮作假的门路。’由此看来，盐铁禁令意义深微，主管官员的考虑非常深远啊。”

文学说：“主管官员考虑深远，而权豪家族私利却靠近了；盐铁禁令意义深微，而僭越奢侈的风气却更加明显了。自从朝廷设置兴利的官员，盐铁、酒榷、均输三项官营事业兴起，富贵人家，如同风起云涌般弥漫到道路之上，车轮轴在路上互相撞击。他们攘弃国家法令，伸张私人利益，广泛占有山林川泽，垄断官方集市，不仅仅是大海的鱼盐而已；他们执掌国家权柄，肆行海内，不仅仅拥有田常、陪臣的权势而已；他们的权威比晋国六卿还重，他们的财富比陶朱公范蠡、卫国子贡还多，车马服饰超过王公大人，宫室建筑超越了制度规定。他们收购成片的宅第，隔绝闾巷的公共通道，楼阁间架空的通道交错连接，足可以游览观赏；在宅第之内开凿水池，修建曲折的通道，足可以驰骋追逐；在深池钓鱼，放纵狗兔赛跑，驯兽取乐，举鼎较力，踢球斗鸡；中山美女在堂上弹奏曼妙的歌曲，巴俞舞女在堂下伴随鼓点跳起舞蹈；妇女穿着轻软的丝绸衣服，婢妾拖曳着细葛麻布的长裙；子孙们车马成行，往来打猎，捕捉鸟兽，身姿敏捷矫健。所以耕田的人放下锄头而不再勤苦，百姓人心涣散而松懈怠惰。为什么呢？自己这样做了，别人也就跟着模仿，僭越奢侈，相互仿效，风气甚嚣尘上，不能停息，这就是百姓滋长作伪而很少归于农业根本的原因。”

大夫说：“官大的人俸禄优厚，根深的树枝叶茂盛。因此周文王有德而子孙接受封赏，周公为相而伯禽富贵。湖水深广，鱼就肥大；父亲位尊，儿子就高贵。《春秋公羊传·僖公三十一年》说：‘黄河、大海滋润千里。’盛大的恩德普及四海，何况他的妻子儿女呢？因此丈夫在朝廷显贵，妻子就在家里尊贵，富有是美好的事，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说：‘君王与常人相同，而他那样阔气，是地位使他如此。’处于平民之列，而指望自己的子孙出将入相，这是希望跛脚的人赶上善跑的楼季，无钱而想得到千金珍宝，这不是痴心妄想吗？”

文学说：“大禹、后稷起于布衣平民，他们想到天下有不得其所的人，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推到沟中，因此出来辅佐帝尧，大禹平治水土，后稷教民稼穑。他们以天下为己任，对此那样看重，怎么能说食用俸禄仅仅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呢？食用万人劳动所得的俸禄的人，应该蒙受百姓的忧患，分担百姓的劳苦。一个人失职，一个官员不称职，都可以看作是公卿的过失。因此君子当官，是为了实行仁义，不是享受当官的权势。接受俸禄可以用来养贤，而不是谋取私利。看到贤才不应该隐瞒，食用俸禄不是独享，这就是公叔枝谥号为“文”，魏成子被称为贤人的原因。因此周文王施行仁德而后子孙封赏，天下人并不认为他偏袒亲属；周公大功告成而后接受封赏，天下并不以为他贪婪。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。父母亲戚之间互相推荐，朋党之间互相推举，父亲高官尊位，儿子在家骄傲自满；丈夫在朝廷显贵，妻子在外接受请托。没有周公的美德却有周公的富贵，没有管仲的功劳却有管仲的奢侈，因而平民奢望得到卿相富贵，跛脚之人希望疾步如飞。”

## 刺复第十

大夫本来希望从文学、贤良之处得到舆论上的支持和兴利妙计，但却受到文学、贤良的严厉批评，为此他深感失望，于是反过来批评文学、贤良装饰外表，冒充贤能，扰乱现实政治。对此，文学予以回复反击。文学尖锐地指出，当世在位的公卿，既不能像燕昭王那样礼贤下士，也不能像《鹿鸣》那样娱乐贤才，反而像臧文仲、子椒一样嫉贤妒能，以自己高官厚禄蔑视贤才，因而不可能求得贤士为其所用。

大夫于是脸色严肃而心中不快，说：“赋闲在家的人不知道背负肩挑人的劳苦，站在旁边议论的人与当政者有着不同的忧愁。当今处于天下中心的京师，诸侯都聚集到这里，内地和边境都没有安定，我的心中惶惶不安，如同乘船渡过大河，遭到风雨而未到岸。所以日夜思念国家的用度，躺在床上睡不着，肚子饿了忘记吃饭，各种统计数字萦绕在心头，成千上万的事情在心中掂量。丞相史见识短浅，不值得与他们谋划，独自郁闷找不到治国大道，我想着早一点见到你们文学，如同等待周公、邵公和盼望高子一样。御史到各处郡国考察，选拔孝廉，举荐贤才，每年都有不少。如今贤良、文学六十多人到来，带着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的学术思想，尽情发表意见，纵论天下大事，应该能够发表闪光的思想，启发我的蒙昧；可是你们只相信古代，言论不符合当今需要，称道古人而不合当世之务。看来究竟是我们不足以知道高士？还是你们装饰外表、冒充贤能以扰乱现实呢？贤士为什么这么难以看到呢！自从千乘人倪宽因为治《尚书》而位在九卿之上，到今天耳闻目睹你们这些被选拔举荐的文学、贤良，提拔儒生参与政事，地位十分显达，然而没有看到出类拔萃的人，能够为朝廷兴利除弊建立功业。”

文学说：“鲁班制作木材时，端正圆规和曲尺，使榫眼和榫头准确配合。师旷调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个音调，准确地弹奏出黄钟、太簇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亡射六个阳律而曲调和谐。当代的工匠，不能使榫眼与榫头准确配合，于是就修改圆规和曲尺；乐师不能协调乐曲声音，于是就改变旧的音律。所以榫眼和榫头乖谬而不相符，声音不合拍不和谐。举起圆规曲尺就知道该怎么合适，吹奏定音的调子就知道音乐节奏的变化，这是上等水平；因循守旧而不创新，等待合适的人，这是次一等水平。所以曹参当丞相时每日饮醇酒，倪宽大夫闭口不说话。因此治理任务重大的人不可以烦琐，烦琐就会导致混乱；治理任务小的人不可以懈怠，懈怠就会荒废工作。《春秋》说：‘执政气魄宏大，宏大可以担任卿相。执政严厉苛刻，苛刻只可以当百姓。’执政纲领不明确，礼义不实行，这是公卿应该担忧的大事。案上的公文，定期上报的事务，这是丞相史的责任。《尚书·皋陶谟》说：‘贤才当官，同僚向他学习，百官按时完成任务，诸位官员都和谐。’说的是官府得到合适的人选，人人胜任自己的工作，因此官府得到治理而不紊乱，事业兴旺而不荒废，士人遵守各自的职责，大夫治理分内的工作，公卿总理大事、掌握大略而已。因此任用贤能的人，责其完成任务，自己不会劳苦；只信任自己的人导致事业荒废，没有功效。齐桓公对于管仲，只是耳听他说，眼看他做。因而君子在求贤时辛劳，在任用贤人后一劳永逸，怎么能说是懈怠呢？从前周公当宰相，谦卑而不吝啬，慰劳天下的贤士，所以贤才满朝，贤智满门。孔子没有爵位，他以布衣身份，让七十多个才士跟随他，这些人的才能都可以担任诸侯的卿相，何况处于朝廷三公的尊位来培养天下贤士呢？如今凭着公卿的上等职位，美好的爵位和俸禄，却不能招致贤士，那就说明缺少进贤的措施。唐尧推举虞舜，尊为上宾，将女儿嫁给他。齐桓公举荐管仲，尊为上宾，拜他为师。唐尧以天子之尊，将女儿嫁给平民，这可以说是亲近贤人了。齐桓公以诸侯之尊，拜平民为师，可以说敬重宾客了。所以贤才从之如流水，归附毫不迟疑。如今在位的公卿，既不能像燕昭王那样礼贤下士，像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那样娱乐贤人，又亲身施行臧文仲、子椒的做法，嫉贤妒能，抬高自己的才智，诋毁他人的才能，自满自得，不肯向他人请教，轻视贤士，不愿与贤士做朋友，倚仗自己的地位，凌驾于贤人之上，以自己优厚的俸禄在贤士面前骄傲，却要求士人为己所用，这当然是很难的了！”

大夫深思不说话，贤良长长地叹息。御史上前说：“姜太公辅佐周文王、周武王称王天下，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。因此贤才得到官位，如同蛟龙得水，腾蛇兴云驾雾。公孙弘丞相向已故武帝讲述《春秋》，很快被提拔到三公地位，处于周公、邵公当年的位置，占据驾驭万里的势位，成为天下榜样，他不穿两种以上色彩的衣服，不吃多种味道的饭菜，为天下人做出表率，但对治国并没有多少益处。博士褚泰、徐偃等，承奉皇帝英明的诏令，树起使者符节，乘坐驿站的车辆，巡察各郡国，举荐孝廉，勉励百姓，但流俗并没有为之改变。征招察举贤良、方正、文学之士，破格提拔官爵，有的人升为卿大夫，难道不是像燕昭王那样提拔贤士，像周文王那样广延贤才吗？然而没有看到这些人建立了什么功业。恐怕这些贤才并不是龙蛇之才，也不是《鹿鸣》诗中所娱乐的那些贤士吧。”

文学说：“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，太阳和月亮不会同时大放光明。在公孙弘时代，君主正在设计谋略，留意外伐四夷，因此权术诡诈的谋略得到采纳，能征善战的将士得到重用，有的将帅封爵诸侯食用采邑，克敌俘获的将士都受到厚赏，所以奋勇杀敌的勇士由此兴起。后来，战争无休无止，军队相望于道路，披甲将士疲惫不堪，朝廷费用不足，因此设置险阻关卡、兴办财利之臣得到重用，像姜太公那样垂钓磻溪的韬略之士只好退隐。疏通泾水、渭水，开凿沟渠，以便打通水运通道，东郭咸阳、孔仅建议盐铁官营，策划各种兴利措施，有钱人购买官爵，用钱赎罪免刑，国家开支费用越来越多，经管官员营私舞弊，从上到下都谋求利益，百姓痛苦不堪，消耗凋敝而又不得不服从法令，因此刻薄严酷官员得到进用，而关于知情不报、执法不力的法令出台。杜周、减宣之流，凭借严峻的法律条文办理案件的官员显贵，而王温舒之徒凭借狂捕滥杀显达。希望依据仁义、以正道事奉君主的人很少，阿谀奉承，讨上司欢心的人众多。只有一个公孙弘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## 论儒第十一

本篇围绕如何评价儒学展开论辩。御史认为，孔子和儒家对改变现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孔子维护君臣大义，但他的弟子冉求、子路却当了季孙氏家臣，孔子讲男女之礼，但他却通过奸臣弥子瑕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，这些都说明孔子言行不一。对此文学指出，孔子和儒家无法改变现实，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权柄；孔子见南子，其本意是为了拯救乱世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儒家经学成为汉家意识形态，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身为汉朝官员的御史，却肆无忌惮地攻击儒学，诋毁儒家祖师孔子，这一现象表明，即使在儒学定为一尊之后，它也没有化为整个汉家的思想，汉朝思想统治远不如想象中那样严密。

御史说：“文学宗奉、称述仲尼，称颂孔子之德，以为从古到今，未曾有过孔子这样的杰出人物。然而孔子在鲁国、卫国之间宣讲儒道，在洙水、泗水之上从事教化，弟子并不为之变化，当世并不为之变为大治，鲁国削弱越来越厉害。齐宣王褒奖儒学，孟轲、淳于髡之徒，接受上大夫的俸禄，不任实职而专门议论国家大事，齐国稷下先生大约一千多人。那个时候，并非只有一个公孙弘。弱小的燕国进攻齐国，乐毅率兵长驱到齐国都城临淄，齐湣王弃城遁逃，死于莒地而不能拯救。齐王田建被秦国俘虏，齐国儒生与齐王一起被俘而不能保存齐国。照此看来，儒家安定国家尊奉君主，是不曾有过实际效果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没有马鞭，即使是造父也不能协调四马拉的车。没有权势地位，即使舜、禹也不能治理万民。《论语·子罕》载孔子说：‘凤鸟不飞来，黄河不出现画图，我这一生要完了吧！’因此用一匹马拉的小车，无法奔驰；圣德仁义，无处施行。齐威王、齐宣王时期，举荐贤能，进用才士，国家富强，威震敌国。到了齐湣王，继承发扬齐威王、齐宣王两代遗留的功业，向南攻克楚国的淮北，向北吞并强大的宋国，征服十二个诸侯国，向西挫败赵、魏、韩三晋之国，打退强秦的进攻，燕、赵、韩、魏、楚五国宾服听从，邹国、鲁国的君主，泗水边上的诸侯都入朝称臣。可是齐湣王无休无止地夸耀战功，百姓忍受不了他的统治。诸位儒生劝谏，齐湣王不愿听从，于是各自分散，慎到、捷子逃亡而去，田骈到了薛地，而孙卿入楚为兰陵令。齐国内无良臣，因此诸侯合谋讨伐齐国。齐王田建听信谗言，误信秦国的反间计，采用国相后胜的计谋，不与山东诸侯合纵，导致亡国。他被秦国所俘虏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”

御史说：“伊尹以宰割烹饪来事奉汤，百里奚以喂牛结交秦穆公，开始是偶然遇合，获得信任之后，伊尹与商汤、百里奚与秦穆公才成就了王道或霸道事业。这样，什么言论不听从？什么思想学说不能施行？因而商君用王道游说秦孝公，孝公不听用，商君就用强国之道来游说，最终成就功业。邹衍用儒家学说游说当时诸侯，不为诸侯所用，他就以阴阳变化、五德始终的理论去游说，最终得以扬名。因此马只要日行千里，不一定非要匈奴、代地所产。士人贵在能够成功，不一定非要华美的文辞。孟轲只知道坚守唐虞三代旧的道术，不知当世要务，因而在梁、宋受困。孔子只能方不能圆，因此在黎丘挨饥受饿。如今近代儒生勤于修德，不时陷入困窘，说不困窘就不行。自周王室以来，到现在有一千多年，你们所称颂的只有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、周康王，如果讲起道理就一定要参照文、武、成、康其中的一个，拿人们所比不上的圣王而加以称颂，如同跛脚人能谈论远方却不能行走一样。圣人殊途同归，有时行走，有时停止，但最终的趋向是一致的。商君虽然改革法律修改教化，但他的志向在于强国利民。邹衍的著作，讲阴阳变化之术，但最后归于仁义。宋国国相祭仲自我贬损以行使权变，这是特定时势的产物。因而小弯曲大正直，君子是可以做的。如今你们固执地坚守儒家一家之说，像尾生那样行事，如此看来，晋文公通过诡诈手法主盟诸侯来尊重周王室不足称道，管仲蒙受耻辱来保存亡国也是不值得称赞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伊尹求合于汤，是因为他知道汤是一位圣明君主。百里奚归附秦国，是因为他知道秦穆公是一位明君。伊尹、百里奚二人能知道商汤和秦穆公，他们的决策是平时在心里就已经想好的，并不是在昏暗之中糊里糊涂地决定大事。《论语·子路》载孔子曰：‘名分不正就会语言不顺，语言不顺就导致事情办不成。’怎么能随便迎合以成就霸主和帝王大业呢？君子执持道德，遵守道义而行动，在仓促之间不忘道德仁义，在颠沛流离之间不忘道德仁义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载孟子曰：‘在当今之朝做官，不能改变社会恶俗，即使拥有千辆兵车的权势，这官一天也不能做。’宁愿住在陋巷穷困饥饿，怎么能改变自己而随从世俗变化呢？阖庐派刺客杀死吴王僚，公子季札离开国都，到延陵去隐居，终身不进入吴国都城。鲁宣公杀死公子赤，叔眄退位隐居，不食鲁宣公俸禄。亏损仁义而得尊位，用不正当手段取得上司欢心，这样的事宁死也不能做。我只听说过当正确道路走不通时，辞职退隐，没有听说过用不正当手段求得上司欢心。”

御史说：“《论语·阳货》载孔子说：‘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，君子是不去的。’孔子有这样的话，但他的行为却跟不上。季孙氏行为无道，驱逐鲁昭公，夺取鲁国政权，而孔子弟子冉求、仲由却做了季孙氏的家臣。《礼记·坊记》说：‘男女之间不直接交接东西，不互相碰杯喝酒。’孔子到卫国，通过卫灵公宠臣弥子瑕去见卫君夫人南子，子路不高兴。弥子瑕，是花言巧语的奸佞之臣，孔夫子依靠他打通关系，这是不正当的。男女之间不打交道，孔子去见南子，这不符合礼的要求。礼义本来是由孔子传授的，可是他却违背道义来求得诸侯欢心，哪里看到他辞职退隐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天下不太平，各诸侯国不安宁，这是英明君王的忧虑。上面没有英明的天子，下面没有统管一方的诸侯领袖，天下烦扰混乱，这是圣贤的忧虑。所以尧忧虑洪水，伊尹忧虑民众，管仲被囚禁，孔子周游列国，都是忧虑百姓的祸患，希望转危为安。因此伊尹背负鼎俎求见商汤，管仲被拘囚而忍辱负重，孔子周游列国志在救世。因而追赶逃亡的人要快跑，拯救落水的人要湿衣。如今民众陷入沟壑之中，即使想不湿衣，怎么能办得到呢？”御史沉默，不再应对。

## 忧边第十二

本篇辩论的主题又回归到边境费用问题之上。大夫强调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、均输平准都是为了补助边境费用，他批评文学关于废除盐铁官营的建议，认为文学不体恤边塞将士，不是边防将士的慈父贤兄。他说征召文学、贤良议政，本来是希望从中获取有益的建议，谁知文学、贤良的主张不上天就入地，根本不切实际。大夫还从孝义立论，认为盐铁官营等政策都是汉武帝旧政，嗣主不应该改变君父政策。文学坚持修文德以来远的立场，认为只要对匈奴“加之以德，施之以惠，北夷必内向，款塞自至，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，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”。显然，这只是文学的一种美好理想。

大夫说：“文学说过：‘天下不太平，各诸侯国不安宁，这是英明君王的忧虑。’因此君王之于天下民众，如同住在一室之中的家人，如果室内有一个人不得其所，君王便为此闷闷不乐。因此，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拯救，就不能算仁惠之君。国家有难而不感到忧虑，就不是忠臣。坚守气节，为国死难，是人臣的职责。给饥寒的儿女提供衣食，这是做一个慈父的道理。如今战士们在边塞征战劳苦，皇上为此日夜不能安宁，群臣尽力议论，策划增加国家财政收入。因此少府属官请求建立酒类专卖，以便补足边境费用，供给前方战斗将士，从灾难中拯救民众。作为他人的父兄，岂可以不闻不问！在家里节省衣食以救济在外的战士，尚且不够，如今你们又想废除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、均输平准，减少供给边境费用，你们不能算是慈父贤兄。”

文学说：“周朝末世，天子力量微弱，诸侯互相以武力征讨，因此各国君主为之不安，谋臣纷纷奔走游说。为什么呢？敌国众多而社稷危险。如今九州同在一个中国，天下一统，陛下在宫殿内悠闲自在，浏览群臣奏章上的恳切言论，在宫内吟咏《雅》、《颂》，在宫外乘坐铃铛和鸣的马车，纯美的德行光辉灿烂，与唐尧、虞舜相提并论，功业流传到后代子孙。那些蛮荒异族，不毛之地，有什么值得烦恼焦虑，而有战国时期的忧患呢？如果陛下不嫌弃，赐予恩德，施加仁惠，那么匈奴一定会内向中国，敲开塞门，自己来朝归附。然后把匈奴当做塞外之臣加以控制，这样匈奴就到老也不会后悔他们归顺的行为了。”

大夫说：“圣明君主思考中国尚未安宁，北部边境未能安定，委派前任廷尉王平等人慰问民间疾苦。帮助贫贱民众，接济衣食不足的人。群臣所宣扬英明君王的圣德，安抚天下，尚未得到要领，因此询问诸位儒生。诸位儒生的建议不上天就入地，想用治理乡村的办法，来比况国家大事，这也太不近情理了！来自农村，出于穷巷，如同夏蝉不知冬天冰水的寒冷，好像喝醉了酒刚刚醒过来一样，根本不值得与你们讨论。”

文学说：“希望安民富国的途径，在于返回根本，根本确立了，路径就形成了。顺应天理，遵循地利，就不必劳苦而大功告成。如果不追寻源头而抓末流，缺乏根本来统领，即使竭尽精神，耗尽思虑，对于治国也是无益。希望安定却恰恰带来危险，希望拯救却恰恰带来失败。国家治乱的关键，在于分清根本与末枝而已，不必劳心就可以得到治国之道。孔子说：‘不明道理的人很难与他讨论治国，信奉不同治国道理的人，不能在一起互相商量国家大事。’如今公卿思想有所偏向，因而文学的主张，不被公卿采纳。”

大夫说：“我听说作为人臣应该尽忠尽职，作为人子应该尽孝来继承父业。君主有过失，臣下应该予以掩盖。父亲有过失，儿子应该予以隐匿。因此君主去世，臣下不改变君主的政策。父亲去世，儿子不改变父亲的主张。《春秋公羊传·文公十六年》讥刺鲁文公拆毁鲁庄公建筑的泉台，因为鲁文公毁坏先祖所建泉台，是在宣扬君父的过恶。如今盐铁官营和均输，由来已久，你们却想废除，岂不是要妨害已故武帝的功业，而伤害当今圣明君主的仁德吗？主管官员偏向于忠孝之路，这就是由于我们道路不同，所以与文学的主张不同。”

文学说：“聪明的人根据时势而变化，智慧的人随当世情况而制定措施。《论语·子罕》载孔子曰：‘礼帽用麻料来织，这是合于礼规的，今天大家都用丝料，这样省俭些，我同意大家做法。’因此圣人崇尚贤德不离开古礼，顺应时俗而不偏向迎合时宜。鲁定公重新排列祖庙的昭穆次序，理顺祖庙位置；鲁昭公废掉鲁襄公设置的中军卿士，以便减少事务，节省费用，这不能说是改变了祖先的行为，背离了父辈的成规。秦二世胡亥扩建阿房宫以继承秦始皇功业，赵高增设秦朝法令以提高自己权威，他们都不能算忠臣孝子。”

# 卷三

## 园池第十三

本篇记载大夫与文学在天子诸侯园池存废问题上展开的论争。从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中，我们看到汉代天子诸侯的山林苑囿是何等富丽壮观。这些园林池苑既满足天子诸侯的游乐田猎需求，同时园池的经营收入又作为天子诸侯的“小金库”，用来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。文中大夫陈述朝廷经营园池山海的经济意义，认为罢园池会导致国家财政困乏。文学则主张制民之产，维护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方式，要求朝廷将园池还归于民，朝廷所做的仅限于征收赋税，认为这样做会使上下丰饶，避免出现国富民穷的现象。

大夫说：“诸侯以封国为家，他们所忧在封国之内。天子以八方之极为边境，他的忧虑在国都之外。因此国土面积小的诸侯费用少，功用巨大的天子费用多。所以朝廷广开园林池苑，委派官员统一管理山林河海，获取财利来弥补赋税的不足，朝廷组织民众修筑沟渠，设立太仓、均输、平准、都内等各种农官，拓展田园牧场，增设畜养禽兽的苑囿。太仆、水衡、少府、大农各位农官，他们每年征收的各种赋税收入，加上田园牧场的财利，陂池禁苑出租的租金，以及北边设置屯田官的收入，全都用来供给国家各项开支，如此尚且不够。如今文学想取消园池，这将会断了国家的财源，杜绝了财富流通，上下财路一起枯竭，国家贫困效应随之而来，即使努力减省事务，节省费用，又怎么可以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候，朝廷制定田地制度，足以养活民众，民众足以供奉上司。拥有千乘兵车的诸侯国，方圆百里的土地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诸侯，各自都能满足生活欲求。秦王朝吞并山东六国土地，拥有四海财富，可是秦始皇之意并不满足，这并不是因为国土狭小，费用不足，而是由于秦始皇嗜欲太多，民众不能承受他的欲求。谚语说：‘宫廷厨中有腐肉，国内路边有饥民，宫廷马厩有肥马，道旁却有饥饿人。’如今朝廷狗马的饲养，鸟兽的喂食，岂止是腐肉肥马的费用呢！无用的官吏，不急需的工程，荒淫奢侈之风变化多端，没有功劳却从朝廷领取俸禄的人太多，因此朝廷财用不足，底层民众生活困乏。现在朝廷不减除造成财政不足的本源，却想从园池末节上求得富足，设置机构兴利，开辟牧场养畜，与百姓争夺饲养草料，与商人争夺利润，这不是用来宣传君主恩德、辅助国家的正确之道啊！男耕女织，自古是天下的大业。因此古代划定区域让民众居住，制定田亩制度让民众耕种。所以产业上没有不曾耕种的土地，国家没有不务正业的民众。现在朝廷广泛开辟苑囿、公田、池泽，公家有鄣塞、出租的名义，而利益却归于权贵私人家族。右扶风、左冯翊、京兆尹三辅靠近华山、黄河，土地狭小，人口众多，四方人众集中到京师，粮食柴火，不能满足。朝廷将公田转租，桑树、榆树、蔬菜、水果不能得到充分种植，地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。我认为朝廷这些政策错了。先朝皇帝所开辟的苑囿、池陂，可以将它们归还给民众，朝廷只需征收租税而已。转租公田，与征收赋税，虽然名称不同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这样做，那么匹夫的气力，都会全部用在田地之上，匹妇的气力，就会全部用在纺织之上。田野得到开辟，丝麻得到纺织，那么国家和民众都会丰饶，哪里会有财用困乏的现象呢？”大夫默不出声，看着丞相、御史。

## 轻重第十四

汉武帝时期为了充实国库，采用桑弘羊、东郭咸阳、孔仅等人提出的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、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，这些政策继承并发展了此前的轻重思想。本篇就如何评价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展开辩论。御史认为，汉武帝政策开辟山林川泽的财利，各种货物越来越丰富，朝廷经费充足，民众生活不再困乏，农业根本和工商末业共同获利，上上下下都很富足。同时，这些政策可以抑制豪强，缩小贫富差距。文学则认为，礼义是立国的根基，而权势财利是为政的残贼，不推崇仁义就无法教化民众，不大力务农就无法使国家富强。实施这些政策的结果，是贫者愈贫，富者愈富，根本起不到平均财富的作用。朝廷将国家财富用于开拓边境，导致中原民众为徭役所困苦，边境民众则苦于戍守防御，实在看不到盐铁官营给民众带来什么福利。

御史上前说：“从前姜太公被周武王封于营丘，是靠开垦荒地才住下来。齐国土地浇薄，人口稀少，太公于是打通发展工商业的途径，充分发挥妇女精巧的手工技能。所以邻国都与齐国进行交易，财富物资不断增长，齐国世世成为强国。管仲辅佐齐桓公，继承先君太公的事业，实行价格轻重随物资供求关系而变化的政策，南边征服强楚，称霸诸侯。如今大夫君继续推行姜太公、齐桓公、管仲的轻重之术，统管盐铁，开辟山林川泽的财利，各种货物越来越丰富。所以朝廷经费充足，民众生活不再困乏，农业根本和工商末业共同获利，上上下下都很富足，这是朝廷筹划所带来的，并不是光靠种田养蚕专搞农业所能取得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礼义是立国的根基，而权势财利是为政的残贼。《论语·里仁》载孔子曰：‘能够以礼让治理国家吗？这有什么困难呢？’伊尹、姜太公凭借商、周百里封地使其君主兴盛，管仲独得齐桓公信任，凭借千辆兵车的齐国，却不能臻于王道，这是由于他所采取的措施不对。因此功名毁坏，主张不能实现。那个时候，诸侯不能以德施政，一个个争权夺利，所以凭借权势互相倾轧。如今天下合为一家，怎么还追逐工商末利呢？怎么还追求工艺技巧呢？大夫君用尽心计，策划国家费用，构怨诸侯，加上酒类专卖，东郭咸阳、孔仅又提议增设盐铁官营，江充、杨可之流，各自以其犀利的锋芒，谈论工商末利之事，可谓明察秋毫，没有丝毫漏洞。这些措施比起管仲设置九府，搜刮山海财利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然而国家衰弱损耗，城郭空虚。因此不推崇仁义就无法教化民众，不大力务农就无法使国家富强。”

御史说：“水中有猵獭而池鱼遭殃，国家有豪强而平民吃亏。因此茂密的森林之下没有丰茂的百草，大土块之间长不出好苗。治理国家的方法，在于除掉污秽，锄去豪强，这样百姓才能财富平均，各安其居。张汤廷尉制定律令，严明法律来绳正天下，诛灭奸诈狡猾之人，杜绝兼并之徒，强者不再欺凌弱者，人多的不再欺负人少的。大夫君运筹策划，设立增加国家财用的机构，统一管理天下盐铁等财利，来排斥富商大贾，允许民众用钱买官赎罪，减损有余，补助不足，以此来平均百姓财富。所以军队东西征伐，赋税不增加而军费充足。损害豪强、有益平民的事，贤明的人可以看到，并不是众人所能知道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扁鹊按脉搏而知道疾病产生的原因，体内阳气盛，就减损阳气而调高阴气，体内寒气盛，就减损寒气而调高阳气，所以气脉调和，而邪气在体内无所容留。笨拙的医生不知道脉理的分布和血气的阴阳区分，胡乱针刺而对疾病无益，只是伤害肌肤而已。如今朝廷希望减损有余，补助不足，但现实是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。严法酷刑，希望以此禁止残暴和奸诈，但奸诈仍然没有停止。料想你们所用的不是扁鹊所用的石针，因而一般人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。”

御史说：“周朝建国，大约有一千八百多个诸侯。后来，强国吞并弱国，大国兼并小国，到战国合并为山东六国。六国之间连年作战，构祸长达数百年，在华夏内部彼此要抗拒敌对国家，对外要驱逐四方夷狄。从中看到，虽然军队不休战，战争很频繁，但军费及时供给，国家仓库充实。如今凭借天下的富庶，海内的财富，一百多个郡国的进贡，汉家不再只是齐国、楚国当年的积蓄，或赵国、魏国的库存了。量入为出，即使急需支用，应该没有财源枯竭的时候。大司农等官员按照古代传统亲身体验耕稼，效法后稷的功业。军队四方出击，军事费用难以为继，这难道不是因为自然资源缺少吗？用针石治疗，调和阴阳，平均有无，补助不足，难道也做错了吗？上大夫君以治粟都尉身份兼管大司农政事，用针灸治疗滞积，使全身血脉流通，所以万物流通，而朝廷富裕充实。在这个时候，四方征讨暴乱，车马盔甲的费用，克敌俘获的赏赐，按照亿万来计算，全都由大司农供给。这是扁鹊的功力，是盐铁官营带来的福利啊。”

文学说：“边塞郡县处于山谷之中，阴阳不和谐，天寒地冻，大风卷起盐碱土，沙石凝积，土地情势没有任何优越之处。中国处于天地之中，是阴阳汇合之处，太阳月亮经过它的南方，北斗星、北极星出于北方，拥有万物和谐的气候，生产孕育万物。如今离开中原而去侵夺边境地区，大力开拓寸草不长的寒苦之地，这如同抛弃江岸河滨，却到山岭斜坡和沼泽地去耕种。转运仓廪中储蓄的粮食，快速运输国库中的钱财，来供给边境民众。中原民众为徭役所困苦，边境民众则苦于戍守防御。在边境即使是努力耕种也抵不上买种子的费用，没有种植桑麻的利益，必须仰仗中原丝绸棉絮而后才有衣穿，乱糟糟的皮袄，不足以遮盖形体，夏天脱不掉夹衣，冬天不离窑洞，父子夫妇躲藏在小屋土房之中。里面和外面一片空虚，扁鹊又有什么功力？盐铁官营又带来什么福利？”

## 未通第十五

本篇题名“未通”，取自文中“未通于计”一句。御史认为中国人多物薄，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源，汉武帝外伐四夷，可以有效地利用四夷的资源。国家实行三十税一，较古代什一之税明显减轻，服役年龄从古代二十岁，放宽到二十三岁，显然比古代更为宽松，经济负担和徭役并不算重，至于有些人陷入饥寒，是由于他们懒惰的缘故。文学指出，外伐四夷破坏了民众和平安宁的生活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，百姓虽然努力耕作，但仍然免不了饥寒，加上豪强与恶吏的欺压，民众不得不四处流亡。从双方观点来看，朝廷官员与文学、贤良对现实状况的认知差距甚大。

御史说：“内地郡县人口众多，水源饲草，不能满足，地理条件温湿，不适宜牧养牛马。民众脚踩耒锄而耕作，背负肩挑而出行，疲劳而少功。所以百姓贫苦，仍然衣食不足，年老体弱的人在路上拉车，而列位卿大夫有时乘坐牛车。孝武皇帝平定百越，把它当作园圃；驱逐西羌、匈奴，把它当作苑囿；所以珍稀怪异的物品，充实于后宫；北方的敆旂，杂交的晊晇，养满宫外马棚，百姓无不乘坚车，驾良马，而民间吃厌了橘子和柚子。由此看来：边境郡县带来的利益真可谓丰饶了！你们却说哪里有什么福利？真是不懂得治国大计呀！”

文学说：“大禹平治水土，勘定九州，四方各以土地所生物产贡献中央朝廷，足可以充实宫室仓库，满足君主的欲望。万里肥沃的土壤，山林川泽的财利，足可以使百姓富裕，不必等待蛮荒之地和远方异物而财用充足。我听说以前没有征伐匈奴、百越的时候，徭役赋税很少而民众富足，穿得暖，吃得饱，收藏新谷，食用陈谷，布帛够用，牛马成群。农夫用马耕地或拉车，而民众没有不骑马乘车的；那个时候，退回战斗的跑马，用马粪肥田。到了后来，军队屡次出动，战马不足，于是母牛母马都被编入队列，因此有小马驹、小牛犊出生在战场之上。六畜不能在家喂养，五谷不能在田野里种植，民众连糟糠都吃不饱，哪里有什么吃够了橘子、柚子呢？《传记》说：‘大的战争之后，连续几代都不能恢复元气。’如今各个郡国，田野虽然有田埂但无人耕种，城郭有房屋但无人居住，哪里有什么边境郡县丰饶呢？”

御史说：“古时候，规定田地一百步为一亩，民众按照井田制而耕种，交税十分之一。按照道义先种公田而后种私田，这是臣民应尽的职责。已故武帝怜悯百姓的愁苦，衣食不足，规定田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，交税大概是三十分之一。懒惰的民众不从事农田耕作，挨饥受寒，本是理所当然。他们不耕地而想播种，不种植而想收获，盐铁官营又有什么过错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交纳十分之一的税，是根据民众的经济实力。无论是丰年还是歉年，国家都与民众同甘共苦。民众欠收，君主不会独自富有；民众富有，君主不会独自缺乏。所以说，十分抽一的税，是天下公平合理的税赋。虽然现在税收是三十抽一，但那是以田亩的多少为标准，丰年粮食到处都是却收税很少，凶年饥荒却一定要交足税赋。加上人口税、按期轮换的徭役，大抵一人的劳作收入，税收要占去一半。农夫全部交出他的劳动所得，有时甚至需要通过借贷来补足。所以百姓努力耕作，还免不了饥寒交迫。修筑城墙的人先要加厚地基，而后再把城墙筑高，治理民众的人先使百姓家业厚实，而后求得民众的丰足。《论语·颜渊》说：‘百姓富足了，国君怎么会不富足呢？’”

御史说：“古时候，诸侯互相争强，战国七大诸侯并起，战争无休无止，民众荒废了田地耕种，但十分之一的税，还是要按照常规交纳。如今依赖陛下神明，很久没有打仗了，然而民众并没有完全下到田地去干活，以人口总数与耕种田地总数进行比较，耕种田地的数量是不够的，国家拿出仓库中所有粮食来赈济贫困，朝廷利益被侵害日益严重，所以民众越来越懒惰，仰仗朝廷救济。做这样的君主也太辛苦了，反而要亲自为民众操劳。民众却忘恩负义而远远地流浪逃亡，逃避公家的事。民众互相仿效，田地日益荒芜，租赋收不上来，与朝廷相抵触。国君即使想要富足，谁又与他一起富足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树木屡次迁徙就会枯萎，虫兽迁居就会病亡。因此代马依恋北风，飞鸟留恋故巢，没有动物不留恋出生之地。由此看来，民众并不是从逃避公事之中获利，也不是以流亡为乐事。以前，战事频繁发生，军费不够使用，朝廷于是按照民众财产多少征收赋税，经常是从当地现有民众之中征税，农夫又承受其中的劳苦，因此他们没有全部下地干活。大抵逃税的都是豪强大户，地方官员害怕他们，不敢深责他们交税，于是就更加苛刻地急催小民，小民忍受不了，于是流亡到远方。于是中产人家承担了全部税赋，后流亡的人替先流亡的人服役纳税。安分守己的小民屡次受到恶毒官员的伤害，因此互相仿效，离开赋税最重的地方，逃到赋税稍轻的地方。《传记》说：“政令宽缓，民众肯为上司拼死；政令苛急，父子逃亡离散。’所以田地日益荒芜，城郭空虚。治理民众的方法，在于除去民众所痛恨的东西，顺应百姓安心的东西，安抚民众而不要打扰，役使百姓但不让他们过于劳苦，所以百姓努力耕作，乐于交纳公家税赋。如果像这样，那么君主不必赈济民众，民众也不必仰仗从上面获利，君臣上下互相礼让而歌颂诗乐兴起。因此征税而民众不讨厌，役使而民众不劳苦。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诗中所描写的民众为周文王修筑灵台的场面，并不是朝廷役使民众，而是民众自己乐意为之。如果像这样，那么君主有什么不富足的呢？”

御史说：“古时候，十五岁进入太学读书，参与一些小的杂役。二十岁行冠礼，表示已经成人，参与战事。五十岁以上，血脉充溢阳刚，叫做年老体壮。《诗经·小雅·采芑》写道：‘方叔是元老，体壮有谋略。’因而，商朝军队头发乌黑，周朝军队头发像白茅花。如今陛下怜悯百姓，放宽服兵役、劳役的规定，二十三岁开始服役，五十六岁免于服役，这是用来帮助年纪大而身体强壮的人，让老年人得到休息。青壮年耕种田地，老年人修整菜园，既可以节省劳力，又能抓紧农时，使百姓没有饥寒之忧。民众自己不治理好自己的家室，却去埋怨朝廷，这也太不近情理了。”

文学曰：“十九岁以下青少年去世称之为殇，因为他们尚未成人；二十岁举行冠礼；三十岁娶妻，可以参与战事；五十岁以上称为艾老，在家拄拐杖，不从事出力的徭役，这是为了扶助年幼者和扶养老年人。在乡饮酒的礼仪场合，老年人吃不同的菜肴，这是用来优待老年人，表明养老的宗旨。因而老年人没有肉就吃不饱，没有丝帛就穿不暖，没有拐杖就不能出行。如今五十以上至六十岁的人，与子孙一起驾车、拉车、运输，一起服徭役，这不符合传统养老的精神。古代家中有父母大丧，君主三年不上门叫他服役，这是为了宣传孝道，满足孝子丧亲的悲哀伤痛的心情。君子特别看重而尽心尽力的事情，大概只有父母的丧事吧！如今有的家庭刚刚死人，孝子就要脱下丧服去参加战争，这不是爱民如子、顺应他们孝悌之心的方式啊。当年周公抱着年幼的成王处理天下政事，恩德充满海内，泽惠覆盖四方，何况所有人都含周公之仁、保有周公之德呢，没有人不得到合适的安置。《诗经·周颂·昊天有成命》写道：‘周王日夜操劳，顺应天命，政治宽大宁静。’陛下非常年轻，将政事委任给大臣，公卿辅佐陛下理政，政令教化未能均调，因此引发百姓议论。”御史沉默不语，不回答。

# 卷四

## 地广第十六

本篇围绕要不要开拓边疆而展开辩论。大夫认为，内地与边境安危劳逸不均，边境军队屡遭敌人侵扰，为内地起到了屏障作用，因此将内地的财富调剂到边境是正当的。他进一步指出，汉武帝时期征讨四夷，并不是单纯开疆拓土，而是为了“除寇贼而安百姓”。文学认为，边境不应该成为汉家政治的中心，“地广而不耕，多种而不耨，费力而无功”的现象应该改变。文学的辩论使大夫恼羞成怒，竟然以儒生年薪不到一把米来剥夺文学议政资格，这显示了大夫态度的傲慢和思想境界的低下。

大夫说：“君王兼包并蓄，博爱无私，不因为距离近就加重施惠，不因为距离远就遗漏恩惠。现在都一样是天子的小民，一样是天子的臣下，但是有安有危，有劳有逸，待遇不一样，难道不应当调整吗？你们不考虑边境军民，只是想到内地民众，这也是太好发表议论了吧？边境军民，处于寒苦之地，抵抗强大匈奴的侵扰，烽烟一起，就有丧命危险。因此边境军民经历上百次战斗，而中原民众却能在安静地睡觉，这是因为有边境郡县作为屏障。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说：‘没有不从事王事的，唯独我最劳苦。’这是讽刺劳苦不均啊。所以圣明君王惦记四周边境特别艰苦，出兵击退匈奴和百越，赶走敌寇，消除灾祸，分散中国内地肥饶多余的物资，调剂给边境郡县。边境防卫加强了，中国内地就安全；中国内地安全，就会安然无事。你们还要求什么而不能沉静下来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候，天子居于天下的中心，直辖地区方圆不过千里。诸侯列国也到不了那些不能耕种的地方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，中国统治区域达到五千里。百姓各自供养他们的国君，诸侯各自保有自己的国家，因此百姓劳逸均衡，而徭役不至于劳苦。现在将匈奴、百越击退到数千里之外，道路迂回僻远，士卒疲劳。因而边境民众有被杀头的灾祸，而中原内地有死亡的忧患，这就是百姓愁苦悲伤而不沉静的原因。治国的路线，是由中国内地到边境，从近处开始。近处的亲近归附，然后招来远方之人；百姓内部富足，然后再体恤边疆。因而此前有大臣建议在新疆轮台屯田，英明的君主不允许，认为应该先解决迫切事务，及时加强农业生产。因此皇帝下诏说：‘当今的要务，在于禁止苛刻残暴，制止随意征收赋税，努力务农。’公卿应该秉承皇上意旨，请减除百姓承受不了的负担，以帮助百姓的急需。现在朝廷放下中国内地衰败而不忧愁，却把工作放在边境，料想边境土地虽然广阔但不宜耕种，或者广种而不能锄草，费力而没有功效。《诗经·齐风·甫田》说：‘不要耕种大田，那里只有高深的狗尾草。’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？”

大夫说：“商汤伐夏桀，商武王伐商纣，并不是爱好用兵；周宣王开辟千里国土，并不是贪图侵占土地；而是通过用兵来扫除贼寇而安定百姓。因此没有功德的用兵，圣明君主是不会发动的；无用的土地，圣明君王是不会贪得的。已故武帝发动像商汤、周武王那样的义兵，平定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的边境动乱，北面制服敌人，匈奴都逃跑了。凭借黄河、阴山作为屏障，主动撤离砂石盐碱不能耕种的土地，割让绝险偏僻的地方，将造阳土地丢弃给匈奴，减少偏僻边塞，占据黄河天险，守卫要害之地，以此放宽兵役和徭役，保护将士和民众。由此看来：圣明君主的用心，并不是务必拓广土地来劳苦民众而已。”

文学说：“秦朝用兵，可以说达到顶点了；蒙恬开拓边境，可以说相当遥远了。如今越过蒙恬当年所筑的边塞，在匈奴地域建立郡县，地域更加遥远，民众愈发疲劳。朔方郡以西，长安城以北，新建郡县的修建工程，塞外降城修筑的费用，简直无法计算。不仅如此，司马相如、唐蒙开通西南夷的道路，巴、蜀两郡民众因为开辟邛、筰交通而疲惫；横海将军韩说征讨南夷；楼船将军杨仆戍守东越；荆、楚地区为用兵瓯、骆而疲劳不堪；左将军荀彘征伐朝鲜，开设临屯郡；燕、齐地区为平定秽、貉而劳困；张骞开通特别遥远的西域，带来一些无用的东西，国库收藏的钱财，流向外国；这些开支岂止是割让绝险僻远地方、放弃造阳的费用啊。由此看来：不是君主用心谋划，而是一些多事大臣为朝廷计谋而造成的过失。”

大夫说：“拥有管仲智慧的人，不会担任奴仆的职务。怀藏陶朱公思虑的人，不会居住在贫困的处所。文学能说而不能行，居下位而诽谤上司，身处贫困而非难富有，说大话而做不到，外表清高却行为卑鄙，诽谤他人声誉，妄发议论，以此向当世求取好名声。俸禄不过一束禾一把米的人，不足以谈论国家治理，家产还不到一石粮的人，不足以筹划朝廷大事。儒生们都很贫苦，衣冠尚且不完备，怎么知道国家大政、朝廷之事呢？还侈谈什么绝险僻远、舍弃造阳的事！”

文学说：“卑贱不妨害智慧，贫寒不妨害品行。颜渊屡次困乏，不能说他不是贤人。孔子不能见容于世，不能说他不是圣人。如果一定要凭外貌举荐贤人，按财产多少录用士人，那么姜太公终身只能宰割牲畜，宁戚永远只能喂牛。古代的君子，坚守正道来树立名声，修养身心来等待时机，不因为困窘而改变节操，不因为卑贱而改变志向，只居仁爱之处，只行道义之事。见到财富就想得，见到利益就忘义，不合道义而富有，没有名声而尊贵，仁义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。因此曾参、闵子骞不愿意拿自己的仁义品质去换取晋国、楚国的富有。伯夷不愿意拿自己的品行来换得诸侯之位，所以齐景公虽然千辆兵车，却不能与伯夷争名。《论语·雍也》载孔子曰：‘贤德啊颜回！一竹篮冷饭，一瓢冷水，住在陋巷，其他人忍受不了贫穷的忧愁，而颜回却不改他的快乐。’因此只有仁义的人才能过贫穷的生活，也只有仁义的人才能真正快乐，小人富有就会骄横，贫穷就会无所不为。阳虎说：‘坚持仁义就不能发财致富，要发财致富就不能坚持仁义。’如果遇事都先考虑利益而后才想到道义，那么就会巧取豪夺永不满足。如果公卿积累亿万财富，大夫积累千金财富，士积累百金财富，为了利己便吞并聚敛财富，那么百姓必然贫寒困苦，流离失所，儒生又怎么能使他的衣冠完备呢？”

## 贫富第十七

本篇辩论贫富问题。大夫强调人们获得财富的机会是均等的，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看到财富的智慧和获得财富的能力。他认为拥有财富，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，至于那些连自己生存都得不到保障的人，对社会是没有帮助的。文学则认为，享受俸禄的官员不应该再谋求经商的利益。他尖锐地指出，问题的实质是官员“因权势以求利”，通过权力来谋求财利。文学的贫富观是：“君子遭时则富且贵，不遇，退而乐道。”那种不义的富贵是文学所不愿接受的。

大夫说：“我束发上学，在十三岁时候，幸运地得到皇宫值宿警卫的差事，在皇帝身边供职，逐渐升迁到卿大夫的职位，获得俸禄，蒙受赏赐，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了。车马衣服的用度，妻子儿女僮仆的赡养费用，都是量入为出，过着俭省节约的生活。所得到的俸禄赏赐，都一点一点地筹划安排，逐渐积蓄，发家致富，成就一份家业。因此，分得的土地一样，只有贤能的人能够守住土地；分得的财富一样，只有智慧的人能够筹划生财。当年白圭贱买贵卖，子贡三次成为千金富翁，难道一定都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吗？他们不过是精打细算，在生息亏耗中运转，在物价涨落之中牟利罢了！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候，人们不从事两种事业，经商之利与做官之禄不兼得，这样，各种职业的收入相差不远，而贫富不相悬殊。处于高官厚禄地位而能谦让的人，他的美名多得不可胜举；凭借权势来追求利益的人，他的收入多得不可胜数。占据湖泊沟池的利益，垄断山林河海的财富，割草打柴的人不能与他争一点好处，商贾也不能与他争夺财利。子贡以布衣平民致富，而孔子批评他，况且是以权势地位来谋求利益呢？因此古代大夫思考以仁义来充实官位，而不是为了个人权利来中饱私囊。”

大夫说：“山岳有富饶的资源，然后百姓得到供给。河海有丰富的物产，然后民众获取足够的财利。小池塘的水，不能灌溉大塘大泽；小土坡上的树木，不能用它建成宫室。小不能包容大，少不能满足多。从未有过不能自给自足而能满足他人的人，从未有过不能自我治理而能治理他人的人。因此善于替他人办事的人，一定是能够替自己办事的人，善于治理他人的人，一定是能够治理好自己的人。文学连自己都不能治理，又怎么能治理好身外的事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走远路的人要借助车子，渡江海的人要依靠船只。因而贤士立功成名，要借助外界资源和事物。鲁班能够依靠君主的木材，来构建宫室台榭，却不能替自己建一个狭小的房屋，这是因为他手头的木材不足。欧冶子能够依靠国君的铜铁，来铸造铜炉大钟，却不能替自己铸一个壶鼎盘盆，这是由于他没有铜铁。君子能够借助君主的朝政，来协和百姓，滋润众位平民，却不能使自己家庭富饶，这是由于情势不许可。因此舜在历山耕种，恩惠达不到本乡本土，姜太公在朝歌宰割牛肉，利益达不到妻子儿女，等到他们被重用，恩惠流通八方，德泽充溢四海。因此舜借助尧，姜太公依靠周文王和周武王，君子能够借助道义来修身，不能违背道义而借助钱财。”

大夫说：“道理悬挂在天上，物资遍布大地，智慧的人因此富裕，愚蠢的人因此贫困。子贡通过囤积财物而名显诸侯、陶朱公通过货物增值而在当世获得尊荣。富贵的人与他们交往，贫穷的人接受他们救济。上到国君，下到布衣平民，没有人不感戴他们的恩德，称颂他们的仁义。原宪和孔伋，在他们生活的当世遭受饥寒之苦，颜回在简陋的巷道里屡次穷困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们窘迫地住在土屋里，拘谨地穿着破长袍，即使想借助钱财，施展奸诈谄媚的伎俩，也是不可能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《论语·述而》载孔子云：‘富贵如果值得追求，即使是执鞭驾车的事，我也去干；如果不值得追求，那还是做我所爱好的事。’君子追求道义，不是随便追求富贵。因此孔子批评子贡不安本分而去做生意。君子碰到时运就富贵，如果碰不到时运，就退隐而安贫乐道。不因为利益而连累自己，因而不违背道义而胡乱获取。隐居起来，修行节操，不希望妨害自己的品行，因而不会毁坏名誉而趋炎附势。即使有人把韩、魏的财富给你，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志向，也不愿意接受。富贵不能使他感到荣耀，谤毁不能使他受到伤害。因此原宪的破长袍，比季孙氏的狐貉皮袍还要珍贵；赵盾俭朴的鱼饭，比智伯的肉食还要甘甜；子思的白银佩饰，比虞公的垂棘之璧还要美好。魏文侯路过段干木村庄，伏在车横木上表示敬重，这不是因为段干木有权势；晋文公遇见韩庆，下车小步快走表示敬意，这不是因为韩庆拥有很多财富，而是因为段干木、韩庆富于仁义，具备美德啊。因此，尊贵何必要有财富，只要有仁义就行了！”

## 毁学第十八

本篇辩论由李斯的生平际遇所引发。李斯学于荀卿，入秦拜相，贵极人臣。但后来遭到赵高陷害，身被五刑而死。如何看待李斯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？双方表达了不同看法。大夫赞美李斯“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，切侔伊、望，名巨泰山”，羡慕他“奋翼高举，龙升骥骛，过九轶二，翱翔万仞”的辉煌。文学则认为，李斯不计后果地猎取富贵，“若蹈坎阱，食于悬门之下”，贪图厚禄，羡慕虚荣，导致自我毁灭，实在不值得取法。

大夫说：“心术不正却说得一本正经，自己标榜清心寡欲而实际行动不能跟上，这不正是你们儒生的情态吗？从前李斯与浮丘伯一起拜荀卿为师，不久李斯进入秦国，获取三公尊位，凭借万辆兵车大国的权威来统治天下，地位相当于商朝的伊尹和周朝的吕望，名声比泰山还要巨大；而浮丘伯却住在以破瓮做窗户的简陋草房里，如同涝灾之年的青蛙，叫唤不可谓不厉害，最终死于沟壑而已。如今你们在家不能养活父母妻子，在外没有什么功德值得称道，身处贫贱却好谈仁义，即使满口仁义道德，也没有什么可贵的！”

文学说：“李斯担任秦国丞相的时候，秦始皇信任他，在人臣当中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，然而李斯的老师荀卿为此担心得吃不下饭，因为荀子看到他的弟子将会遭到不可预测的灾祸。浮丘伯喝稀饭，住茅棚，在草屋之中修道，为自己的志向而欢乐，就像住在高楼大厦里吃肉食那样安适，虽然没有显赫的权势，但也没有阴郁的忧虑。晋献公的垂棘之璧，不可谓不美，但宫之奇见到后为之叹息，因为他知道荀息包藏的祸心。智伯拥有大半个晋国的财富，不可谓不强盛，但他不知道赵襄子在打他的主意。季孙氏的狐貉皮袍，不可谓不漂亮，但他不知道鲁君将他视为心腹之患。因此晋献公以宝马作为诱饵引诱虞国和虢国，赵襄子以城墙浸坏来引诱智伯。因而智伯被赵人俘虏，而虞国和虢国最后被晋国吞并，这是因为智伯、虞公一心获利而不考虑后果，贪得土地、玉璧、宝马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载孔子曰：‘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，他的忧患一定会近在眼前。’如今在上位的人，见到利益就不再考虑祸害，贪得利益而不顾廉耻，用利益换取自身生命，用财富换取死亡。没有仁义道德，却有富贵爵禄，如同脚踏在陷阱之上，在悬吊空中的闸门之下吃饭，这就是李斯身遭五种酷刑惨死的原因啊。南方有一种鸟，名叫鹓雏，不是竹子籽实就不吃，不是甘甜的泉水不喝，它飞过泰山，泰山有一只猫头鹰，低头啄食腐烂的老鼠，仰头看见鹓雏，便大叫一声：“吓！”现在公卿倚仗自己的富贵嘲笑儒生，以此习以为常，岂不是像泰山的猫头鹰吓唬鹓雏吗？”

大夫说：“学习是用来防止语言不文明，礼仪是用来文饰粗鄙的行为。因此学习用来辅助行德，礼仪用来文饰内在品质。说话要考虑符合道理，行为要考虑使人高兴。恶毒的语言不说出口，邪恶的行为不涉及自己。动作适应礼义，从容不迫，符合道理。因此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动，用谦逊的态度说出来。所以成天说话，但没有言语过失；终身行动，没有冤仇。如今君主设置官职，建立朝政，来治理民众，区分官爵，划分俸禄，来褒奖贤能，你们却说什么‘悬在空中的闸门’‘腐烂的老鼠’，话怎么说得这么粗野，跟我们所听到的道理完全相反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圣明君主设置官职授予职务，贤能的人才担任；划分爵禄任用贤才，贤能的人才接受。由道义而显贵，不嫌其职务之高；由道义而获取俸禄，不嫌其俸禄之多。因此舜接受尧的天下，姜太公不推辞周朝三公之位；如果不是舜、姜太公那样的人，再微薄的俸禄也会成为对民众有害的人。因而那些道德浅薄而官位很高，力量很小而任务很重的人，很少不遇到灾祸的。泰山猫头鹰啄食腐烂的老鼠，是在穷泽幽谷之中，对人没有有害处。当今的主管官员，盗窃君主财产，在国家刑法旁边享用，不知道悬门的机关正在启动，又以此吓唬别人，其后祸患怎么能与泰山的猫头鹰相比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司马迁说过：‘天下人忙忙碌碌，都是为利益奔走。’赵地女子不选择丑好，郑地女子不选择远近，商人不为耻辱而羞愧，战士不惜拼死作战，士人不关心亲人，事奉君主不逃避祸难，都是为了利禄啊。儒墨内心贪婪，外表庄重，往来游说，奔波劳碌，也是因为尚未得到重用。因此，尊贵荣耀是士人的愿望，富有尊贵是士人的期待。当李斯在荀卿门下的时候，那些卑贱的人与他并驾齐驱，等到李斯奋翅高飞，像龙一样升腾，如骏马一样奔腾，飞上九重天，超过龙和马，在万里高空尽情翱翔，鸿鹄骏马尚且不能与他成为伴侣，何况跛羊、燕子、麻雀之类呢！掌握天下大权，统治全国民众，身后随车有百辆之盛，享用俸禄达万钟之多。而你们这些固执的儒生麻布衣都穿不齐全，连糟糠都吃不饱，并不是你们喜欢吃豆叶，不是你们看不上高楼大厦，只是不能得到罢了。即使你们想吓唬人，你们拿什么去吓唬呢！”

文学说：“君子心怀道德，小人心怀土地。贤能之士为名声而死，贪财的人为利益而死。李斯贪图他所追求的富贵，招致他所厌恶的后果。孙叔敖在事件未发生之前有先见之明，三次失去相位而不后悔，他并不是喜欢卑贱而厌恶高官厚禄，而是考虑祸患深远而避害谨慎。在近郊祭祀天地所用的牛，喂养一周年，披上有花纹的丝绸，被牵入庙堂，太宰手执有鸾铃的大刀，拔下脖子上的毛；这个时候，它希望拉着载重的车子爬上陡坡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商鞅被困在彭池，吴起伏在楚悼王尸体之上，此时他们希望穿着麻布衣住在穷困简陋的茅棚里，也是不可得的。李斯担任秦国丞相，掌握天下权势，连拥有万辆兵车的诸侯都不放在眼里；等到他被关进监狱，在云阳市被五马分尸，即使希望背着柴火进入城东门，走在上蔡县弯曲的街道上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苏秦、吴起因为权势而自取灭亡，商鞅、李斯因为追求尊贵显要而自我毁灭，都是因为贪图厚禄、羡慕尊荣而害了自身。他们身后跟随的百辆车子，也不足以装载他们的灾祸啊！”

## 褒贤第十九

本篇就什么样的人是贤人问题展开论辩。大夫认为，只有像苏秦、张仪这些“智足以强国，勇足以威敌，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息”的人可以称之为贤人，至于像伯夷、尾生这些廉洁守信的，是“由小器而亏大体”。他列举孔甲、赵绾、王臧、主父偃、东方朔等人，批评他们说得漂亮但行为污秽。文学指出，苏秦、张仪以不义得官，最终以不义而亡，绝不是什么贤人。孔甲等人投奔陈胜，完全是秦朝残酷压迫的结果。儒生进退取舍的标准是看是否符合道义：“时然后言，义然后取，不以道得之不居也。”

大夫说：“伯夷因为廉洁而挨饥受饿，尾生由于讲信用而被大水淹死。因为器量狭小而亏损大节，普通平民拘泥于小信用，在山沟里吊死而没有人知道。哪里有什么功名？苏秦、张仪，他们的智慧足可以使国家强盛，他们的勇气足可以威慑敌人，一发怒就使诸侯恐惧，安居下来就可以使天下平息。拥有万辆兵车的诸侯，没有人不向他们弯腰行礼，用谦卑的言辞向他们致敬，献上厚礼请求交往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下名士。智慧不足以与之谋划，而权谋不能左右当世时局，这样的人是下等人。现在你们以无为有，以空虚为充实，穿着布衣破鞋，深沉思考，慢步行走，好像丢了什么东西，这显然不是什么建立功名的贤士，未免是一群世俗庸人。”

文学说：“苏秦以合纵战略在赵国显贵，张仪以连横主张在秦国任职，那个时候，他们不可谓不尊贵，然而智慧人士随后替他们忧虑，知道他们以不符合道义的方法获得进身，必然不以合乎道义的方法终结；不以符合道义的方式获得尊贵，必然不以符合道义的方式失去尊贵。季孙氏、孟孙氏的权力，鲁国三桓的富有，是其他人赶不上的，孔子却称三桓‘衰微’。身为人臣，权力与君主均等，财富与国家相当，这样的人必定灭亡。因此这种人职位越高，罪孽越重，俸禄越厚，罪孽越多。行事的人应该先保全自己而后求名声，做官的人应该先避祸害而后求俸禄。香饵的滋味并非不美好，但乌龟和龙闻到香饵气味之后便深藏水下，鸾鸟凤凰看到香饵后便展翅高飞，因为它们知道香饵对自身有害。那些乌鸦、喜鹊、鱼鳖，吃了香饵之后便狂飞奔走，缩头屈体以求逃避，结果难免一死。现今主管官员盗窃国法，只求进身，不顾犯罪，突然有急难，然后驾车狂奔，快步逃走，终究难免一死。所盗窃的财富不足以赎免妻儿做奴婢，妻子儿女无处逃亡，身陷深牢之中，没有人怜悯探视。这个时候，哪里有时间去嘲笑别人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文学行为高洁，皎洁得好像不可卷曲。美好的节操，洁净的言辞，洁白无瑕，好像不可污染。但是戍守边疆的士卒陈胜放下大车，首先举起叛逆大旗，自己建立大楚之国，陈胜其人平时并没有颜回、仲由以及隐士的言行，也没有宰相大臣的官位。陈胜奋起于大泽乡，不过一个月，而齐鲁儒家、墨家、士大夫这些人，一个个脱掉长衣——长衣就是儒生行礼的礼服——背负孔子的礼器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向陈胜献礼，俯首称臣。孔子八世孙孔甲担任陈胜的博士官，后来与陈胜一起死于陈地，被天下人大为嘲笑。深入潜藏、远走高飞的人原来就是这样的吗？”

文学说：“周王室衰微，礼乐崩坏，不能治理，天下诸侯互相争斗，相继灭亡，到战国兼并为山东六国，战争无休无止，民众不能得到宁静生息。秦国以其虎狼之心，蚕食山东六国诸侯，吞并六国作为秦朝郡县。秦始皇夸耀能力，炫耀功业，自以为功业超过尧、舜，羞与尧、舜相提并论。抛弃仁义，崇尚刑罚，认为当今不必效法文治，而取决于武力。赵高在朝廷内断案，蒙恬在边境用兵，百姓愁苦，同心痛恨秦朝。陈胜愤怒地发动戍卒，在天下首先举起起义大旗。前路虽然凶险，有些儒生墨者求助陈胜，这是因为天下没有王道已经很久了，大道拥挤堵塞，走不通，从孔子直到陈胜起义的时候，而秦朝又严禁王道，所以投奔到陈胜旗下发泄愤懑。《论语·阳货》载孔子曰：‘如果有用我的诸侯，我大概能在东方复兴周朝王道吧！’儒生墨者是希望成就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功业，替百姓扫除残贼，哪里是贪图俸禄官位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文学言行虽然有伯夷的廉洁，但比不上柳下惠的贞节，不过是眼界很高，但实际看中的是卑下的东西，说洁净的话，做污秽的事，遇到一杯酒，一盘肉，文学会退却相让，实际上你们是辞小利取大利，小廉如鸡，大贪如狼。像赵绾、王臧等人，凭借儒学被提拔为上卿，却包藏有奸诈残忍的祸心。主父偃依靠耍嘴皮获取大官，窃取重权，欺骗汉家宗室，接受诸侯贿赂，最后他们都被诛死。东方朔自称能言善辩，能消融坚物，分解石头，当世无双；然而看他私下行为，疯子都不忍心去做。何况你们没有东方朔的口才，其它还有什么可以可观的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立志向善的人忘记邪恶，谨小慎微的人自致远大。一俎一豆之间足可以观察礼义，家门之内足可以评论言行。儒生穿古代的服装，诵读古人的道理，除此以外而去为非作歹的人，是很少的。因而君子到应该说话的时候然后说话，符合道义然后获取，不是以合乎道义的方式得到的东西，就宁愿不得到。充满而不会溢出，安泰而不骄傲。因而袁盎与汉景帝亲近，但他养的马不过四匹；公孙弘处于三公高位，家里不过十辆车；汉武帝对东方朔先生言听计从，但东方朔并不骄横傲慢；主父偃受困厄的日子太久了，他痛恨那些在上位的人不爱好道义而富有尊贵，不知道体恤士人，于是就索取富余的财物来接济贫穷士人的危急，他并不是为了私人的家业。当世吵嚷不休，并不是担心儒生小鸡般的廉洁，而是担心在上位的人像老虎和猫头鹰那样吞服食物，搜刮时一点东西都不剩下啊。”

# 卷五

## 相刺第二十

本篇记载大夫与文学之间互相讽刺。大夫攻击儒生口诵尧舜，专门学习那些不能应验的空话，对国家治理毫无益处，华而不实，口是心非，能说不能行，往来游逛，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欺骗良民百姓，耽误农时，妨害朝政，成为当代社会一大祸患。文学则辩称社会有君子与小人的分工，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耕织。儒生之所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未能发挥重大作用，是因为有些君主不听劝谏，排斥圣贤。文学进一步指出，当今朝廷执政公卿的道德并不高尚，这是朝政昏暗的重要原因。

大夫说：“古时候，经营井田，规定住宅，男人耕田种地，女子纺织麻布，没有荒废不种的土地，没有游手好闲的人。因此如果不是商人工匠，就不能依靠工商利润生活；如果不是种田好手，就不能依靠收获庄稼生活；如果不是执掌政权，就不能依靠官爵俸禄生活。如今儒生放下农具，专门学习那些不能应验的空话，旷日持久，对国家治理毫无益处，往来游逛，不耕种而吃饭，不养蚕而穿衣，欺骗良民百姓，耽误农时，妨害朝政，这也是当代所忧患的啊。”

文学说：“禹忧虑洪水，亲身参加治水劳动，在水泽中行走，在路边住宿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那个时候，束发的簪子掉落了也来不及拾取，帽子被树枝挂掉也顾不上管，哪里有空余时间耕田呢？孔子说：‘诗人痛恨现实而不能保持沉默，我孔丘痛恨现实而不能隐伏不问。’所以他东西南北奔走，游说了七十个诸侯，但没有人用他，然后返回鲁国阐述王道，作《春秋》，流传到万年之后，天下人谈论六艺都要以孔子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，怎么能与普通百姓男耕女织等同呢！传记上说：‘君子当时不从事政治学术活动，民众就无从观瞻考察。’因此没有君子就没有人治理小人，没有小人就无法养活君子。君子不应当像普通百姓那样去从事耕织。君子耕田而不学道，那是导致社会混乱的途径。”

大夫说：“文学谈论国家治理，似乎要超过唐尧、虞舜，讲述道义要高于秋季天空，但只有华丽的言辞，没有看到实效。从前鲁穆公时期，儒生公仪休为宰相，子思、子柳担任鲁国大夫，然而鲁国北边领土被齐国侵占，以泗水为鲁国北境；南边畏惧楚国人；西边服从秦国。孟轲在魏国时，魏国军队被齐国打败，上将军庞涓战死，而太子申被俘虏；西边败于秦国，土地被侵夺，疆域被削减，丧失了河内、河外的土地。仲尼门下有七十子之徒，他们离开父母，丢下妻室儿女，肩挑书籍跟随孔子，不耕田而学礼，混乱于是更加严重。因而满箱珠玉，不能说拥有珍宝；背着满箱诗书，不能说拥有道义。关键在于安定国家，有利人民，不只是口头的繁文缛辞而已。”

文学说：“当年虞国不采用百里奚的计谋而灭亡，秦穆公采用百里奚的计谋而称霸。不任用贤能就会灭亡，不削弱又怎么可能呢？当年孟子来到魏国，魏惠王问孟子带来什么利益，孟子以仁义来回答魏惠王。两人取舍不合，所以孟子主张不被采用而离开，怀揣治国之宝而无处可说。因而有粮食而不吃，无益于解决饥饿问题；看到贤能而不能任用，无益于解决国土削减问题。殷纣王时期，宗亲大臣有微子和箕子，朝廷大臣有胶鬲和棘子，因此殷商王朝不能生存，是因为贤臣建言不被采用，贤臣劝谏而不听，即使国家有贤能，怎么能够对治理国家有帮助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橘子和柚子生于长江以南，人们都觉得甘甜可口，这是因为人们的味觉相同。美妙的音乐产生于郑、卫之地，人们都觉得动听悦耳，这是因为人们的听觉相同。越国人子臧、西戎人由余，需要等到有人翻译而后才能交流，而他们都先后贵显于齐国和秦国，这是因为人心对善恶的看法相同。因此曾参靠着山石吟诵诗歌，山里的鸟儿都飞下来倾听；晋国乐师师旷弹琴，各种野兽都为之起舞。从来没有善良而不能投合，诚恳而没有感应的情形。恐怕是心意不够诚恳吧？为什么说话而无人听从，所作所为与人不合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扁鹊不能治疗那些针灸用药都不见效的疾病，圣贤不能规正那些听不进直言劝谏的君主。因此，夏桀虽然有关龙逢这样的忠臣，但夏朝仍然灭亡；殷纣王虽然有比干、箕子、微子三位仁人，但殷商王朝仍然覆灭。所以，不怕没有由余、子臧正确的议论，就怕没有齐桓公、秦穆公这样善于听取意见的君主。因此孔子才东奔西走一无所遇，屈原才被楚王放逐。所以有人说：‘按照正直之道去事奉君主，到哪里不是屡次被罢黜？按照邪曲之道去事奉君主，何必要离开父母所在的邦国？’这就是儒生说话无人听从，所作所为与人不合的原因啊。”

大夫说：“歌手不期望声音尖利，而贵在合于曲调节拍；辩论的人不期待他的华丽辞藻，而务在实事求是。声音好听而不知道曲调的转换，不能说他善于唱歌；善于言辞而不知变化，不能说他善于说话。手持画圆的圆规而否定画方的曲尺，拿着水平仪而否定取直的绳墨，只有一孔之见，只知道一个道理，而不知道权衡得失，因为自己没有亲眼看见就不相信别人，如同夏蝉不知道冬雪，顽固地根据古代文献来应对当世情况，犹如辰星、参星永远相错而不相合，胶柱鼓瑟，当然就难以合拍了。这就是孔子不被当时诸侯任用，而孟轲被当时诸侯轻视的原因啊。”

文学说：“日月的光华，盲人看不见，雷电的声光，聋子听不见。对不是知音的人说话，如同对聋哑人说话，岂止是夏蝉不知冬天的厚雪呢？凭借伊尹的智慧，姜太公的贤能，却不能规劝夏桀和殷纣王，这不是劝谏者的过错，而是听者的过错。所以卞和抱着玉璞在荆山下哭泣得眼睛流血，说：‘哪里有优秀的玉匠剖开这块玉璞！’屈原在湖边泽畔一边流浪一边吟诗，说：‘哪里能有皋陶这样的法官来体察我的冤情！’凡是君主，没有人不希望求得贤才来辅佐自己，任用贤能来治国，然而大都被流言蜚语所束缚，被阿谀奉承所迷惑，所以圣贤被掩盖，而那些进谗言、献谄媚的奸臣掌握政权，因此一个个君主亡国破家，而贤士在深山岩洞里忍饥挨饿。从前赵高并没有过人的见识，却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，所以导致秦国覆灭，他的宗族也遭受祸殃。连琴瑟都丢掉了，哪里有什么胶柱可以调理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所谓文学高才，他的智谋应该能够明了先王治国的思想方法，他的资质应该足可以履行先王治国之道。因此，他在家闲居就作为他人老师，做官就被世人所效法。现在文学谈论治国就称颂尧、舜，谈论施行就只能说孔丘、墨翟那一套，将实际政务交给你们，你们又不知道如何去做，怀念古代治国之道而不能在现实中施行，言论正直而行为不正，说的是这一回事，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，穿衣戴帽与乡里百姓不同，而实际却与平凡人没有两样。这次诸位儒生之所以合乎标准而当选，是因为碰到时机，蒙受幸运，前来凑数，出于偶然罢了，恐怕你们不符合皇上诏令提出推举的标准和要求，本来就不能与你们谈论治理国家大事。”

文学说：“上天设置日、月、星三光来照耀天下，天子设立公卿来申明治国之道。所以说，公卿是四海的表率，是神妙感化民众的榜样。公卿对上有辅佐圣明君主的责任，对下有实现圣贤教化的事务，调和阴阳，调理春夏秋冬四季，安定民众，抚育众生，使百姓和睦，没有怨恨忧思的神色，四夷顺从朝廷的道德感化，没有叛逆的忧患，这些都是朝廷公卿的职责，也是贤士应尽的义务。公卿应该是像伊尹、周公、召公那样的三公贤才，是太颠、闳夭那样的九卿贤人。文学不符合圣明君主的推举标准，当今朝廷执政公卿，也不能称得上是道德高尚吧。”大夫不高兴，脸色变了，不作回应。

文学说：“朝廷没有忠臣就政治昏暗，大夫身边没有正直敢言之士，地位就危险。当年任座正面指出君主的过错，魏文侯改变言行，被人们称之为贤君。袁盎当面批评绛侯周勃的骄傲自大，周勃最终得到袁盎保释的吉庆。因此冒着生命危险指出君主过错的人是忠臣，触犯尊严匡正公卿过失的人是正直之士。我们不能当面称是背后议论。现在朝廷执行入谷拜爵的政策，抓得很紧，毫不放松，拿朝廷俸禄的官员多不称职，因此妨害农业、商业、手工业，集市等官营利益没有归还给民众，民众怨望绵绵不绝。况且帝王之道，大多被破坏而不完备，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说：‘人才济济。’诗句大意是说要真心采用贤士的计谋，而不是随便说几句空话就行的。”

## 殊路第二十一

“殊路”意为“不同道路”。在孔门弟子中，子路、宰予死于君主之难，而子贡、子羔则选择了逃亡，他们同样接受圣人的教导，在关键时刻却选择了不同道路，大夫因此提出疑问。大夫认为，人的天性是不能改变的，孔子只能让弟子们穿上儒服，却无法改变他们的自然本性。文学认为，子路、宰予为君主死节，子贡、子羔因不知其谋而离去，他们或去或留，在道义上都无可厚非，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。关于人性，文学坚持荀子化性起伪的观点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。本篇辩论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。

大夫说：“孔门七十子亲身接受圣人的学说，孔子门下列有他们的名字，他们都是诸侯卿相之才，据说可以南面称君的弟子就有几位。擅长政事的弟子有冉有、季路，擅长言语的弟子有宰我、子贡。宰我主持政事，受到齐简公的宠幸，齐国大夫田常作乱，宰予信奉的学说施行不了，他死在庭院之中，齐简公被田常杀死在檀台。子路在卫国做官，卫国大夫孔悝作乱，子路不能挽救出公辄逃亡，自己在卫国被剁成肉酱。子贡、子皋在危难发生之际抽身脱逃，不能为君主战死。食君主的厚禄却不能报答，位居尊官却不能维护君主的生存，为什么他们厚待自己而薄待君主呢？他们同样在孔子门下受业，自以为知道古今大义，通晓君臣之礼。有的人战死，有的人脱逃，孔门诸弟子走的是不同道路，为什么他们南辕北辙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宋殇公知道孔父嘉贤能而不能及早委任国政，因此被华督杀死。鲁庄公知道季友贤能，将国政授给他，但为时已晚，导致鲁国大乱。卫出公接近奸佞远离贤人，子路任蒲邑大夫，孔悝在卫国执政。齐简公不听宰我建议，泄漏计谋。所以卫出公被迫出奔，齐简公被田常杀死，灾祸殃及子路、宰予两位忠臣。子贡、子羔二人事先不参与计谋，因此他们可以选择为君主死节，也可以选择逃生，他们或者离去，或者留下，都是符合道义的。晏婴不死于崔杼、庆封之难，不能说晏婴不义；微子开离开殷国之乱，能说他不仁吗？”

大夫说：“最美的玉石，没有东西能修饰它。最贤的本真，人为文饰不能增色。因此最美的玉石不必雕琢，最美的珍珠不必描画。仲由、冉求并不是檀、柘那样的栋梁之材，也不是能制作隋侯之珠、和氏之璧的玉石，你们却要勉强对他们进行文饰，这就如同雕琢腐朽木头、磨砺铅刀，如同修饰嫫母丑女、描画泥土人一般。给泥人涂上五颜六色，看上去文采斐然，条理分明，等到遇上路上流水冲刷，就被冲坏成一滩泥土了。你们深切怀念古代道理，沉浸于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中，既不能转为安，也不能变乱为治，就如同邻里追逐鸡群，鸡群难道没有家吗？”

文学说：“不学习就无法修身，无礼义就无法辅佐美德。和氏玉石，是天下的美宝，要等到治玉工匠制作后才能明确价值。毛嫱是天下的美女，要等到香泽脂粉而后才能展示美容。周公是天下最高的圣人，要等到贤明老师教导而后成为通才。如今治世用士的要人，不爱好学习问难，一味以一己之愚来担任大臣之责，这就如同没有船桨和船舵，在渡江海时遭遇大风，或者沉没在百仞深渊，或者向东漂流到无边无际的大海，哪里能只是毁坏而止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性格有阳刚阴柔之分，容貌有美好丑恶之别，圣人只能顺因自然而不能改变。孔子只能从外表上改变各位弟子的服饰，而不能改变他们的心性。因此子路放下长剑，去掉高帽，在孔子门下折腰屈节，但他在提起衣服下摆向师友施礼时，仍然流露出性格刚强的样子，粗鄙之心仍然存在。宰予白天睡觉，想减少三年之丧。孔子说：‘粪土做的墙壁，是不可以粉刷的’，‘像仲由，将不得好死。’因此内在没有美好的本质，只是外表学一些礼文，即使有贤师良友，也如同在油脂上作画，在冰块上雕刻，结果浪费时日，劳而无功。因而良师不能修饰驼背，香泽脂粉也不能美化嫫母那样的丑女。”

文学说：“西施蒙受污秽，连粗鄙的人都会捂住鼻子；丑恶的人盛装打扮，可以祭祀上帝。假使子路、宰予二人不进入孔圣人之门，他们免不了做个穷人，怎么会得到卿大夫的名位？因此磨刀是用来使刀刃锋利的，学习是用来发掘才能的。《论语·雍也》载孔子说：‘觚不像觚，觚啊，觚啊！’因而木材经过匠人加工就成为宗庙祭器，否则就只能做奴仆烧饭的柴火。吴、越的剑胚不经过磨砺，一般人都看不上眼；铸剑工匠对剑胚施加巧妙的工艺，君主佩戴它上朝。丑人自以为长得漂亮，因此多加修饰；愚蠢的人自以为知慧，因此不愿学习。旁观者嘲笑，原因在自己却不自知，不喜欢任用别人，这是自以为是的过错啊。”

## 讼贤第二十二

本篇题为“讼贤”，“讼”通“颂”，颂贤，即讨论贤人。文中辩论分为两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讨论贤人的遭遇。大夫认为子路、宰我如果不从孔子学习，就不会死得很惨。文学指出，子路、宰我之所以结局悲惨，是由于他们没有遇到伯乐，反而遇上屠夫。第二个层次辩论何者为贤。大夫举成颙、胡建成为例，批评他们个性狂狷，触犯贵族，导致不得善终。文学则热烈赞扬成、胡二人“怀精白之心，行忠正之道，直己以事上，竭力以徇公，奉法推理，不避强御，不阿所亲，不贵妻子之养，不顾私家之业”，认为规正上司错误，正是他们的使命。成颙的事已不可考，从《汉书》所载胡建事迹来看，他是由于秉公执法触犯权贵，最后被迫自杀，纯属冤死。大夫站在贵族立场上指责忠臣，说明他的是非观是大有问题的。

大夫说：“刚强的东西容易折断，柔弱的东西容易卷起。所以子路因强横而死，宰我因柔弱被杀。假使子路、宰我二人不从孔子受学，那么他们未必不得好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自视甚高，夸耀才能，小智慧却承担大责任，希望别人顺从自己，不能让自己顺从别人；没有人看得上，却要自我表现；没有人愿意买账，却要自抬身价；这就是他们被人杀死、剁成肉酱的原因。人们没有看到他们成为宗庙治国之器，却看到他们被世人所杀。在那个时候，即使随江水东流，也只好如此了吧？”

文学说：“千里马拉着载盐的车，垂头丧气地走在太行山的山坡上，屠夫手里拿着刀，斜看千里马。姜太公穷困的时候，背着货物在朝歌叫卖，那些蓬头垢面的人聚在一起嘲笑他。在那个时候，并不是没有良马和俊才，而是除了周文王和伯乐之外，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价值了。子路、宰我生前没有遇到伯乐的举荐，反而遇到疯狂的屠夫，因而孔子为此悲伤地说：‘像仲由怕不得好死呢”，‘老天爷要断绝我啊’。宋国大司马孔父嘉死于太宰华督之难，不能说他不义。仇牧卷入宋万之祸，不能说他不贤。”

大夫说：“如今的学者，没有姜太公的才能，没有千里马的才力，却有蜂蝎的狠毒，最终害了自己。东海郡成颙，河东郡胡建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二人以权术得到推举，出身行伍，做到县令。以一己之意为是非，没有人与他们合得来。你请他不来，你推他不走，狂妄激进，言行不逊，对人忌刻，桀骜不恭，欺压盖长公主，侵犯朝廷大臣。明知其不可做，却要勉强推行，想以此来求得名声。所作所为不合法规，最终自己丧失性命。没有看到他们建功立业，却看到他们遭到杀身之祸，身犯重罪，不能寿终正寝。他们狡诈而自以为智慧，尖刻而自以为正直，言行不逊而自以为勇敢，他们遭到灾难，也是应该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成颙、胡建二位怀有精诚洁白之心，施行忠贞正直之道，正直地事奉皇上，尽力履行公职，按照法令审理案件，不畏强暴，不偏袒亲近之人，不顾妻子儿女的生计和私人的产业。然而最终不能免于嫉妒之人，被众多不正直的人所排挤。这就是他们遭遇不测之刑而功名不成的原因啊。皇亲国戚风气不正就会导致法令不能推行，君主得力干将风气不正就会导致奸邪兴起。当年赵奢对平原君秉公执法，范雎劝秦昭王驱逐穰侯魏冉，结果赵、秦二国得到治理，而平原君、穰侯两家性命也得以保全。因此君主有过错，臣子就要纠正；上面做错事，下面就要批评。大臣正派，县令还有什么不正派的？不反省息己而责备他人，这是执政者的大错啊。屈原沉江，这是由于遭到子椒的谗害；管仲能够施行他的治国方略，这是出于鲍叔举荐之力。现在看不到鲍叔举荐贤才的事，反而见到屈原自沉汨罗那样的惨祸，即使想寿终正寝，又怎么可能呢？”

本篇讨论治国要不要遵守先王之道问题。大夫和丞相史认为，文学道古害今，虚言难用，治国应该随时世变化而变化，不能一味地遵循古道。文学认为，制度形式虽然随时代而变，但治道是不变的：“上自黄帝，下及三王，莫不明德教，谨庠序，崇仁义，立教化。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”治国必须遵守“先王之法”，“圣人之道”，“举而贯之，贯而行之，何更为哉！”辩论双方各持一端，如果将双方观点合起来，既强调治国与时俱进，又能坚持王道德治文化传统，那么就比较全面了。

大夫说：“御史！”御史没有回应。大夫对丞相史说：“文学从结发起学孔子之语，牢记在心中，不会放弃，他们说话循环往复，圆转自如，如同陶钧。文采比春花还要华丽，毫无效果如同拥抱大风。他们修饰虚言，扰乱实事，称道古代，危害当今。如果听从他们的话，那么朝廷财用就会断绝，空话不能付诸实施；如果不听从他们，文学认为不对，人多嘴杂，吵吵嚷嚷，听都听不完。诸位在丞相府已经很久了，你们通晓上古历史，洞明当世事务，现在何去何从才可行呢？”

丞相史上前说：“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，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，他们二人所走的路径不同，结果都归于称霸。如果一定要追随古代不变，沿袭过去不改，那么事物在文饰和内在质地都不会变化，上古椎轮车还在使用。因此有的人首创，有的人传述，然后法令才适合民众，器械才便于实用。孔子应对鲁定公、鲁哀公、齐景公三位君主时主旨不同，晏婴用不同方法辅佐齐灵公、齐庄公、齐景公三位君主，这并不是随意相反，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。公卿既然定下国家大业的思路，建立永不衰竭的根本，希望您不要顾及他们不识大体的琐碎言论，不要被儒家、墨家言论所牵制。”

文学说：“晋国著名乐师师旷调和五音，不能脱离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圣明君王治国，离不开仁义。因此虽然历代有改变制度之名，但却没有改变王道之实。上自黄帝，下到三王，没有君主不宣明道德教化，重视学校教育，推崇仁义，建立教化，这是百世不会改变的道理。殷、周遵循王道而昌盛，秦王变法而亡国。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说：‘即使没有了旧臣，但还有旧法在。’诗人说的是旧法遗教。因此，旧臣虽死，但有旧法保存下来，可以将旧法拿来加以贯通，贯通之后予以执行，为什么要变更呢？”

丞相史说：“喜爱西施之美，无益于自己的容貌；称道尧、舜之德，无益于现实中的治国。如今文学不谈如何治国，只是谈论现实治国没有功绩，如同不谈耕田的方法，却只是羡慕富人的粮仓。想多打粮食，就要抓紧农时；想治理好国家，就要顺应时世。所以，商鞅清楚地认识到，对存亡的见解不能与世俗相同，这是因为世俗毁坏事功，且多目光短浅。平庸的人安于旧状，愚蠢的人坚信所听到的传说。因此舟车的使用，民众三年之后才习惯它。商鞅法令确立之后，民众才信众新法。《论语·子罕》载孔子说：‘可以与某些人共同学习，但不能与他们一起通达权变。’对文学这些人，只能让他们沿着绳墨雕刻，不能与他们讨论书本所载道理之外的现实问题。”

文学曰：“君子多听，对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，只阐述而不创作，圣通明达，谋略远大，聪慧明智，以少御繁。所以能够做到大功告成而不毁坏，美名确立而不遭受挫折。小人智慧浅薄却图谋大事，身体瘦弱却担负重任，因而半途而废，苏秦、商鞅就是这样的人啊。他们无视先王之法，诋毁圣人之道，只听凭自己的主观意志，因此灭亡。《周易》传记说：‘小人身处大位，地位虽高，但必定崩溃。不持续学习修身治国的道理，不坚持道德修养，而能善始善终，是从来没有的事。所以开头一步登天，随后堕落于地。’当年夏禹治水，民众知道治水利益，没有人不勉力劳作。商鞅变法，民众知道它的害处，没有人不畏惧商鞅的刑法。因此夏禹治水大功建立而称王，商鞅刑法施行而亡身。你们说商鞅有独特智慧的思考，但世间却缺乏他具有独到见解的证据。文学虽然不足以参与当代权变，但也没有蒙受世人指责的祸殃。”

## 论诽第二十四

本篇就颜异、狄山反对汉武帝政策而展开辩论。丞相史批评颜异、狄山“处其位而非其朝，生乎世而讪其上，终以被戮而丧其躯”，将汉武帝杀颜异、狄山喻为帝尧“殛鲧放兜”。文学认为，汉武帝时期由于贤良大臣不够齐备，才使张汤之类的奸臣得售其奸。因此君主治国，关键是得到舜、禹那样的贤臣辅佐。从史实来看，颜异只是认为汉武帝经济政策在施行过程中有不便之处，狄山只是主张与匈奴和亲，他们仅与皇帝政见不合，根本谈不上诽谤皇帝，可是他们却为此付出生命代价，专制螫毒如此惨烈，读之令人扼腕。

丞相史说：“晏婴说过：‘儒生说得像一朵花，却结不了果，繁于礼乐，缓于治民，长时间服丧，害苦活人，葬礼耗费太大，伤害民生产业，礼仪烦扰，难于施行，道理迂腐，难于遵守，称颂往古，诽谤当世，轻视所见的现实，重视传闻的上古。’这些人本身不正，却要以自己为楷模。这就是颜异被杀头，狄山死于匈奴的原因啊。居于朝廷官位，却要诽谤朝廷，生乎当世，却要批评上司，最终被杀，丧失性命，这又是为谁承担罪过、蒙受祸殃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礼用来防止过分，乐用来移风易俗，礼制兴盛，音乐纯正，就会刑罚适中。因而堤防修成之后民众就没有水灾，礼义确立之后民众就没有动乱祸患。因此礼义败坏，堤防溃决，可以治理的情形，从来没有。孔子说：‘礼，与其奢侈，宁愿俭朴；丧礼，与其礼文周到，宁可过度悲哀。’因而礼制作的本意，并不是要妨害活人、伤害民生产业的，礼仪只是有节制的文饰，并不是伤风败俗。治理的国家重视礼，危险的国家重视法。从前秦王朝以武力吞并天下，而李斯、赵高因邪恶招来灾祸，废除古代道术，毁坏旧的礼仪，专门依靠刑法，而儒、墨之道已经丧失殆尽了。堵塞士人进身道路，堵住民众的嘴巴，说奉承话的人步步高升，皇上听不见过错，这就是秦王朝失去天下、毁灭社稷的原因啊。因此圣人执政，一定要先杀掉像李斯、赵高这样的小人，因为他们用花言巧语来助长君主的错误，导致国家的颠覆。现在你怎么拿这些亡国之语来说呢？公卿处于重要地位，不能端正道路航向，而是刻意曲从，见风使舵，可恨小人巧言顺从，以致酿成别人过失。因此明知说了必死，也不忍心顺从苟合之徒，所以不免于牢狱之灾。可悲啊！”

丞相史说：“檀树、柘树有相同的生长土壤，萑苇、芦苇彼此聚生一处，这说明事物都是以类相从。孔子说：‘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独，一定会有人与他为邻。’因此商汤兴起，伊尹便来到他的身边，不仁的人就远远地走开了。从来没有圣明君主在上而乱臣在下的情形。如今已故武帝亲身施行仁圣之道，统治天下，招纳、举荐优秀人才和贤良之士，只任用仁人，诛杀驱逐那些犯上作乱之臣，不避皇亲国戚，务必求得贤才，黜退不肖之人，如同尧举荐舜、禹之辈，诛鲧，流放兜一样。你们却说‘苟合之徒’，这就是说君主有错而臣子阿谀奉承，对吗？”

文学说：“皋陶应对帝舜说：‘在识别人才方面，即使是帝舜也难以做到。’洪水酿成大灾，帝尧忧愁憔悴而不能治理，在得到舜和禹以后才使九州安宁。因此即使有帝尧那样的英明君主，如果没有舜和禹的辅佐，那么帝尧的纯正美德就不能流芳千古。《春秋》讥刺有明君而无贤臣。已故武帝时期，贤良大臣不够齐备，因此才使奸臣钻了空子。帝尧得到舜和禹而鲧和兜被杀，赵简子得到贤臣叔向而盛青肩被废黜。俗语说：‘没有看到君子，就不知道何为奸臣。’《诗经·小雅·出车》说：‘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已见君子，我心平静。’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。”

丞相史说：“帝尧先任用鲧和兜，得到舜和禹之后，便根据他们的罪行诛杀鲧，流放兜，天下人都心悦诚服，因为这是诛杀不仁的人。君主用举贤除奸的方法治理民众。颜异最初只是济南的一位亭长，已故武帝提拔他，让他担任高官，官职达到上卿。狄山起身于一介布衣，为汉朝议事之臣。他们都处于当年舜和禹的位置之上，执掌天下议论的正确标准，可是他们不能辅佐皇上治民，反而犯了诽谤皇上的大罪；因而他们才受到类似于兜那样的处罚，遭到杀头。贤者受奖赏，不贤者受刑罚，本来就应该如此，你们文学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在一起讨论的人应该以大义相会，以大道相晓喻，从善如流，不求个人取胜，服从大义，不耻受窘。如果以歪理邪说相迷惑，以言辞相扰乱，彼此以最后取胜相夸耀，希望以不正当的方法取胜，这种行为并不可贵。战国纵横家苏秦、张仪，迷惑诸侯，颠覆万乘诸侯国，使人们放弃原来的立场；不能说他们不雄辩，然而他们那一套是致乱之道。君子痛恨这种卑鄙小人，不能与他们一起事奉君主，怕他们表面上对君主言听计从，而背后却无所不为。如今你不听取正义的意见来辅佐卿相，反而曲意顺承上司，喜好片刻有利的言论，完全不考虑它的后果。像你这样的人做属官，应该接受最重的刑罚。你姑且闭嘴吧！”

丞相史说：“我听说士人生活在世上，衣服足可以御寒保身，饮食足可以供奉双亲，对内家人足可以相互体恤，对外不求于他人。因此自身修养完成之后可以治理家族，家族得到治理之后可以治理官府公事。因而给父母吃蔬菜粗粮的人不可以说他是孝子，妻子儿女挨饥受寒的人不可以说他慈爱，祖辈遗业没有继承好的人不可以说善于治理家族。生在当世，行事立身，而有给父母吃蔬菜粗粮、妻子儿女挨饥受寒、祖辈遗业没有继承好这三项拖累，那也足可以闭嘴了。”

## 孝养第二十五

汉代以孝为治，本篇围绕如何孝养父母问题展开辩论。辩论的焦点是，赡养父母，究竟是将礼节放在首位，还是将物质条件放在首要位置。丞相史认为，孝养父母，不能空谈礼节，而必须提供高大的房屋，安适的车马，轻暖的衣服，甜脆的食物，“与其礼有余而养不足，宁养有余而礼不足”。文学则主张礼节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，对父母要做到和颜悦色，承顺父母意志，完全按照礼节要求行事。

文学说：“善于奉养父母的人不一定要每餐肉食，善于提供父母衣服的人不一定每件都是锦绣。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事奉父母双亲，这是孝的顶点。因此平民虽然勤劳，但还足可以遵守礼义，粗茶淡饭，足可以表达孝敬。孔子说：‘现在的孝子，说是能够养活父母，如果不敬，那么拿什么去区别养父母与养犬马呢？’因此上等的孝是不违背父母意志，其次的孝是对父母和颜悦色，再其次是供养父母的身体。重视对父母的礼义，不贪图供养父母的东西有多少，遵守礼义，心平气和，供养物资即使不能完全具备，也是可以的。《周易·既济卦》说：‘东边邻居杀牛重祭，还不如西边邻居夏天薄祭。’因此如果大富大贵而缺乏礼义，还不如贫贱人家的孝悌。在闺门之内尽孝道，在闺门之外尽悌义，对朋友之道尽信用，做到这三点，就是孝的顶点了。治家有条理，并不看他积累了多少财富；事奉双亲尽孝，并不是看他给父母提供了多少美衣嘉肴，也不过是对父母和颜悦色、承顺父母意志、尽守孝子对父母的礼义而已。”

丞相史说：“八十岁老人叫做耋，七十岁老人叫做耄。叫做耄的老人，吃饭没有肉就吃不饱，穿衣没有丝帛就穿不暖。因此孝子用甜脆的食物来养父母之口，用轻暖的衣服来保养父母的身体。曾参奉养父亲曾皙，吃饭时一定有酒肉。如果没有礼服和礼帽，即使是公西赤也不能完成礼容。没有美味佳肴，即使是闵子骞、曾参也不能完成赡养父母的任务。礼不是没有内容的空架子，因而必须先有情实，然后才能以相应的礼文去修饰。对父母与其礼仪有余而奉养不足，宁可奉养有余而礼仪不足。恭敬地洗好酒杯，却用酒杯装水给父母喝，让父母升堂高坐，进献的却是粗饭，礼仪虽然完备，然而并不值得提倡。”

文学说：“周襄王的母亲并非没有酒肉，衣食并非不如曾皙，然而周襄王蒙受不孝的名声，这是因为周襄王不能按照礼仪事奉父母。君子重视礼仪，小人贪得供养。用‘嗟，来’的口吻招呼，扔给他食物，即使是要饭的人也不愿接受。对君子来说，如果无礼，即使是美味，也不愿食用。因此按照礼仪，主人不亲馈赠食物，那么客人在食前就不必祭祀。这是因为，馈赠食物是小事，礼仪是重要的大事。”

丞相史说：“孝，没有比天子以天下养亲、诸侯以一国养亲更大的了，其次是卿大夫以做官的俸禄养亲，最下是平民靠气力养亲。因此，王公君主，是上等的养亲，卿大夫是次等的养亲。从平民百姓来说，如果有贤能的儿子当高官，高大的厅堂，深邃的屋宇，安适的轩车，高大的骏马，穿着轻暖的衣服，吃着甜脆的饭食。如果儿子没有贤能，那就只能穿着粗布短衣，戴着皮帽子，住在简陋的巷子里，吃了早饭无晚饭，吃的是粗粮葱韭蔬菜，到了膢腊祭祀的日子才能见到肉食。父母双亲的胃不是蔬菜园，只装一些蔬菜。蔬菜粗粮，连乞丐都不愿吃，而儿子却以蔬菜粗粮供养双亲，即使是以礼事奉，但并不可贵。”

文学说：“没有实际才能而窃取官位，没有实际功劳而享受俸禄，即使有富贵给父母，那也如同跖、蹻的供养一样。让父母站在高台上极目远望，吃饭的饭桌一丈见方，这不能叫做孝。老父老母的胃不是强盗的口袋，为什么经常装不义之财？所取所得，既不是自己所有，也不是职分所得，财物刚进门，祸患随后就来，其身将遭到死亡祸殃，哪里有膢腊节日而吃肉？曾参、闵子骞对父母虽然没有卿相之养，但有孝子的名声；周襄王虽然富有天下，但却有不能事奉父母恶名的牵累。因此，礼仪菲薄而供养丰厚，这不是孝。抢劫别人粮食来供养父母，这更不是孝。”

丞相史说：“上等的孝是对父母和颜悦色，其次是让父母过安定生活，再其次是保全身体。从前，陈余背叛汉王刘邦，被韩信斩于泜水；伍被参与淮南王刘安反叛，被夷灭三族。不久以前，主父偃行为不轨而被诛灭，吕步舒搬弄是非而被处死，他们都是行身不严谨，连无罪的亲人也被牵连而遭杀害。由此看来，空虚的礼仪对自己无益。礼文与实物相配而行，礼节与奉养并行，然后才可以讨论孝道。孝在于实质，不在于修饰外在的礼貌；保全身体在于谨慎，不在于说空话。”

文学说：“说话不真诚，有约不讲信用，面临危难不勇敢，事奉君主不忠贞，这些行为都是大的不孝。孟子说：‘当今之世，现在的各国大夫，都是罪人。他们都逢迎君主意志，顺从君主的罪恶。’如今你不忠诚不信用，花言巧语，扰乱朝政，用阿谀奉承将君主引向邪路，以此苟合取容。像这种表现，不能见容于当世。《春秋》说：‘士应该坚守一条正道，贫贱不移，遵循正确道理，不外求其他利益，供奉官职而已。’因此处于卑贱之位，而高谈阔论，这是罪过，轮不到自己说话却要说，这是骄傲。皇帝有诏公卿参与这次议论，你们为何要参与空打嘴仗呢？”

## 刺议第二十六

本篇记载丞相史与文学之间的真假儒生之争。丞相史自称曾经亲聆儒家经师音旨，受儒家之业，意谓儒学并非文学、贤良的专利。文学尖锐地指出，并不是穿儒衣、戴儒冠的人都是儒生，真正的儒生应该执经守道，坚持原则，敢于谏争。丞相史的行为表明，他没有忠正之心，枉曲不能矫正，奸邪不能匡救，只是一味地顺从流俗来明哲保身，顺从风向来取悦上司。这说明丞相史并不是继承孔子学说的真儒生，而只是公卿门下当面顺从的假儒生。

丞相史说：“山林不拒绝椒桂灌木，才得以成就它的高大；君子不辞谢打柴人的言论，才得以扩大他的声名。因此多见的人广博，多听的人智慧，拒绝劝谏的人闭塞，刚愎自用的人孤陋寡闻。所以与下面商量的人没有失策，与众人一起举动的人没有败功。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中说：‘向割草打柴的人咨询。’因而布衣平民都可以议论政事，何况公卿的属官呢？按照《春秋》记事体例，士的事迹是不予记载的，但《春秋·隐公元年》却记载了一个名叫咺的士，这是因为作者认为咺是宰相的士。《论语·子路》载孔子曰：‘朝廷即使不用我，我大概也会参与知情的。’我虽然不聪明，但也曾侧耳倾听业师音旨，恭敬地提起衣服下摆，在君子处学道受业。假如文学说得对，那么我的言论又有什么害处？假如文学说得不对，那么即使没有丞相史，谁不批评你们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用正道辅佐人叫做忠贞，用邪道误导人叫做奸佞。能够帮助人纠正过错、采纳善言的人，是君主的忠臣，大夫的直士。《孝经》载孔子说：‘大夫手下如果有三个谏争之臣，即使这个大夫昏聩无道，那么也不会丢失封邑。’如今你处于宰相门下之士的位置上，没有忠正之心，枉曲不能矫正，奸邪不能匡救，顺从流俗来明哲保身，随着风向来取悦上司。只要是上司所说的话就苟且听从，只要是上司所做的事就曲意跟随，如同影子跟随形体，回响紧跟声音，终究无是无非。穿着儒生的衣服，戴着儒生的帽子，而不能推行儒道，这不是真儒生。譬如用泥土雕塑的龙，虽然身上花纹、头、眼睛全都具备，但却不是真正的龙。葶苈形似白菜，但味道却与真白菜不一样，玉与石形状相似，但它们却是不同类的东西。你并不是孔子门下遵经守道的儒生，而是公卿门下当面顺从的儒生，你和我们不是一类人。冉有担任季孙氏家宰，为季孙氏聚敛财富，孔子说：‘众位弟子击鼓进攻冉有，是可以的。’因此辅佐夏桀的人不能叫智者，替桀敛财的人不能叫仁人。”丞相史默不作声，没有回答。

## 利议第二十七

本篇题名“利议”，意为关于盐铁利益的议论。从文章内容来看，双方讨论利益的内容并不多，辩论的焦点其实集中在儒生建议是否可行之上。大夫指责儒生“抱枯竹，守空言，不知趋舍之宜，时世之变，议论无所依”，“桎梏于旧术”，讽刺儒生“心卑卿相，志小万乘。及授之政，昏乱不治”，甚至以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来表达自己对儒术的厌恶。文学指出，并不是儒生不能成事，而是大夫只看中财利，听不进儒生的意见。千里马只有造父才能驾驭，儒生的价值只有周公那样的宰相才能正确认识。

大夫说：“治世的英明君主，为万民忧虑操劳，他考虑到北方边境尚未安全，因此委派使者推举贤良和文学高才，广泛聘请有学识的士人，想看到你们提出的特殊见解和高明计策，虚心侧耳听取你们的意见，希望有所收获。可是诸位儒生不能提出奇妙计策和远大图谋，缺乏征伐匈奴、安定边境的对策，只知道怀抱干枯的竹书，守着古书那些空泛的言论，不知道适宜的取舍，不懂得时世的变化，所发表的议论没有什么依据，如同膝盖发痒而搔挠背部，在朝廷辩论，吵吵嚷嚷，让人听不进去，如同‘品’字是用三个‘口’构成。这难道是英明君主所想听到的吗？”

文学说：“诸位儒生回答皇帝策问，殊途同归，旨在崇尚礼义，要求国家退还盐铁财利，恢复往古利民之道，匡正当世的失误，没有一个人讲的不是有关天下太平之事。虽然诸位儒生所谈未能做到全部切实可行，但应该有可行之处。由于主管政事的官员看不到宣明礼义的意义，只是通晓财利末事，败坏事情，否定建议，考虑应对儒生的计策，以至于至今议事未决。并不是儒生办不成事，而是公卿想要获取财利。”

大夫说：“颜色严厉而内心怯弱，这是以假乱真。外表文彩华丽而用牡麻做里子，这是以虚乱实。文学穿着宽衣阔带，这是盗用周公的服饰；谨小慎微，恭敬不安，这是盗用仲尼的仪容；议论风发，称赞颂扬，这是盗用卜商、端木赐的言辞；讽刺批评，谈论治国，这是盗用管仲、晏婴的治才。心里看不起卿相，心志藐视君主。等到真的将政事交给你们，你们又昏聩、混乱而不能治理。因此仅凭言论推举人才，如同以毛色来相马。这就是你们大多与推举不相称的原因。皇上诏书说：‘我器重你们这些海内英才，因而广泛聘请四方豪俊文章博学之士，给你们越级升迁官禄。’言谈者不一定有德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有的人舍弃车子却记住了拉车的牛，这是看重老牛不说话多干活。吴地金铎由于摇舌太多而自己撞破，主父偃以其雄辩而自杀。鹖鴠夜里鸣叫，但对天明无益；主父偃像猫头鹰一样鸣叫，但对他的死刑无益。并不是主管官员想获得财利，而是文学被陈旧的道术所束缚，被空泛言论所牵累。”

文学说：“能说出来，又能付诸行动，是商汤和周武王。能说出来，但不能付诸行动，是你们这些朝廷主管官员。文学盗用了周公的服饰，你们主管官员却盗窃了周公的官位。文学被陈旧的道术所束缚，你们主管官员被财利所束缚。主父偃因为口舌之祸而自杀，你们主管官员因为财利而自困。千里马的才能是日行千里，但没有造父这样的优秀车夫不能驾驭；禹的智慧可抵万人，但如果没有舜做宰相就不能被使用。因此季桓子在鲁国执政，贤士柳下惠忽然不见踪迹，孔子担任鲁国司寇，然后柳下惠才迅速兴盛。千里马，得到举荐是靠伯乐，发挥功用是靠造父。造父驾车，马无论优劣，都可以上路。周公执政之时，士人无论贤不肖，都可以参与讨论治国。因而优秀车夫善于调教马匹，贤明宰相善于使用士人。如今推举有特异才能的人，却让奴仆驾御他们，这如同将千里马套在盐车上，要求马快跑一样。这就是贤良、文学与推举多不相称的原因。”

大夫说：“嗨！诸位儒生身份下贱，品行不端，多言善辩，但不切实用，情实与外貌不相符合。儒生如同那些挖墙洞的强盗，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祸患。当年孔丘被鲁君驱逐，不曾为世所用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孔丘说话首鼠多端，不合于时，不得要领。因此秦始皇焚烧传播儒术的书籍，不用儒家学说，将儒生活埋在渭水中部，永不叙用。他们又如何能够摇唇鼓舌，眉飞色舞，参预御前讨论，议论国家大事的是非呢？”

## 国疾第二十八

本篇原题为“国病”，据张敦仁说改为现题。所谓国疾，就是为国家疾病把脉诊断。丞相史要求文学拿出治国良方。大夫进一步要求贤良回答“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，何世之弥薄而俗之滋衰也”的问题。对此，贤良痛陈汉家弊政，历数社会种种负面现象，认为社会病态的根源是奸臣当政：“百官尚有残贼之政，而强宰尚有强夺之心”，“大臣擅权而击断，豪猾多党而侵陵”。大夫指责文学“诵死人之语”，“称往古而訾当世”。本篇言辞激烈，火药味十足，从中可见盐铁会议的气氛。

文学说：“国家拥有贤能之士而不用，这不是贤士的过错，而是拥有国家者的耻辱。孔子是一个大圣人，诸侯没有人能用他，曾经当过乘田、计吏之类的小官，相鲁才三个月，就做到不令而行，不禁而止，鲁国蓬蓬勃勃，如同及时雨浇灌万物，没有哪样事物不兴盛起来。何况位于统治天下的当今朝廷，普施圣明君主的仁德之音、教化恩泽呢？如今公卿处于尊贵的地位，执掌天下的权要，十多年了，但功德不能施于天下，而只是让百姓勤苦劳累，百姓贫穷困窘，而权贵私家却积累了万金家财。这是君子感到羞耻的，而为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所讽刺的。从前，商鞅为秦国丞相，以礼让为后，以贪鄙为先，崇尚斩首之功，务求进攻掠取，对民众没有厚德，在秦国实施严刑峻罚，风俗日益败坏，民众越来越怨恨，因此秦惠王将商鞅烹煮成肉酱，以此向天下人谢罪。那个时候，商鞅也不能议论国家大事了。如今执政公卿担心儒生贫贱多话，儒生也担忧执政公卿富贵多患呢。”

大夫看着文学，闷闷不乐，不愿说话。丞相史说：“辩论国家的政事，讨论执政的得失，为什么不慢慢地互相把道理讲明白，而要急切到如此程度呢！大夫不想废除盐铁官营，并不是有什么私利，而是忧虑国家的财用，边境的军费。诸位儒生直言争讨盐铁私营的权利，也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想恢复古代藏富于民的传统，以便辅助朝廷成就仁义之政。二者各有根据，时世不同，事务也不一样，又怎么可以坚持古代道术而否定当今的道理呢？况且《诗经·小雅》批评他人，一定会拿出办法来替代弊政。诸位儒生如果有办法能够安定、凝聚国内民众，用怀柔方法招来远方异族，使边境没有敌寇骚扰之灾，目前国家征收的租税全部可以为诸位儒生废除，何况盐铁、均输呢！我们看重有道术的儒生，是看重他们能够谦让，用详尽的道理说服人。如今双方直言争辩，没有公西赤、端木赐雄辩的言辞，只表现出粗鄙无礼的神色，这不是我们所听说过的。大夫说话有点过头，而诸位儒生也是这样，诸位儒生难道不应该向大夫道歉吗？”

贤良、文学都离开座位说：‘我们这些粗鄙之人顽固浅陋，很少涉足朝廷，狂妄言语多有不妥，触犯了大夫。药酒虽然苦口，但有利于治病；忠言虽然逆耳，但有利于行动。因此直言争辩是朝廷之福，巧言善辩是朝廷之祸。树林之中多有大风，富贵之人多听阿谀之言。统治万里江山的朝廷，每日听到的都是唯唯诺诺，后来听到诸位儒生的直言争辩，这是公卿的良药、银针、砭石啊。”

大夫面色稍微缓和一些，背对文学，面对贤良说：“贫穷小巷多出诡辩之人，孤陋寡闻的人难以理喻。文学死死守着那些茫然无际的话语，始终不肯改变。往古的事，前人的话语，我们都已经看过了。如今从近世来看，自然是眼能看到，耳能听到，时世变了，事务就不一样。汉文帝、汉景帝时期，建元初年，民风淳朴，各归农业根本，官吏廉洁自重，国家殷富，钱粮盛多，人人丰饶，家家富裕。如今政令未改，教化未变，为什么世风日下、民俗愈衰呢？官吏不能廉洁，民众没有羞耻，处罚为非作歹，诛杀邪恶，但奸乱仍然不能禁止。俗话说：‘乡野儒生不如都市之人。’文学都出自崤山以东，很少涉及大道理。诸位贤良在京师议政日久，希望你们能够分析清楚政治得失之事，根本原因在哪里。”

贤良说：“崤山以东是天下的中心，贤士的战场。高祖皇帝像龙凤飞举一般兴起于宋、楚之间，崤山以东子弟萧何、曹参、樊哙、郦食其、夏侯婴、灌婴之辈为辅佐，虽然生活在不同年代，他们也可以说是秦末汉初的闳夭、太颠。夏禹出于西羌，周文王生于北夷，但他们的圣人美德高出世人，具有超越万人的才能，承担超群的社会责任。有些人虽然出入都市，但他们一旦不知道返回仁义根本，长此以往，最终沦为奴仆而已。我虽然不是生长于京师，才能驽钝，是下等愚人，不足参与议论国家大事，但我私下听到过乡里老人关于古代的言论。从前，普通百姓衣服温暖而不奢华，器具质地朴实，牢固适用，衣服足可以遮蔽身体，器具足可以方便事务，马足可以代步，车足可以自己乘坐，酒足可以聚会欢乐而不至于沉湎，乐足可以调理身心而不过分，进门没有宴饮欢乐的声音，出门没有游逸无度的景观，出行就背负肩挑，在家就锄地耘草，用度俭约而财富丰饶，农业根本得到加强而民众富足，送别死者悲哀而葬礼不奢华，保健养生适度而不奢侈，大臣正派而无贪欲，执政宽缓而不苛刻；因此黎民百姓性格宁静，百官都能安于职守。汉武帝建元初年，推崇文教，修治德政，天下平安无事。

“到了后来，奸臣各施手段，损害太平盛世，对外垄断山海利益，对内兴办各种牟利事业。杨可主持告缗，江充禁止僭越的服饰，张汤大夫改革法令，杜周治理刑狱，罚款，赎罪，判刑，贬谪，连细微的罪行也不放过，史书简直记载不完。酷吏夏兰之辈随意拘捕民众，中尉王温舒之徒狂捕滥杀，残暴的官吏层出不穷，扰乱了良民的正常生活。那个时候，百姓连自己脑袋都保不住，豪强富人没有人肯定能够保全自己宗族的性命。圣明君主武帝终于有所觉察，于是杀死奸臣江充等人，诛灭残忍贼害的人，以此来减少民众对杀人过多的怨恨，避免天下民众的谴责，这样民众才明显地重归安宁。然而遗留的祸患多年不能消除，创伤至今未能痊愈。因而百官还要施行残忍害人的政治，铁腕宰相仍然有强取豪夺的心理。朝中大臣独揽大权施刑于人，豪强结党欺陵弱者，富贵人家奢侈僭越，贫贱之人掠夺杀人。妇女手工制品难于制作而容易损坏，车辆器具难于做成而容易破损，车子使用不到两年，器具使用不满一年，一辆车价值千石粮食，一件衣服值十钟米。普通百姓在杯上画文采，在几案上画图，几案上酒宴丰盛，奴婢穿绸衣丝鞋，平民吃精米饭和肉菜。

“里巷有自己的风俗，乡党有自己的娱乐场所，人们在宽阔大道上骑马追逐，连偏僻小巷也有人做蹋鞠的游戏，手持耒臿农具、亲身耕织的人少，束腰整容、抹粉画眉的人多。无而强装为有，贫而强夸为富。外表漂亮，却没有里子，绸裤子里面装的是牡麻。父母活着的时候不赡养，死后却要隆重地送葬。葬一个死人几乎要耗尽全部家财，嫁一个女儿要置办满车嫁妆。富人想超过礼节标准，穷人想赶上礼节标准，结果导致富人财产空虚，穷人靠借贷度日。所以民众生活一年比一年窘迫，贫穷就会缺少羞耻，空乏就会不讲廉洁，这就是处罚为非作歹、诛杀邪恶而奸邪仍然不止的原因。因此国家有严厉急迫的征敛，就会产生财富分散、不够使用的毛病。”

# 卷六

## 散不足第二十九

本篇是全书中篇幅最大、难度最大、内容最丰富的篇章。文章由丞相“愿闻散不足”引发，贤良从衣食住行丧祭各个层面铺陈古今社会风尚的变化，以古代的节俭与当今社会的奢侈相对照，说明当今社会财富分散、用度不足完全是由弥漫全社会的豪奢风气造成的。文章展现了一幅幅古代社会生活的多彩画卷，对后人认识古代社会风尚特别是汉代生活风习很有帮助。贤良高举复古的旗帜，批判当时社会的豪奢之风，试图以此矫正社会弊病，用心良苦。全文三十二由“古者”领起的段落蝉联而下，每一段均以上古时代的简朴风尚与近现代的豪奢之风进行对比，按照“富者”、“中者”、“庶人”分层次，极为排奡纵恣。

大夫说：“我原以为贤良会稍微好一些，谁知道他们颠倒了黑暗和光明，文学与贤良，就像两辆匈奴破车，一前一后吱吱呀呀作响。诸位儒生难道看不见夏末的蟪蛄么？夏天它鸣叫的声音声声入耳，秋天来了，声音就全没了。诸位儒生不要轻易地由着性子乱说，不顾后患，要是等到祸患来了而后沉默，那就晚了。”

贤良说：“孔子读史书时，往往喟然长叹，他忧伤的是正统道德的废弃，君臣之道的危机。自古贤人君子，都是以天下为己任。责任重大的人思虑深远，思虑深远的人就会忘记近祸。他们以真诚之心伤悼现实，对天下寄予同情之心，因此忠心孤独而无牵挂。这就是《诗三百》作者感时伤世而创作诗篇，比干、伍子胥舍身忘祸的原因。丑恶现实让人忧愁，如同诗人、比干、伍子胥一样急迫，怎么能保持沉默呢？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说：‘忧愁之心似火烧，不敢戏谑开玩笑。’孔子忙忙碌碌，这是因为他痛恨社会弊病。墨子匆匆忙忙，这是因为他忧伤世道混乱。”大夫沉默不言。

丞相说：“我想听一听关于财富分散、不够使用的问题。”贤良说：“宫室、车马、衣服、器械、丧葬、祭祀、饮食、声色、玩好，这些都是人的性情所不能禁止的东西。因此圣人为此设立制度，以防止僭越。近来，士大夫追求权力财利，轻怠礼义；因而招致百姓纷纷仿效，大大地僭越制度。现在特地将古代制度陈述如下。

“古时候，谷物蔬菜水果，不到成熟的时节不吃，鸟兽鱼鳖，不到该杀的时候不吃。因此弓箭罗网不进山泽，各种毛色的幼小野兽不猎取。现在有钱人追杀网捕，围捕幼鹿和小鸟，他们沉溺于酗酒之中，酒店像百条江河一样多。吃新鲜的羊羔肉，割杀小猪仔，剥黄口小鸟的皮。春天吃小鹅，秋天吃小鸡，冬天吃葵菜和温室种的韭菜，加上香菜、子姜、辛菜和紫苏等调味品，此外还吃木耳香菇，连毛虫、倮虫、狐貉都吃。

“古时候，用栎树做椽子，用茅草盖屋顶，制陶瓦，挖地洞，这些足可以抵御寒暑，遮蔽风雨。到了后来，栎树椽子不砍，茅草屋不修翦，没有砍斫、劈削的事务，也没有木材打磨光滑的工夫。大夫家做成有棱角的柱子，士家将柱子头部砍细，庶人用斧子砍伐木头盖成房屋而已。如今富贵人家屋顶上有藻井，门槛和栏杆上雕刻花纹，用白灰粉刷墙壁。

“古时候，衣服不符合规定，器械不适合使用，不准拿到市上去卖。如今民间雕琢不中用的物品，刻画无用的好玩器具。一些艺人穿着黑色、黄色、杂青色以及五颜六色锦绣彩衣，演出模仿僰人妇女生活的戏剧，有的艺人玩弄各种野兽、马戏、斗虎，有的艺人玩木偶、泥人爬竿，或玩鱼龙杂技，花旦唱戏等等。

“古时候，诸侯不喂马，天子有命出征，随车就地放牧。庶人乘马出行，足可以代其步行、免其劳累而已。因此出行时就将马匹套上车，不出行就用马拉犁。如今富贵的人车马排成行列，有用三匹马驾一辆车，有用两匹马拉一辆车，有人乘坐有帷盖的辎车，妇人乘坐四面有帷的车。中等人家也有小车，马鬣上有装饰，马蹄钉有铁掌。喂一匹马，需要中产家庭六口人的粮食，还要陪上一个壮年男子的劳力。

“古时候，平民百姓要到老年才穿丝绸衣服，其余的平民只能穿麻布衣服，因此称平民为布衣。到了后来，人们的衣服是用丝绸做面子，麻枲做里子，斜直衣领而没有蔽膝，袍子合缝，但不必修饰边缘。轻软丝绢上绣上花纹，这是君主后妃的衣服。粗绸和细绢，是结婚时才穿的好看衣服。所以那些带有文采的细薄丝织品，不会拿到集市上去卖。如今富贵人家穿的是绣有繁缛花纹的轻软细绢，中产阶层穿的是光滑厚实的白丝或洁白如冰的锦衣。普通百姓穿上后妃才穿的衣服，卑贱妇女穿上结婚时才穿的服饰。细绢的价格比粗绢价格贵一倍，而粗绢的使用价值比细绢大一倍。

“古时候，独轮车没有边框，竹木车没有栏杆。到了后来，车厢有了栏杆但不加装饰，长长的轮轴，密集的辐条，把蒲草绑在车轮上，用草编成车盖，车盖上没有油漆、丝绸的修饰。大夫和士的车是用木料制成的车轮边框，用软熟兽皮盘在车轮的边框之上。普通百姓的车是油漆的车厢，独轮车加上长长的横木。如今平民和富贵人家，车盖上装饰着用白银、黄金镶嵌的玉瑵，登车拉手用绳子打成花结，用熟皮缠裹车辕。中产人家的车马是镶金的涂有色彩的马嚼子，用珠玉装饰马肚带，用珠玉装饰马和车窗。

“古时候，人们穿鹿皮制作的衣裘，戴兽皮帽，连兽皮上的蹄足都没有除去。到了后来，大夫和士穿狐貉皮毛制成的大袖衣，用羊羔皮做皮袄，用豹皮做袖口。平民百姓穿毛皮制作的套裤和短袖衣，有的穿公羊皮袄和杂兽皮制作的短袄。如今富贵人家穿灰鼠皮和貂皮制作的皮袄，有的穿白狐皮袄或鸭绒袄。中产人家穿金丝线缝制的绒衣，有的穿燕地濔鼠皮袄和代地黄貂皮袄。

“古时候，平民百姓骑马不用鞍勒，只凭绳子控制，骑手脚穿特制皮靴，在马背上加块皮垫子而已。到了后来，马鞍用皮革和牦牛毛制成，铁制的马镳不加修饰。如今富贵人家用皮革做马的耳饰，用白银做马的头饰，用黄金做成闪闪发光的马笼头，用绣花毛毡做马的防汗布，用垂棘美玉作马的耳饰，用鲜卑腰带作马的肚带。中产人家的马匹用油漆的皮绳拴结，在马具上作彩绘后在日光下晒干。

“古时候，人们挖个小坑当水池，用手捧水喝，没有酒杯和盛菜器皿。到了后来，平民百姓用竹子、柳条编织器具，用泥土制作陶器，用葫芦当水瓢。只有用做祭祀的瑚、琏、酒杯、豆盘才雕刻花纹，涂上红色油漆。如今富贵人家以白银装饰器物口部，以金铜装饰器具两耳，用黄金、珠玉制作酒杯。中产之家用野王出产的苎麻制造漆器，用蜀郡器材制作镶金的酒杯。一个绘有花纹的杯子的价钱相当于十个铜杯，铜杯价格低廉，而用途没有两样。箕子讥刺殷纣王使用象牙筷子，讽刺对象是天子，如今平民百姓也像天子一样豪奢了。

“古时候，人们烧烤黄米，吃稗子杂粮，招待客人才杀猪。到了后来，乡里的人在一起饮酒，老人吃的是几盘肉食，年轻人站着吃饭，一盘酱一盘肉，在一起按序喝酒而已。再到后来，人们举行婚礼招待客人，用豆盘盛肉汤，加上米饭，还有切细的肉块和熟肉。如今民间招待酒食，鱼肉重迭，烤肉摆满食案，炖熟的甲鱼，细切的鲤鱼肉片，还有鹿胎、鹌鹑、枸酱、鲐鱼、鳢鱼、肉酱、酸醋，各种味道杂陈。

“古时候，平民百姓春夏季节耕耘，秋冬季节收藏，从早晨到黄昏都在努力耕作，夜以继日地干活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说：‘白天去割茅草，夜里去搓绳索，赶快登屋盖房，开始播种百谷。’不是膢腊节日就不得休息，不是祭祀就没有酒肉。如今结婚宴请宾客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喝酒喝得大醉，十个人醉倒五个，抛弃了正事也要相互奉陪，几乎没有一天不是这样。

“古时候，平民百姓吃粗粮野菜，如果不是乡人饮酒、膢腊祭祀节日，就没有酒肉。因此诸侯无事不杀牛羊，大夫和士无事不杀狗猪。如今乡里闾巷豪强，农村屠夫和酒家，无事也会随意烹杀牲畜，在野外相聚吃喝。背着粮食出去，提着肉食回来。一头小猪的肉，价值相当于中等年景一亩地的收成，等于十五斗小米，相当于壮年男子半个月的口粮。

“古时候，平民百姓用鱼和豆类祭祀，春秋季节修治祖庙。士人一座宗庙，大夫三座宗庙，按照一定时间举行户、灶、中霤、门、行五神的祭祀，没有家门以外的祭礼。如今富贵人家祈祷著名的五岳，望祭山川神灵，击杀耕牛，敲锣打鼓，演戏跳舞，表演木偶。中产人家南向祭神，在水上搭建高台，屠羊杀狗，鼓瑟吹笙。贫苦人家祭祀时也用鸡猪五味，祈求神灵保佑，祭后散发祭肉，祭祀时车盖如云，挤满祭场。

“古时候，人们用自己的德行求得福报，因此祭祀祖宗神灵时心理放松。用自己的仁义行为求得吉利，因此卜筮次数稀少。如今世俗放松自己行为，而去求鬼神保佑，怠慢礼义而厚于祭祀，轻侮父母双亲而看重权势，极端狂妄却迷信占卜的日者，听信占卜人的欺骗言论，侥幸获得好运，付出的是实物，享受的却虚无的幸福。

“古时候，君子早晚勤奋地思考如何提高德行；小人昼夜努力地思考如何使用劳力。因此君子不会白吃饭，小人也不会不劳而食。如今世俗弄虚作假，招摇撞骗。女巫男祝替人求神祷告，拿剩余祭肉来作报酬。他们有坚实的脑门善于磕头，有强健的舌头能说会道。有的人巫祝为业，发家致富。因此有些不愿干农活的人，放弃务农根本，去学做巫祝。所以大街小巷都有女巫，乡里都有男祝。

“古时候，没有木制的床架，床上也没有炕桌。到了后代，平民百姓用柞木做床沿和床板，士人的床不用斧子加工，大夫只是睡芦苇、蒲草席子而已。如今富贵人家张设绣有黑白花纹的帷帐、描有花纹的屏风以及镶有金边的屏风底座。中产人家用丝锦缝制高大的帷帐，床上绘有彩色图画，涂上红漆。

“古时候，人们铺的是野兽皮毛和草席，没有茵草席子，也没有美丽的毛毡和蒲草席。到了后来，大夫和士铺的是边缘粗糙的两层草席，有的是用香蒲编成的席子或用莞草编成的单席。平民百姓铺的是用细绳做经线编成的草席，有的是用蔺草编成的单席，或者是用竹或苇编的粗席。如今富贵人家铺的是用野鸡毛制成的绣花软褥，露床上铺着蒲席。中产人家铺的是滩羊皮或代地毛毡，床前的踏脚板上都铺着莞草垫。

“古时候，不卖熟食，不在市场上买卖食物。到了后来，就有了屠户和酒家，只卖酒、肉脯、鱼和盐而已。如今卖熟食的遍地都是，好吃的东西摆满市场，有些人产业虽然荒废懈怠，但吃东西却务求赶时令：烤小猪，韭菜炒鸡蛋，切细的狗肉和马肉，油煎的鱼，切好的肝，腌制的羊肉，凉的鸡肉，用马奶做的酒，蹇驴肉干，动物的胃脯，煮烂的羊羔肉，加上豆豉，炖小鸟，雁肉汤，臭鲍鱼，甜瓠子，精熟的米饭，烧烤的猪肉。

“古时候，人们堆土为鼓，敲打土块，敲击木棍，拍打石头，以尽情欢乐。到了后来，卿大夫有竹管吹奏，石磬敲打，士人有琴瑟弹奏。从前，民间举办酒宴聚会，各自以不同的乡党习俗，弹筝鼓缶而已。没有美妙悦耳之音，也没有曲调的转换。如今富贵人家有钟有鼓，五乐齐全，歌手分列几队。中产人家吹竽弹瑟，表演郑地舞蹈和赵地歌曲。

“古时候，用陶土烧成的棺材收殓尸体，或在木棺周围砌土砖，足可以收藏死人的形骸、头发和牙齿。到了后来，桐木棺材不加修饰，用柞木做外棺，木材不再加工。如今富贵人家灵柩车辆布帷上绣有花纹，棺椁四周堆积木材，木头向内聚拢。中产人家用珍贵的梓木和楩木做棺椁。贫穷人家埋葬死人，棺材上盖着有画的布罩，或者把尸体装在丝织袋里面。

“古时候，随葬的明器仅有形状而不实用，以此告诉民众，明器不可用。到了后来，随葬物之中有了醋、酱，还有桐木制作的马和陶俑，以此完成祭礼，祭品并不完备。如今斥巨资多买东西随葬，随葬器物如同活人用的一样。郡国管徭役的小官吏，生前平常乘坐的是桑木车，而死后随葬的木俑车却有高楼大轮。平民活着没有披肩，死后随葬的桐木俑却穿丝绸。

“古时候，不堆土为坟，墓旁不栽树，下葬之后，回家在停尸之处祭祀，没有祭坛，也没有祖庙。到了后来，人们就堆土为坟，平民的坟大约四尺高，站在坟边可以把手放在坟顶上。如今富贵人家下葬时积土成山，列树成林，高台亭榭连成一片，庙宇成群，高楼入云。中产人家祠堂外有月照壁，还有墙垣、望楼和屏风。

“古时候，邻居有丧事，舂米时不唱劳动的号子，里巷不唱歌谣。孔子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，未尝吃饱过；孔子在这一天哭泣过，就不再唱歌。如今风俗，借别人家的丧事来求得酒肉，碰巧到办丧事人家小坐，就要求人家置办酒菜。别人丧事期间，有人唱歌跳舞演戏，滑稽搞笑，观看杂技。

“古时候，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已经很久远了，但上古时期的嫁娶服饰，未能记载下来。到虞、夏以后，婚嫁服饰是外面穿布的，里面穿丝的，用兽骨做发簪，用象牙做耳环，受封的君主夫人和贵族女子的婚服，也只是在锦衣之上再加一件麻布罩衣而已。如今富贵人家嫁娶穿大红的貉皮衣服，佩戴的珠玉如同露珠。中产人家长襟的下摆与蔽膝相交接，以瑞玉为簪珥。

“古时候，父母活着的时候，对父母尽爱慕之心；父母去世，为父母送丧尽悲哀之心。因此圣君事奉父母规定礼节，并不是凭空强加。如今父母活着，不能对父母表达爱敬之心；父母死后，却互相以奢侈攀比高低。虽然没有悲哀之心，但那些花大钱大操大办的人，被人们称之为孝子，在社会上树立了显赫名声，在世俗面前无上光荣。因此平民相互羡慕仿效，甚至于出卖房屋和产业。

“古时候，夫妇相好，一男一女，组成一个家庭。到了后来，士人有一妾，大夫有二妾，诸侯也只有侄女、妹妹九个女子而已。如今诸侯妻妾上百人，卿大夫妻妾几十个，中产人家有一些婢妾，富贵人家妻妾满室。所以有些女子怨恨失去青春，有些男子到死也没有配偶。

“古时候，凶年没有储备，丰年把不足的粮食补上，按照老规矩办事而不改变。如今工匠有变化，官吏变了心思，抛弃过去成功的做法，来藏匿自己真实的私心。心里想得最多的是功利，却要务求保存淡泊名利的面目。积累功劳来换取名誉，不体恤民众的困苦。田野不去开垦，却去修饰来往必经的村落，城邑住宅变成荒丘废墟，却不断增高城郭。

“古时候，人们不会以人力去伺候禽兽，不掠夺民众财产来养狗马，所以财富丰饶而劳力有余。如今猛兽奇禽不可以用来耕耘，却命令耕耘者去养食它们。有的百姓粗布短衣都不齐全，而富贵人家的犬马却穿绣花衣服，有的平民连糟糠都吃不上，而富贵人家饲养的禽兽却喂食大米肉类。

“古时候，君王严肃恭敬地处理政事，爱护下民，按照空闲时节使用民力。天子以天下为自己的家庭，臣下妻妾各自按照规定时间供奉公职，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。如今各级官府蓄养了许多奴婢，坐享衣食，私自经营产业，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干私活无限卖力，官府失去实际利益。有的百姓家中没有升斗粮食储备，而官府奴婢却积累百金家私；平民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，奴婢却垂衣拱手，四处闲逛。

“古时候，亲近邻而疏远人，看重本民族，贱视其他民族。不奖赏无功之人，不供养无用之辈。如今蛮、貊少数民族没有功劳，却在官府里傲慢放肆，住在宽广的大宅里，坐享官府提供的衣食。有的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蛮夷少数民族却酒足饭饱。平民汗流浃背努力劳作，蛮夷少数民族却交叉两腿放肆地坐着。

“古时候，平民百姓穿的是草鞋，用丝绳和皮条系着鞋。到了后来，就穿结带的麻鞋，或穿系鞋带、加木底的皮鞋。如今富贵人家聘请著名鞋匠，制作轻软美观的皮鞋，用细绢做鞋里，用绦带装饰鞋底，用绒布修饰鞋头、鞋跟和鞋口。中产人家用邓、苞草做草鞋，用蒯草做鞋底。愚蠢单仆和婢妾，都穿皮鞋或丝鞋。跑腿的人穿软底鞋，鞋头上有装饰。

“古代圣人勤劳身体，保养精神，节制欲望，表达性情适中，尊敬天神地祇，践行道德，修行仁义。所以上天为之感动，让他长期统治下民，保佑他延年益寿。因此帝尧眉清目秀，满面红光，享有国家长达百年。到了秦始皇，喜欢怪诞迂腐，相信吉凶征兆，派燕人卢生去追求仙人羡门高，又派徐巿等人进入大海，替他寻求不死之药。那个时候，燕、齐的方士，放下锄头耒臿，争先恐后地谈论神仙。方士于是奔赴都城咸阳的人多达数千，他们说仙人食金丹，饮珠丸，这样人的寿命与天地同在。于是秦始皇屡次巡狩五岳和海边行宫，以此寻求蓬莱等仙山神仙。屡次驾临到全国各郡县，富人用资财提供费用，穷人为皇帝修路。后来，小户人家逃亡，大户人家躲藏；官吏搜捕，强迫他们驯服，不讲任何道理。著名行宫之旁，平民房屋空虚衰落，没有活着的树苗，也没有立着的树木；百姓离心离德，十个人中就有五人怨恨。《尚书·洛诰》说：‘享礼有多种礼节仪式，如果礼物丰盛而礼仪疏略，那就叫做不遵守享礼。’因此圣人不是仁义的事决不去做，不是正道就不再向前走。所以已故武帝诛灭文成将军、五利将军等方士。皇帝建立学官，亲近忠良之臣，就是想以此断绝怪诞邪恶的端绪，彰显最高道德的途径。

“宫室奢侈，是林木的蛀虫。器械雕琢，是财用的蛀虫。衣服华丽，是布帛的蛀虫。狗马吃人的粮食，是五谷的蛀虫。口腹放纵恣意，是鱼肉的蛀虫。用费不节制，是府库的蛀虫。漏水淤积不堵塞，是田野的蛀虫。丧礼祭礼无节制，是伤害活人的蛀虫。毁坏成规，改变旧法，会伤害事功，工商官营，就会伤害农业。因此，制作一个杯盘，需要花费上百人的气力，一扇屏风的制作，需要耗费上万人的工夫，它们所造成的祸害也够多了！眼睛沉迷于五色，耳朵沉醉于五音，身体穿尽轻薄衣服，嘴巴吃尽甜脆食物，工夫都花在无用之事上，财富全用在不急事务上。口腹不能吃得太多。因此，国家有聚积不足的弊病，就会造成政事懈怠，一个人如果有聚积不足的毛病，身体就会危险。”丞相说：“如何治理聚积不足的弊病呢？”

## 救匮第三十

本篇记载大夫与贤良就如何挽救财政匮乏问题而展开的论争。贤良认为导致国家财政匮乏的根本原因是权贵阶层的豪奢之风，要求公卿大夫子孙做到节制车马，衣着适当，亲身节俭，以敦厚朴实作为民众表率，罢弃园林池苑，减少良田豪宅。大夫举公孙弘、倪宽为例，说明朝廷大臣垂范节俭并不能解决财政匮乏问题。大夫进而指出，贤良作为旁观者，很容易品头论足，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对此，贤良认为财政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吏治腐败，朝臣权贵丧失了礼义廉耻之心，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。如果不杜绝权贵豪奢之风，即使是伊尹、吕望再世，也不能扭转当前的匮乏颓势。

贤良说：“应该用直来矫正弯曲，用质朴来纠正文彩过盛。从前，晏婴担任齐国国相，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。因此，如果民风豪奢，当政者就应该以俭朴示民；民风俭朴，当政者就应该以礼仪示民。现在公卿大夫的子孙，如果真能做到节制车舆豪奢之风，衣着适当，亲身节俭，以敦厚朴实作为民众表率，罢弃园林池苑，减少良田豪宅，官府在都邑内不要开店经商，在野外不要开辟山林池苑，这样，农夫就能有田种，妇女就能卖出纺织品；就如同一个气脉和平的人，没有气脉不畅或气虚血亏的毛病。”

大夫说：“孤儿喜欢谈论孝道，跛子喜欢谈论拐杖，穷人喜欢谈论仁慈，贱人喜欢谈论治理国家。由于他们所议论的对象不是自己，因此他们容易夸夸其谈，站在一旁议论他人容易讲得头头是道，而当局者就容易陷入迷乱。因此，公孙弘盖布被，倪宽穿素袍，衣着如同仆妾，食物宛若雇工。可是国内有淮南王刘安叛逆，境外有蛮夷横暴骚扰，盗贼并不因为公孙弘、倪宽俭朴而停止偷盗，社会奢侈之风并不因为他们俭朴而得到节制；这就如同瘟疫之年的巫师一般，仅能摇唇鼓舌，哪能解决财物耗散、财用不足的问题呢？”

贤良说：“高祖皇帝时，有萧何、曹参为朝廷三公，有滕公、灌婴等人为九卿，人才济济，这些人都堪称是贤能之士。文帝、景帝之际，武帝建元初期，朝廷大臣还具有谏争辅导、坚守正道的精神。建元之后，朝廷大臣大多奉承皇帝旨意，顺从君主欲望，很少有人敢于说真话，不能当面谏争讽刺，而是假公济私。像武安侯田蚡身为丞相，却与同僚争夺园田，到皇帝面前争辩是非曲直。九层楼台一旦倾斜，即使是公输班也不能修正；朝政一旦走上邪路，即使是伊尹、吕望也不能匡复。因此公孙弘丞相、倪宽大夫谨慎戒惧，遵行正道，分出自己的俸禄来养贤士，放下身段，礼贤下士，功业显著，可惜的是他们年老，精力不足，没有像春秋郑国行人子羽、东里子产那样的继承人。而葛绎侯公孙贺、彭侯刘屈氂等人，毁坏公孙弘、倪宽的礼贤下士事业，扰乱朝廷纲纪，毁坏当年公孙丞相礼待贤士的客馆议堂，作为马厩和妇人宿舍，丢弃养士之礼，崇尚骄傲怠慢之色，礼义廉耻日趋衰败，大臣纷纷争利于朝。因此到处是权贵豪强的良田广宅，民众没有容身之所；朝廷和集市都充满了不知羞耻、追名逐利的小人，园田牧场充斥了天下各个郡县和封国，权贵们态度横暴，对民众动辄拖拉牵曳，豪门大宅的旁边，连道路都不准通行，这种情况本来就难以医治，不可能做出治理功效。”大夫突然变了脸色，默不出声。

## 箴石第三十一

本篇原题“盐铁箴石”，据张敦仁说校删。箴石是治病的工具，此处用以比喻治国手段。丞相批评文学、贤良像剑客、博弈者一样言辞过激，态度不够谦逊，让朝廷官员蒙受不仁不义、吃白饭的恶名，使主管官员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文学、贤良的建议。丞相进一步指出，即使让这些文学、贤良当朝理政，他们也未必能够对症下药，医好社会的疾病。贤良则认为，贤士无论是建言献策还是付诸行动，都非常不易：如果对社会痼疾痛下针砭，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：如果将治国韬略收藏起来，又会被人们视为缺乏才能。对此，贤良发出君子人生道路本来就十分狭窄的感叹。

丞相说：“我听《郑长者》一文说过：‘君子端正自己的脸色，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怠慢；说话时注意言辞语气，就可以避免粗野和错误。’因此君子的言论可以称述，行为可以效法。这是主管官员向来愿意看到的。至于像剑客那样激烈地争论高下，像博弈者那样犀利地指责对方，辞色俱厉，互相辩论，试图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，不能互相宽容，这让主管官员不能采纳贤良的建议，而贤良、文学也因此蒙受了不谦逊的名声，我私下认为各位先生的态度不可取。名家公孙龙说过：‘辩论是为大道而辩，因此辩论时不可以不注意，双方注意互相纠正，结果归于争辩，争辩而不相让，就会进入粗野。’如今主管官员被文学、贤良视为不仁，又蒙受白吃饭的恶名，看来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弥补雪耻了。朝廷征召你们这些贤良、文学，如果等到你们以亲民的名义当了高官，也不见得你们有高超手段来医治百姓的疾病。”

贤良说：“贾山说过：‘说话恳切，就会因为言辞浅显，对方听不进去；说话深刻，就会忠言逆耳，达不到劝谏目的。’因此俗话说：‘言谈何曾容易。’言谈尚且不容易，何况去行动呢？这就是胡建不得好死，吴得差点不免于祸患的原因啊。谚语说：‘五个盗贼就可以制服一个良民，弯曲树木厌恶取直的准绳。’现在即使想下药治病，打通关节和横膈膜，也怕有类似于成颙、胡建的连累，如果将医药收藏起来，又会蒙受医术不高的恶名。《诗经·豳风·狼跋》说：‘老狼前行就会踩着颈下垂肉，后退就会被尾巴绊倒。’君子的道路，无论是前行还是止步，路本来就狭窄啊。这就是公孙龙当年叹息的原因。”

## 除狭第三十二

在《箴石》中，贤良感叹“君子之路，行止之道固狭耳”。本篇紧承上文，大夫以郡守、国相为例，说他们处于古代方伯的地位，接受天子之命，独断专行，统治千里之地，不受朝廷钳制。大夫进而指出，人之善恶穷通全在自己，不能说人生道路狭窄。贤良则认为，当代朝廷已经抛弃了古代层层选拔贤能的优良传统，选吏之道混乱，公开卖官鬻爵，一批无才无德的封疆大吏统治千里之域，独揽民众生杀大权，这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。贤良提出，朝廷选贤要出自公心，悬赏以等待民众立功，排列爵位来等候贤能，推举善人如恐不足，罢免恶人如同对待仇敌，这样才能建立清明的吏治。

大夫说：“贤士处于大山深林，遭遇暴风雷雨而不会迷失方向。愚昧的人即使是走在平坦宽敞的大路上，仍然会感到昏暗迷惑。现在，郡守、国相亲自与天子分剖信符，接受赞礼拜官，他们莅临一郡民众之上，这相当于古代诸侯方伯的地位啊。他们受天子之命，独断专行，统治千里之地，不受朝廷钳制；名声或善或恶，全在于自己，恶名是由于自己没有能力的缘故，哪里有什么道路狭窄之说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贤士处于大山深林，遭遇暴风雷雨而不会迷失方向。愚昧的人即使是走在平坦宽敞的大路上，仍然会感到昏暗迷惑。现在，郡守、国相亲自与天子分剖信符，接受赞礼拜官，他们莅临一郡民众之上，这相当于古代诸侯方伯的地位啊。他们受天子之命，独断专行，统治千里之地，不受朝廷钳制；名声或善或恶，全在于自己，恶名是由于自己没有能力的缘故，哪里有什么道路狭窄之说呢？”

贤良说：“古代推贤进士，从乡到里，层层选择，评论其人的才能，然后给他官职，若能胜任职位，然后再封爵授禄。因此，贤士在乡里修炼道德才能，通过选择升到朝廷；在偏远之处修行，出仕之后则处于众人瞩目的显著地位。即使与朝廷关系疏远，录用时也不要漏掉贤士；无论功劳小大，奖赏时也不要有所遗漏。由此贤才得到提拔重用，不贤的人经检查后予以罢免。如今任用官吏之道杂乱无章，丢弃了传统的选拔做法，富人用钱买官，勇士通过死战求功。戏车玩鼎的杂技之人，都出来补任官吏，一天天积累功劳资历，有的人官至卿相。他们佩带青绶，贯穿银龟官印，独揽杀生权柄，专断万民性命。如果这些官员性格懦弱，那就如同让一只羊统率狼群，肯定会酿出混乱。如果这些官员性格强悍，那就等于授利剑给狂夫，肯定会胡乱杀人。因而过去郡县、侯国百姓相互侵陵而得不到治理，有时候甚至锯脖子、杀无罪而得不到纠正。执掌国家纲纪的官员不由正道，大概社会混乱会越来越厉害。古时候，天子封爵贤能，方园不超过百里；在百里中心建立都城，从都城到边境不超过五十里，天子还以为仅凭诸侯一人之身，视力有看不到的地方，听力有达不到的地方，因而设立卿、大夫、士来辅佐诸侯，这样诸侯国的行政治理才算完备。如今郡守、国相可能不及古代诸侯贤能，却让他们主管千里政务，主宰一郡民众，要求他们广施圣主恩德，独揽生杀法令，使命极为重大啊。如果不是仁人就不能胜任郡守和国相，如果不是贤人就不能施行正确的治理。郡守、相国以一人之身，治和乱全在于郡守、国相自己，方园千里的治乱都随着郡守、国相一人才德而变化，这样的职位是不可以不认真选择的。所以人主可以用财富来奖赏他所偏爱的人，而不是用官爵来奖赏他所偏爱的人，朝廷悬赏以等待民众立功，排列爵位来等候贤能，推举善人如恐不足，罢免恶人如同对待仇敌，这本来就是因为恶人没有功劳而残害百姓啊。辅佐君主的德政，开通臣民的仕途，在于选用贤能，重用他们，挑选郡守、国相然后加以任用。”

## 疾贪第三十三

本篇论辩的主题是官员贪鄙问题。贤良认为古代官吏俸禄优厚，各级官员可以依靠俸禄过上体面生活，不必通过贪污来谋取利益。汉代官员俸禄微薄，造成官员上下贪鄙成风。解决贪鄙的方法是朝廷高官率先垂范，“贪鄙在率不在下，教训在政不在民”。大夫认为，官员是廉洁还是贪鄙，都是出于各人的天性，“贤不肖有质，而贪鄙有性，君子内洁己而不能纯教于彼”。对此贤良进一步指出，贪鄙根源在朝廷上层，不要把贪鄙责任推给下层百姓，朝廷应该通过教化，适当辅以刑诛，来改变官员贪鄙之风。

大夫说：“是的。譬如医生，医术已经够拙劣了，还想多得酬金。做官已经做了很多缺德事了，还想进一步侵夺百姓。大官残害小官，小官残害百姓。因此不必担忧朝廷选择官员不慎重，而应该担忧人们心目中所求贤才与实际录用的官员不一样；不必担忧朝廷的人才选拔不够，而应该担忧官员贪得无厌。”

贤良说：“古代制定官爵俸禄，卿和大夫的俸禄足可以资助贤士，士的俸禄足可以优待自身和亲族，普通人做官，足可以代替耕种，依靠俸禄生活。如今小吏俸禄微薄，各地郡国徭役出差，有时要远赴三辅地区，粟米价贵，俸禄不足以养活自己。日常家居开支就感到衣食匮乏，家中若有变故就要卖掉家畜产业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要充当徭役差使，不时遭到地方官府追索财物，那些上报统计的小官和有权的大吏，或要求民众布施，或强行借贷，长官侵夺，郡国衙门向下级县衙索求，县府向乡索求，乡又从哪里索取呢？谚语说：‘贿赂流行，如同水向下流，不流尽就不会停止。’大川江河流向大海，大海接纳了，而要小溪河谷拒绝路边雨水；在朝政腐败形势下要想百官廉洁，是不可能的。要想影子正，先端正标杆，要想下级廉洁，长官先要自身做表率。因此贪污粗鄙根源在长官而不在下级，教诲训示的重点在朝政而不在民众。”

大夫说：“贤与不贤各有品质，贪婪粗鄙自有天性，君子可以做到自己廉洁，而不能教育那些贪鄙之人纯洁。因此，周公并不是没有矫正管叔、蔡叔的邪恶，子产也不是没有纠正邓析的邪说。像管、蔡那样不听从家中父兄教诲，像邓析那样不怕国家刑法定罪，周公、子产不能教化他们，这是肯定的。现在你们将官吏贪污归责于朝廷官员，朝廷官员总不能把贪官污吏手脚绑起来，不让他们为非作歹吧？”

贤良说：“驾车的驷马未能驯服，这是驾车人的罪过。百姓得不到治理，这是主管官员的罪责。《春秋》的刺讥对象不涉及庶人，仅追究长官的责任。因此，古时候大夫监督执行死刑，停止歌舞娱乐，死刑执行完毕，还多次为之嗟叹。这是官员耻于不能教化、感伤罪犯尸身不全啊。政治教化昏暗不明，百姓跌倒而不去扶起，如同婴儿走到井边，听任婴儿跌进井内。如果像这样，拿什么去做民众的父母官？所以，君子急于教化，缓于用刑。对一个人用刑，要起到纠正一百个人的作用，杀一个人，要使一万个人小心谨慎。所以周公才诛杀管叔、蔡叔，子产才诛杀邓析。刑罚诛杀一旦施行，百姓就会遵循礼义了。在上的官员教化下民，如同大风吹过、杂草倒伏一样，百姓没有不顺从教化的。何必要一一将他们手足捆绑起来呢？”

## 后刑第三十四

本篇聚焦用刑问题。大夫认为“人君不畜恶民，农夫不畜无用之苗”，主张杀一儆百，“刑一恶而万民悦”，强调以严刑治国，从中可以看出大夫的法家思想立场。贤良虽然也认为刑罚对于治国不可或缺，但并不赞成一味地依靠刑杀，而是主张通过制定刑罚来起到威慑、警戒的作用，以期收到“威厉而不杀，刑设而不犯”的效果。贤良认为治国要先德而后刑，把政治教化放在第一位，并特别强调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，提倡“民乱反之政，政乱反之身，身正而天下定”。

大夫说：“古代的君子，肯定善人，厌恶恶人。君主不愿蓄养坏人，农夫不愿保留无用的莠苗。无用的莠苗，是禾苗的祸害；无用的坏人，是民众的祸害。锄除一株害苗，众多禾苗就健康成长；杀掉一个坏人，万民为之喜悦。即使是周公、孔子当政，也不能放弃刑罚而任用坏人。家中有娇子胡闹，器皿就不能保存，何况国家有娇民呢！百姓受到怜爱就会骄傲，面对刑罚就会听从。因此刑罚是用来矫正百姓不法行为的，锄头是用来辨别良苗与莠草的。”

贤良说：“古时候，厚于教化来引导民众，公布法令来端正刑罚。刑罚对于治国，如同鞭子对于驾车。优秀车夫不能不带鞭子就去驾车，也不能有鞭子而不使用。圣人借助法令来完成教化，教化成功了，刑罚就不必施用。因此法令威猛严厉但不一定要杀人，刑罚设置就没有人敢于触犯。如今纪纲坏废而不能施张，毁坏礼义而不能防范。民众陷于法网，官府随后用刑捕猎，这如同打开其猎物栏圈大门，再射出毒箭，不杀尽就不停止。曾子说：‘在上位的失去正确的治道，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。如果你审出罪犯真情，就哀怜同情而不要窃窃自喜。’不去感伤民众得不到治理，反而夸耀自己能够审出真情，这就如弋猎者看到鸟兽闯入罗网而自喜。现在天下被诛杀的人，不一定有管叔、蔡叔那样的邪恶，或邓析的伪学，恐怕是禾苗锄尽了还辨别不出良莠，民众狡诈而得不到治理。孔子说：‘一个人如果不仁，痛恨他太厉害，这是致乱之源。’所以，民众出了乱子，就返回到政治，政治出了乱子，就返回到自身修养，身子正了，天下安定。因此君子表彰善良而同情无能的人，恩惠施及受刑之人，德惠润泽到穷人，施予恩惠是令人高兴的事，执行刑杀并不让人快乐。”

## 授时第三十五

本篇讨论如何对待农民贫困问题。大夫首先指出，部分民众贫穷是由于他们懒惰奢侈造成的，朝廷不应该同情此类懒惰之人。贤良指出，民众的勤懒完全有赖于朝廷的政治教化。大夫进一步申辩，以为部分民众贫穷困乏是由于他们干活不卖力，用财不节制。贤良按照孔子提出的从“庶之”“富之”到“教之”的治民路线，主张先让民众富裕起来，再对他们进行礼义教化。大夫诉苦说，朝廷已经实施劝农、赈贷政策，可是仍然解决不了民众贫穷问题。贤良认为，鼓励农耕关键在于不误农时，而不是搞一些悬挂青旗、鞭策土牛的劝农形式。

大夫说：“共同居住在一个地方，处于同一个时代，如果不是遇到天灾、疾病、瘟疫，唯独有少数人贫穷，那么这些人不是因为懒惰就是由于奢侈；没有特殊产业和额外收入，而仍然生活富裕，那么这些人不是因为勤俭就是由于力耕。如今你说什么‘施予恩惠是令人高兴的事，执行刑杀并不让人快乐’；这是同情品行恶劣之人，养活懒惰奢侈之民。所以，胡乱赐予不能叫恩惠，施惠给恶人不能叫仁爱。”

贤良说：“夏、商、周三代兴盛之际没有叛乱民众，这是教化的结果；夏、商末世没有顺从民众，这是出于末世的风俗。因此王者设立学校，宣明王道教化，用来预防疏导民众，等到政治教化和谐的时候，人民品性就会变为仁义，知道什么是善。因此，如果礼义得以确立，那么耕田的人就会在田野礼让；如果礼义败坏，那么君子就会争于朝廷。人人相争，社会就陷入混乱；社会混乱，就会导致天下财富不平均；因此有人贫穷，有人富裕。富裕就容易产生仁义之心，丰足就会使争夺停止。薄暮黄昏时去敲人门户，向人求借水火，即使是贪婪的人也不会吝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由于经济富饶啊。执政的人如果使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，那么民众哪里会有不仁的呢！”

大夫说：“下棋赌博、驱马追逐的人，都是富人子弟，并不是衣食不足的人。因此民众丰足就会僭越礼制，富裕就会骄傲奢侈，他们坐下来从容自得，站起来就为非作歹，没有见到过他们有什么仁义举动。办事不尽力，用财不节制，即使家财如同水火一般多，贫穷困乏也会指日可待的。民众不从事储蓄，主管官员即使帮助他们耕田织布，他们能够富足吗？”

贤良说：“周公辅佐成王时，百姓丰饶快乐，国家没有穷人，周公并没有代替百姓耕田织布。让民众修治田地，减轻他们的赋税，这样民众就自然富足了。百姓对上可以事奉君主和父母双亲，对下没有饥寒之忧，这样教化就可以成功。《论语》说：‘百姓已经富裕了，又该做什么呢？孔子说，教化他们。’用道德教化他们的思想，用礼仪整齐他们的行为，那么民众就会向往礼义追随善良，没有人不做到进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兄长，这样哪里会有什么奢侈、粗暴、怠慢的事？管仲说：‘仓库储满粮食，民众就会知道礼节；百姓丰衣足食，就会知道荣辱。’所以富裕的民众容易向往礼义。”

大夫说：“朝廷对于百姓，就像慈父对待子女一样：对他忠心，能不教诲他吗？对他疼爱，能不让他勤劳吗？因此立春季节，天子亲耕籍田来劝勉农夫，赈济借贷来补助那些衣食不足的人，疏通积水，放出牢房中罪轻的犯人，以便让民众抓紧农时。百姓蒙受天子的恩泽，但至今仍然贫困，让他们走上正道是如此的困难啊！”

贤良说：“古时候，到了春天，官员省视春耕，补助农夫工具、种子的不足，到了秋天，官员省视秋收，补助粮食歉收的农户。民众财源枯竭，就减少赋税；民众劳力缺少，就减少土木徭役。为民众爱惜劳力，不争夺农夫片刻时光。因此，西周召伯在甘棠树下听讼断案，他是担心妨碍农业事务啊。如今时雨滋润万物，可是农夫的种子悬挂在墙上而不能及时播种，秋天庄稼凋落在田野里而得不到收获。在荒年田地寸草不生，村落却成为集市，开春之后，官府悬挂青色旗幡，鞭策泥土雕塑的牛，这恐怕不是英明君主劝勉耕稼的本意，也不符合朝廷颁布春耕令的精神。”

## 水旱第三十六

本篇记载了大夫与贤良三轮论辩。在第一轮中，大夫提出水旱灾害是自然现象，而不能归咎于主管官员；贤良坚持天人感应的观点，认为天灾实出于人祸。第二轮议题转移到盐铁官营之上，大夫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民众务农，贤良指出，官府制作的铁器不适用农用，给民众带来很大的痛苦。在第三轮中，大夫继续为盐铁官营辩护，说官府资金充足，器具完备，铁器规格和价格统一，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私人都有利；对此贤良痛陈盐铁官营弊端，如官铸铁器质量低劣，价格昂贵，铁官经常不在盐铁商店，导致民众买不到铁器，贻误农时，有些民众不得不用木器耕种，吃无盐的淡食。大夫平时高高在上，贤良列举的这些盐铁官营弊端，他是不曾想到的。

大夫说：“夏禹和商汤是圣明的君主，后稷和伊尹是贤明的宰相，他们统治天下时却有水旱灾害。水旱灾害是上天造成的，饥荒和丰收是阴阳运行的结果，并非是人为因素造成的。因此，太岁运行所至的区域，位置在阳就发生旱灾，位置在阴就发生水灾。每六年来一次歉收，每十二年来一次灾荒。天道就是这样，这恐怕不是主管官员的罪过。”

贤良说：“古时候，王朝政治有美德，就会阴阳调和，星辰理顺，风雨适时。因而统治者德行修于身内，声名会传播于外；对百姓行善，福报会感应上天。周公率先垂范而天下太平，国家没有百姓夭折伤亡，年岁没有饥荒之年。在周公时代，下雨不冲破土块，刮风不吹响树木枝条，十天下一场雨，下雨一定是在夜间。无论是丘陵还是高低田地的庄稼都会成熟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说：‘天上浓云密布，好雨徐徐降落。’如今主管官员不明白天灾产生的原因，反而说什么‘阴阳的运行’，这是我前所未闻的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说：‘田野里有饿死的人，却不知道收养饥民；猪狗吃人的饭食，却不知道检点；身为民众的父母官，民众饿死，却说，这不是我的责任，而是年成不好，这种行为，与拿刀杀人，却说不是我杀人，而是刀子杀人，有什么区别？’当今的行政要务，在于除去民众饥寒祸患，废除盐铁官营，退还官营权利给民众，分给农夫土地，促进农业生产，种养桑麻，发掘土地潜力。减少国家事务，节制国家财用，这样民众自然会富足起来。如果做到这样，那么水旱灾害不会让民众忧患，凶年也不能连累民众生活。”

大夫说：“说话的人贵在言辞简约，语意明确，适宜于众人聆听，而不在于繁文缛辞，话说多了，就妨害主管官员教化民俗的大计，不要像家常话那样啰嗦。从前陶朱公范蠡经营产业，深知农业之本与商业之末不同途径，一个家庭有人务农有人经商，这样谋生之道才算完备。如今朝廷铸造农业工具，促使农民务农，不去经营商业，这样民众就没有饥寒之苦。盐铁官营有什么害处，为什么要废除呢？”

贤良说：“农业是天下大业，铁器是民生大用。农具器用便利，就用力少而得益多，农夫乐于农事而努力劳作。铁器农具不完备，就会田地荒芜，稻谷不成长，力气用得少，收获自然折半。铁器便利与不便利，其间的功效相差十倍。朝廷所铸的铁器，大多是大件铁器，要求务必符合配料数量和铸造工序，但铸出来的铁器却不适合民用。民用铁器不锋利，且容易破损，割草不快，因此农夫劳作繁重，收获很少，百姓深受其苦。”

大夫说：“从事冶炼的卒隶、刑徒和工匠，按照官府规程，每日上班劳作，官府财用丰饶，器用完备。此前百姓几家合作铸铁，时间短促，费用缺少，铁矿石不能充分地销熔冶炼，炼出来的铁锭软硬不均匀。因此主管官员请求朝廷统一管理煮盐炼铁，统一规格，降低价格，以此便于百姓和国家。即使让虞舜、夏禹来处理盐铁事务，他们也不会改变现在的办法。官吏讲明程序方法，工匠完成冶铸任务，炼出来的铁锭软硬调和，器用便利。这样百姓有什么痛苦？农夫又有什么痛恨的呢？”

贤良说：“说什么卒隶、刑徒、工匠！以前民众能够交租铸铁、煮盐的时候，盐与五谷是同一个价格，铁器便利适用。如今朝廷制作铁器，很多器具质量低劣，用费却一点也不节省，卒隶、刑徒性格烦躁，不肯尽力劳作。以前几家人合作经营盐铁，相互一致，父子合力，各人都务求制作好的铁器，铁器不好的就不拿到集市上去卖。农事紧急的时候，铁器商就用车子将铁器运送到田亩之间。民众互相购买，能够用钱币或五谷换取铁器；有时还赊给民众，使民众不耽误农作产业。农夫置买耕田铁器，各得所需。节省了从事徭役的人，朝廷用男女刑徒，修治道路桥梁，各种被征发的民众都从中得到便利。如今朝廷统一控制了盐铁资源，统一价格，这些铁器很多是用又硬又脆的生铁制成，民众无从选择好坏。主管盐铁的官吏经常不在商店，铁器很难买到。农家又不能多储存铁器，因为多储存铁器就会生锈。百姓往往在农忙时节，跑远路买耕田铁器，这会导致贻误农时。盐和铁器价格昂贵，百姓感到不方便。有些平民百姓用木制家具耕种，用手除草，用土块去打碎土块，吃不起盐只好吃淡食。铁官器具卖不出去，就强行摊派给民众。卒隶、刑徒制作铁器没有完成铸作程序，官员有时就命令百姓帮助。由于朝廷征发没有节制，于是就让民众更替服徭役，以便均衡繁重的劳动，百姓对此深感痛苦。古时候，千户人家的采邑，百辆兵车的大夫之家，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类民众的需求，足可以互相交换。因此农民可以不离开田亩，而获得足够的耕田器具，工匠之人可以不从事砍伐而拥有足够的木材，制陶冶铸的人不必亲自耕田而获得足够的粮食，百姓各得其便，而在上位的人没有政事。所以君王致力于农业根本，而不去求末经商，朝廷官员应该去掉炫耀的习气，除去雕琢的做法，用礼义浸润教化民众，以俭朴示民。因此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而不去经营商业。”

# 卷七

## 崇礼第三十七

本篇所论有两个要点：第一个要点是如何看待接待蛮夷邦国君主的礼仪。大夫认为，朝廷在接待蛮夷时陈列旌旗车马和珍奇野兽，是为了展示中国威武，怀柔远方异族，宣明圣主盛德：“列羽旄，陈戎马，所以示威武；奇虫珍怪，所以示怀广远、明盛德，远国莫不至。”贤良指出，中国应该用“王者崇礼施德，上仁义而贱怪力”的方式来感化远方异族，而不是炫耀玩好、奇兽和游戏。第二个要点是如何看待贤才在国家的作用。大夫以晏婴相齐为例，说明贤人对国家损益关系不大。贤良则认为，贤才所在国重，所去国轻，贤才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。

大夫说：“修饰几案和手杖，准备酒杯和盛牲器皿，这是为了接待宾客，而不是为了主人。炫耀地展示奇珍异宝，是为了让四方蛮夷开眼界，并不是为了本国民众。百姓家里来了贵客，尚且有歌舞杂技奇妙变化的娱乐，何况是朝廷呢？因此陈列用鸟羽、旄牛尾装饰的旌旗，摆开兵车和战马，是用来展示大国的威武，珍奇野兽，瑰宝奇物，是用来怀柔远方异族、宣明圣主盛德，使远方邦国都来朝归附。”

贤良说：“君王崇尚礼仪，普施恩德，推崇仁义道德，轻视怪异暴力，因此圣人从来不谈论怪异、暴力、叛乱和神灵。孔子说：‘言谈忠诚老实，行为忠厚严肃，即使是在蛮荒落后地区，也不可丢弃这些品质。’如今四面八方绝远邦国的君主都来汉朝奉献见面礼，感怀天子的盛德，想来观看中国的礼仪，因此朝廷设立用来朝觐的明堂、用来讲学教化的辟雍，让那些远方君主观看，宫廷艺人跳起手执盾牌大斧的武舞、演唱《雅》、《颂》歌诗来感化他们。如今朝廷却以好玩而不实用的器物，家庭不蓄养的奇兽，以及角抵等游戏，用这些炫耀之事物向人展示，这恐怕与当年周公接待远方诸侯的方式不一样。从前周公以谦卑的态度对待贤士，用周礼来治理天下，他谢绝了越裳国奉献的白雉见面礼，以此让越裳国看到什么是恭让之礼；见面礼完毕之后，周公与越裳国君参拜文王之庙，以此让越裳国君看到什么是大孝之礼。越裳国君亲眼目睹了象征威仪、手执盾斧的武舞，亲耳聆听演唱《雅》、《颂》的歌声，心里充满了高尚的道德，高兴地回到自己邦国，这就是四方蛮夷仰慕仁义向内归附中国的原因，他们并不是通过几重翻译来观赏中国的猛兽熊罴。犀牛、大象、老虎，是南方蛮夷常见的野兽；骡子、毛驴、骆驼，是北方夷狄常见的牲畜。中国所罕见的野兽牲畜，外国却并不重视，南越人用珍贵的孔雀羽毛装饰门户，在产玉的昆山之旁，人们用宝贵的玉石来投掷乌鹊。如今朝廷把别人所轻视的东西看得很贵重，把别人多有的东西视为珍宝，这不是提高中国地位，宣明皇上盛德的好方法。隋侯之珠、和氏之璧，是世上公认的著名宝玉，但它们却不能使国家转危为安，更不能使即将灭亡的国家生存下去。因此，宣传恩德，展示威武，只有依靠贤臣良相，而不在于犬马珍宝。所以，圣王以贤才为国家珍宝，而不是以珠玉为宝。从前齐国贤相晏婴在酒宴之上展示礼仪，使千里之外敌军的战车折回；如果不能做到以礼服人，即使隋侯之珠、和氏之璧装满箱子，对国家存亡也是没有益处的。”

大夫说：“晏子先后辅佐齐灵公、齐庄公、齐景公三代君主，崔杼、庆封不遵为臣之道，劫持君主，扰乱齐国，齐灵公时期齐国被围；齐庄公被崔杼杀死；齐景公时期，晋人前来进攻，夺取垂都，攻占齐国首都临菑，齐国边邑被削，城郭被焚烧，宫室被毁坏，珍宝被抢光，哪里有什么战车折回的事呢？由此看来：贤良说“贤人为国家珍宝”，其实贤人对国家的损益无足轻重。”

贤良说：“管仲离开鲁国进入齐国，导致齐国称霸鲁国削弱，这并不是管仲劫持鲁国民众归于齐国。伍子胥挟持弓箭求助于吴王阖闾，率领吴师攻破楚国进入郢都，他没有扛着兵器跑到吴国。因此，贤才所在国家的地位重要，贤才所离开的国家地位轻微。楚国有令尹子玉得臣，晋文公为之侧席而坐；虞国有贤才宫之奇，晋献公为之睡不着。凡是贤臣所在之处，野心家要想扫除障碍、开疆拓土，这些目标都变得遥远了。因此《春秋》传记说：‘山上有虎豹，葵藿野菜无人敢去采摘；国家有贤士，边境不会遭受侵害。’”

## 备胡第三十八

本篇围绕征讨匈奴问题展开辩论。大夫认为，圣明天子在上，匈奴却公然侵扰中国边境，因而必须要派兵征讨。贤良指出，匈奴住在沙漠之中，过着茹毛饮血的野兽般生活，中国没有必要用礼义去要求匈奴。大夫进一步指出，中国天子是全天下人的父母，而匈奴却没有臣服，所以中国要加强军备。贤良认为，君主只要得到治国之道，远方异族就会前来归附。大夫辩称中国在东、西、南三方边陲已经消除边患，只有北方匈奴未附，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，然后再解除军备。贤良以孔子执政为例，说明朝廷应该以仁德使远近归附。大夫担心如果不从事征伐和军备，就难以平息暴力侵害，将黎民百姓推向敌人。贤良痛陈征伐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，要求朝廷重视《春秋》所强调的“重民”传统。

大夫说：“俗话说：‘贤者从容不受辱。’从世俗角度来说，乡里有穷凶极恶之人，人们尚且要躲避他。如今英明天子在上位，匈奴公然侵犯，骚扰中国边境，这是中国仁义受到侵犯，连藜藿野菜都被别人采摘了。从前狄人侵扰太王，匡人威胁孔子，因此不仁的人，是仁人的祸害。因此朝廷要整训军队来讨伐不义的人，加强军备来预防不仁的人。”

贤良说：“匈奴处于沙漠之中，生于不毛之地，为上天所贱视而加以抛弃，他们没有祭坛，没有宫室处所，没有男女之别，以广袤原野为乡里，以毛毡帐篷为家室，穿着兽皮，有的皮毛外翻，吃兽肉，喝兽血，像赶集市一样追逐水草，像牧童一样随牛羊居住，生活习俗如同中国的麋鹿一般。喜欢生事的朝中大臣，要求匈奴讲仁义，重礼仪，使中国大动干戈，至今没有平息，在边疆万里之外设防备胡，这些大臣就是《诗经·周南·兔罝》所讽刺的对象，所以小人不是公侯的心腹和捍卫者。”

大夫说：“天子是天下的父母。四面八方的民众，按道理说没有不愿意做天子的臣妾；然而还要修筑城郭，设置关隘津梁，整训武士，在皇宫周围部署御林禁卫军，这是因为要远离灾难，防备各方面的祸患。如今匈奴尚未臣服，虽然没有发生战争，但你们却想放弃防备，如果有事那该怎么办？”

贤良说：“吴王夫差之所以被越人消灭，是因为他越过近在身边的心腹大患越国，与远方齐国争上风。秦王朝之所以灭亡，是因为对外防备匈奴和百越，对内失去善政。对外用兵，内政失败，对外防备本来是为了对付所忧患的强敌，反而增添了君主的担忧。君主得到治国正道，那么远近民众就一同前来归附，周文王就是这样的人啊；君主不得治国正道，那么身边的臣妾都会成为敌寇，秦王就是这样的人啊。文治衰败，武功就会取胜，道德兴盛，军备就会减少。”

大夫说：“从前，四方蛮夷都很强盛，共同成为中国的祸害：朝鲜越过边境，洗劫燕国东部地区；东越越过东海，攻占浙江南部；南越向内地侵犯，扰乱服令地区；氐人、僰人、冉人、人、巂唐人以及昆明等少数民族，侵扰甘肃西部、重庆、四川。如今东、西、南三方边陲已经平定，只有北边匈奴没有臣服。只要打一次胜仗，匈奴就会震慑恐惧，中国和外国军备都可以解除，你还说什么减少呢？”

贤良说：“古时候，君子修行仁义道德，来安定民众，因此近处的人通过习染而向善，远处的人则前来归顺。所以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，上任前三月鲁国就与齐讲和修好，后三个月与郑国讲和修好，务求用仁德安定近处的人，平定远处的人。孔子当政的时候，鲁国没有敌国灾难，也没有邻国边境的祸患。三桓强臣不得不改变节操，对公室忠诚顺从，因而季桓子平毁了都城费邑。邻近大国畏惧孔子仁义，对鲁国表示友好，齐国人前来归还郓、、龟阴的土地。因此为政要依靠仁德，并不仅仅是逃避祸害或挫败对手，心里所想得到的东西不去主动追求而自然得到。如今中国百姓怨声载道，中外不能安宁，其中的过错就在于对匈奴的政策之上。匈奴内无宫室屋宇需要看守，外无种田耕地的积蓄，他们追随肥美的牧草和甘甜的水源而驱赶放牧，匈奴人不改变他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，而中国早已为此纷扰骚动了。他们像阵风一样聚合，又像乌云一样解散，靠近他们，他们就逃走，攻击他们，他们就作鸟兽散，不可能几十年就征服他们。”

大夫说：“古时候，英明的君王征讨残暴的国家，保卫弱小的国家，安定衰败的国家，扶持危险的国家。保卫弱小的国家，扶持危险的国家，小国之君就会喜悦；征讨残暴的国家，安定衰败的国家，无罪之人就会归附。如今不征伐，残暴祸害就不会止息；不加强战备，就是把黎民百姓推给敌人。《春秋》讽刺中国诸侯为它国戍守而后至，讽刺没有完成戍守任务的大夫。出征兵役，戍守备战，自古以来就有，并不是只有今天才有。”

贤良说：“匈奴所居地域广大，骑兵行动轻便敏捷，就其形势来说容易骚扰中国。有利之时他们如同老虎撕拉猎物，不利之时就像鸟儿折翅伤翼，作战时往往避开精锐兵锋，攻击疲惫至极的军队；中国如果少派出征军队就不足轮流更换执行任务，如果多派军队民众又难以承受兵役。兵役繁多民众就会精疲力竭，军事费用太多就会导致财用匮乏。繁重的兵役和军费两者如果不停息，民众就会心生怨恨。这就是秦王朝失去民心、陨灭社稷的原因啊。古时候，天子直辖的王畿方圆千里，服徭役的地方在方圆五百里以内，民众的声音互相可以听到，有了疾病也可以互相关心。没有超越时限的军队，也没有超过时间的徭役。朝廷根据民心在内部调节计划，徭役事务适合民众的承受能力。所以行役的征夫勉力完成任务，留在家里的人安居乐业。现在，来自崤山以东的戎马将士戍守边疆，路途遥远，他们身在胡、越之地，心里怀念家中的老母。老母在家中流泪，妻子伤悲离别，推想良人的饥渴，念叨征夫的寒苦。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写道：‘从前我到前方去，杨柳依依复殷殷。如今战罢把家归，落雪霏霏伤人心。我在路上慢慢走，又是口渴又是饥。我的心里真痛苦，无人知我心中哀。’因此圣主同情征人如此悲苦，怜悯他们久久离开父母妻子，身体暴露于旷野之中，住在寒苦之地，所以春天派使者到前线慰劳赏赐，举用失所的人，这是明主悲哀远方征人、抚慰老母的办法。皇上仁德恩惠是十分丰厚的，可是不称职的官吏却不能按照诏书来关怀战士，有的官员侵犯侮辱士卒，在军中设立集市，让一人兼负多人责任，不按照道理使唤士卒。因此士卒失去应得的待遇，家中的老母妻子感怀愤恨。宋国伯姬幽愁悲思而导致宋国失火，鲁君楚妾不得意而招致鲁国西宫生灾。当今天下不得意的人，远不止像西宫楚妾、宋国老媪那样的人。《春秋》的记载体例是，诸侯如果兴师动众就载于史册，这是体现重视民众的宗旨。《春秋》记载宋人包围长葛，就是讥刺宋国徭役时间太久。君子的用心必定是像这般良苦。”大夫沉默，不作回答。

## 执务第三十九

本篇记载丞相与贤良探讨什么是当今政治急务的问题。丞相认为，贤良、文学所描述的上古先王之道高深遥远，无法在现实政治中施行，要求这些书生能够谈一些现实政治的急务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。贤良指出，先王之道并不遥远，关键在于执政官员是否去追求：“思贤慕能，从善不休，则成、康之俗可致，而唐、虞之道可及。”贤良高举理想主义旗帜，进一步描述了上古时代政清人和、民生安乐、灾害不生的美好情景，痛斥当代官员徇私枉法的贪鄙之风，指出官府无穷无尽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。

丞相说：“先王的大道，失传已久而难以恢复，贤良、文学的话，高深遥远而难以施行。称颂古代圣人的高尚行为，称说最高道德的美好言论，这些都不是当今朝廷所能做到的。我们愿意听到当今社会的紧急要务，能够在政治上付诸实施：使百姓都能丰衣足食，没有匮乏贫困的忧愁；风雨适时，五谷蕃熟，害虫不生；天下安乐，盗贼不起；流浪人口还归家乡，各自返回到田里；官吏都能廉洁守正，恭敬严肃地履行职责，百姓都能得到合理的安置。”

贤良说：“孟子说过：‘尧、舜的大道，并非远离常人，而只是人们不去思考尧、舜之道罢了。’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写道：‘思求而不可得，醒来睡着都想她。’如果人们像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那样倾心追求，像《诗经·卫风·河广》那样爱好美德，哪有不成功、得不到的道理？因此，如同《诗经·小雅·车舝》所说，那是一座令人仰望的高山，我沿着大道向它进发。即使攀登不上高山顶峰，那么距离大道也不远了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颜渊说：‘舜是什么人？我颜回是什么人？’思慕贤能，随从善道永不休止，那么周成王、周康王时代的良风善俗就可以实现，而唐尧、虞舜政治也可以追攀。现在朝廷公卿不去想唐、虞、成、康之治，如果想追求先王之道，那又有什么遥远的呢？齐桓公以诸侯之身，思王室之政，为周王室忧劳，匡救华夏各诸侯国的危难，平定南夷、北狄之乱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忠信道义大行于世，声名传遍天下。齐国在召陵与楚国盟会，《春秋》赞许齐桓公执盟会牛耳。《春秋公羊传》说：‘赞许齐桓公的功绩。’因此，堆积层土而形成山坡，累积河水而形成江海，积累善行而成为君子。孔子说：‘我从《诗经·卫风·河广》这首诗，了解到什么是道德的最高境界。’如果想达到这种境界，那就要返回根本，恢复到古代而已。古时候，服行徭役不会超过既定时间，春天出行秋天就返回，秋天出行春天就归来，寒暑季节没有改变，随身带的衣服不必更换，人就已经归来了。夫妇不会长久远离，人人安乐和谐适意。刑狱诉讼公平，刑罚轻重得当，那么就会阴阳调和，风雨适时。在上位的人不去苛求烦扰百姓，在下位的人不会感麻烦劳苦，民众各自从事自己的产业，安于生产，这样虫灾就不会发生，水旱灾害也不会兴起。如果国家赋税减少，农民不误农时，那么就会百姓充足，流浪人口就会回归故里。在上位的人保持清静，不搞多欲政治，那么在下位的人就会廉洁而不贪婪。如今徭役都在极远之处，尽是寒冷艰苦之地和危难之处，有些徭役是在南北边疆，头年出征，第二年才能归来，父母伸长脖子向西眺望，男女失时怨旷，两地相思，思妇身在江浙，心系西北的西河，因此一个人出征，整个乡里都会怨恨，一人死于他乡，万人都会悲伤。《诗经·唐风·鸨羽》说：‘徭役无穷无尽，不能种植稷黍，父母靠什么生存？’《诗经·小雅·小明》说：‘想着那恭顺的人，眼泪零落如雨。我难道不想回家？怕的是触犯罗网。’官吏不按照国法去慰问安抚，反而背着公家以徇私情，各人都凭借手中的权力，满足自己的嗜欲，民众愁苦而怨恨思念，在上位的人不去体恤处理，那么就会恶政盛行，邪气兴起；邪气一旦兴起，虫灾、水灾、旱灾就会发生。如果这样，即使是祈求祷告，祭祀求雨，时时刻刻敬奉百神，又怎么能够调和阴阳、平息盗贼呢？”

## 能言第四十

本篇记载大夫与文学贤良激辩“能言”与“能行”的问题。大夫尖锐地批评文学贤良只会高谈阔论而无治国实际才能。文学贤良则针锋相对地指出，既“能言”又“能行”当然最好，但“能言不能行”、“能行不能言”的人同样是国家的瑰宝，因此儒生“能言不能行”并非可忧、可耻之事。在回击大夫指责之后，文学贤良奉劝大夫能够采纳儒生建议，不与民争利，这样国家就会出现太平盛世，儒生也不必担忧国家的治乱问题了。

大夫说：“盲人口能说白与黑，却没有眼睛来辨别。儒生口能说治与乱，却没有能力来施行。如果光坐着谈论而去不施行，那么牧童可以说他有两个乌获的气力，蓬头垢面的人也能说他同时具备尧、舜的德行。如果使言谈切合实际，那么儒生又怕什么治与乱，而盲人又怕什么辨别白与黑呢？古人不轻易说话，怕的是说出之后不能身体力行。因此，地位卑下却高谈阔论，能说而不能做，这是君子为之羞耻的事。”

贤良说：“能说出正确思想而不能施行的人，是国家的珍宝。能施行正确思想而不善言谈的人，是国家的有用之人。既能说又能行的人，堪称君子。言和行两者无一，就是牧童或蓬头垢面之类的人。言论充满天下，德惠覆盖四海，周公就是如此。口出言谈，身体力行，还不如像古代君子那样不吭声埋头去做。这样的话，大夫您又有什么可怕与可羞的呢？如今有些人不施大道而追求小利，追慕那些非急需的事务来扰乱众人思想，君子即使贫困，也不应该这样做。药酒有利于治病，正确的言论是治国良药。公卿大夫如果真能做到自我克制忍耐，采纳文学贤良的肺腑之言，去掉权变诡诈，罢免逐利之官，将盐铁之利全部归还于民，那么天下就会得到治理，太平歌颂之声就会兴起。儒生哪里会有治乱问题而为之忧患呢？”

## 取下第四十一

本篇堪称是大夫与文学、贤良的巅峰对决。篇题为“取下”，点明本篇讨论的核心是如何把握朝廷使用民力的问题。大夫严辞指斥不法刁民希望占有山泽盐铁资源，批评文学、贤良损上利下、亏主利臣，认为他们违背了君臣上下之礼。贤良慷慨陈词，认为在上古三代时期，君臣上下互相礼让，天下太平，只是到了王朝末世，在上位的人欲望膨胀，苛求无已，使百姓陷入贫困境地。随后，贤良接连用了14个排比句，将权贵豪奢生活与底层贫民悲惨境遇进行对比，批评以大夫为代表的朝廷官员“不知”黎民百姓的艰难。朝廷官员只好上奏皇帝，暂时停止郡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。盐铁会议论辩以文学、贤良的部分胜利而结束。本篇以下，是文学、贤良与御史大夫等人在其他场合辩论伐胡及刑法等问题。

大夫说：“一些不守法的庶民，困扰削弱国家利益，想占有山泽资源。如果顺从文学、贤良的意见，那么山泽资源利益就会归于下民，朝廷就没有什么作为了。朝廷所推行的政策你们就非难，朝廷官员说话你们就反唇相讥，一心想损害朝廷，谋取下层利益，亏损君主，迎合臣民，哪里还有什么尊卑上下的大义？哪里有什么君臣的礼仪？太平盛世的颂声又怎么能够兴作呢？”

贤良说：“古时候，在上位者征税有限定的数量，官员自己俸养有节度，好年成不会有盗贼，遇到荒年就延缓征税，使用民众的劳力，一年不超过三日，征用民力耕种公田，不超过十分之一。君主厚爱民众，臣民尽力效忠，上下互相礼让，天下因而太平。《诗经·周颂·噫嘻》说：‘快耕种你的私田’，说的就是上司礼让下民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说：‘耕完公田后再耕私田’，说的就是百姓以公职为先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中说：‘从来没有孝子仁义而遗弃双亲，也从来没有臣民忠义而把君主事业放在私事之后。’君主像君，臣子像臣，又怎么会没有礼义呢？到了周朝的末代，仁德恩惠受阻，在上之人欲壑难填，君主奢侈，对民众要求太多，民众在下面饱受困苦，于是怠慢上边公事，因此朝廷决定按田亩面积征税，刺贪的《诗经·魏风·硕鼠》为此而作。卫灵公在严冬之际，兴师动众，兴修池苑，宛春劝谏说：‘天气寒冷，百姓饥寒交迫，希望您能够停修池苑。’卫灵公却问：‘天气寒冷吗？我为什么不感到寒冷呢？’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：‘安全的人不能体恤危险的人，吃饱的人不能喂食饥饿的人。’因此对于有余粮剩肉的人，很难对他谈论穷困，身处安逸快乐的人，很难对他谈论劳苦。

“家有高大厅堂、深邃屋宇、宽广楼房、明亮房间的人，不了解身处狭小茅棚、上面漏雨、下面潮湿环境的人的惨痛。厩中拴马几百匹、货物充满室内、储藏旧谷收纳新谷的人，不了解吃了早饭无晚饭、依靠借贷为生的人的焦急。拥有广阔宅第田园、良田连片的人，不了解没有立足之地、伸头缩颈的穷人的苦役。良马遍山，牛羊满谷的人，不了解连一头小猪或一头瘦牛都没有的人的贫困。高枕无忧、卧床谈笑、不被号叫声打扰的人，不了解那些担忧私人债务与官吏逼迫的人的愁苦。穿着丝绸皮靴、吃细粮嚼肥肉的人，不了解穿粗布短衣人的寒冷和吃野菜吞糟糠人的痛苦。在房间优游从容、垂衣拱手、等着仆人端着食案的人，不了解身执耒锸、亲耕田亩人的辛勤。乘坚车驱良马、身后跟随成队骑兵的人，不了解挑担子步行人的劳苦。安适的床上铺着毛毯、侍从站满身边的人，不了解身负纤绳拉船、登高渡河人的艰难。穿着又轻又暖的衣服、身披美丽貂裘、处于温室之中、坐着安稳轩车的人，不了解那些登上边塞城垣、漂泊在胡代异乡、迎着刺骨寒风人的危险苦寒。妻子和好、子孙受到良好保养的人，不了解征人家中老母亲的憔悴和思妇的悲恨。耳听音乐、目观倡优的人，不了解那些冒着枪林箭雨、在边疆抗拒敌人的将士的牺牲。向东伏案、挥笔书写公文的人，不了解囚徒身披枷锁的焦急和遭到木杖荆条痛打的切肤之痛。坐在车内毛毯垫子上面，按照地图所说去走似乎很容易，却不了解步行跋涉的艰难。从前商鞅在秦国执政，杀人像割茅草一样轻率，用兵像弹泥丸一样随意；参军的士卒尸骨暴露在长城，水陆漕运的车船相望于道，活着出去，死了回来，他们难道不是父母生养的儿子吗？因此君子仁爱而宽恕，正义而以理度人，所喜好所厌恶都与天下人相同，不将不仁施予他人。从前公刘爱好财货，结果国内居家的人有积蓄，出行的人袋中有干粮。太王爱好女色，结果国内百姓家中没有嫁不出去的怨女，家外没有娶不到妻子的旷夫。文王制作刑法，国中没有冤假错案。武王出兵伐纣，士卒乐于为他死战，民众乐于为他征用。如果在上位的人都像这样，那么民众还有什么愁苦和怨愤，又有什么要求和讥刺？”

公卿们一脸严肃，厅堂内静寂得像没有人一样。于是宣布散会，停止辩论。公卿向皇帝上奏说：“贤良、文学不清楚朝廷事务，随便认为盐铁官营对百姓不方便。请求皇上暂时取消各郡县封国的酒内专卖、函谷关以内铁器官营。”报告皇帝后，皇帝批示说：“可以。”

## 击之第四十二

本篇探讨要不要继续征讨匈奴的问题。匈奴一直是汉家最大的外来威胁，汉初致力于医治战争的创伤，对匈奴采取委曲求全的和亲政策。汉武帝利用文景时期积蓄的巨大国力，举全国之力，征讨匈奴达四十年之久，奠定了汉胜匈奴败的基本格局。但由于匈奴具有广阔的战略回旋余地，因而汉武帝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彻底臣服匈奴的理想。本篇中大夫提出要猛追穷寇，继续征讨匈奴，以短痛换取汉家的长治久安，不能让伐胡事业半途而废。文学认为，连年伐胡导致士死民疲，主张与民休息。大夫与文学的观点，代表了当时朝野对伐胡的两种思想倾向。

贤良、文学已经拜官，都获得列大夫爵位，他们向丞相、御史辞行。大夫说：“日前议论公事，贤良、文学称道引述古代王道政治，与现实事务多有背离。参与讨论的双方最好不要相互反对，朝廷期待的是你们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。以前，朝廷尚未征讨匈奴、百越的时候，中国边境四面受敌，北方边境尤其深受匈奴侵扰之苦。已故武帝平定东越、南越和西南夷，从根本上解决了东、南、西三个方向的边境难题，朝廷安抚那些归附汉家的方国，使它们成为保卫汉家的藩国屏障，然后调动汉家各个郡国的所有力量，来征讨匈奴。匈奴与荒凉的野兽生活地区接壤交界，孤立衰弱，没有盟友帮助，这是他们的困难危亡的关键时刻。可惜的是匈奴地域辽阔遥远，汉家没有实现彻底臣服匈奴的愿望，使匈奴得到恢复喘息的机会，他们休养士卒战马，欺负哄骗西域各国。西域各国接近匈奴，归附汉朝之心受到干扰破坏，内附汉家之意涣散，肯定会成为汉家大患。因此当今皇上想扫荡匈奴，而这又要耗费国库财富。从早到晚追逐禽兽，但却停止追猎，放走猎物，这不是好主意。从前帝舜继承帝尧的治水事业，直到大禹才获得成功。如今朝廷想以《军兴》兵法，出击匈奴，诸位觉得怎么样？”

文学说：“以前，朝廷修正并减轻赋税，公家费用充足，百姓人人富裕。后来，防止匈奴和百越，凿通四夷，国家费用就不足了。朝廷于是想办法生财，征收车船赋税，用以资助边境征战，允许罪犯用钱赎罪，鼓励百姓告发偷漏税，这些措施给百姓带来祸患。将士战死在军旅，征夫为军用物资的水陆漕运而疲于奔命，再加上因触犯朝廷科条律令而被贬谪，官吏征收赋税、发送民伕已经达到极点了。疲劳了就要休息，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返回根本，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，即使是舜、禹再生，也是不能改变的。”

大夫说：“从前夏禹治理洪水灾害，百姓非常勤劳，疲于用臿挖土用笼盛土，到了后来，百姓都享受大禹治水功效。已故武帝时期，各个郡国都为外伐四夷战事而烦恼，但东、南、北三方边陲战役也给大家带来了宽松的边疆环境。谚语说：‘见到机会不行动就会前功尽弃。’一日放走敌人，就构成数世祸患。让劳者休息是用以供来日行动，在敌人疲敝之际要趁时动手。这是完成帝王事业的道理，是圣贤所不能丢掉的。前人功业有待于后人继承，厌恶劳苦，不完成伐胡大业，就如同耕种的人因困倦而停止劳动。做事半途而废的人没有功劳，耕种怠惰的人不会有收获。”

文学说：“地域广阔而不修德的国家危险，兵强马壮而凌犯敌人的人身遭伤亡。老虎与犀牛相持不下，蝼蛄蚂蚁得行其志。两个强敌相互抗衡，匹夫就会趁虚而入。因此圣王见到利益就会考虑害处，见到远处就要存问近人。现在我们替朝廷考虑，不如息兵休士，用重礼与匈奴缔结和亲，致力于修文德而已。如果不体恤人民的危急，不考虑百姓的困难，疲弊中国所依靠的人众，来征讨北方无用之地，丢失十分收获一分，这不是我们文学所能理解的。”

# 卷八

## 结和第四十三

本篇就汉家与匈奴是和是战的问题展开探讨。大夫认为，历史事实证明汉家一度奉行的和亲政策是不成功的，因为匈奴根本没有诚意与汉家修好，所以征讨匈奴是朝廷唯一的选择，他充分肯定了汉武帝征讨匈奴的历史功绩，并从长远角度，主张汉家必须继续伐胡，为后代根除祸患。文学则主张汉家与匈奴修好，肯定和亲政策，反对汉家兴师动众去征讨北方无用之地，认为伐胡会导致民众疲惫，严重者会造成国家覆灭的恶果。从双方观点来看，大夫与文学各有偏颇：大夫看到了伐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必要性与合理性，却没有考虑到汉家在几十年伐胡之后已经国穷民疲，当时的国家要务是与民休息；文学看到了人民为伐胡所作出的巨大牺牲，在汉昭帝时代他们倡导朝廷休兵，这无疑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，但是他们连此前汉武帝伐胡业绩一并否定，只知道一味地讲修文德怀柔，这反映了他们的迂腐和不知变通。

大夫说：“汉家建国以来，与匈奴修好讲和，缔结姻亲，给匈奴单于的陪嫁礼物和赠送金钱财物非常丰厚；但是匈奴不念记与汉家庄重的盟约以及汉家赠送的厚礼，不改变侵扰行为，以暴力侵害中国边境越来越厉害。已故武帝认识到，对待匈奴只能以武力折服，而不能以仁德怀柔，因此广泛选派将帅，征召勇敢的士兵，来诛讨匈奴侵扰中国的罪行；武帝伐胡的功勋卓著，为海内所著称，有关记功文献收藏在国家档案馆，怎么能说‘伤亡十个获取一个’呢？苟且偷安的人日后危险，只考虑眼前，忧患很快到来，贤明的人脱离世俗，智慧的人善于权变，君子所考虑的问题，普通庶民总是疑惑。因此民众可以和他们一起看到成功，但不能与他们图谋开始。这是主管官员个人的独到见识，是你们文学认识不到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以前，汉家与匈奴缔结和亲，其他周边蛮夷邦国向汉家纳贡称臣，君臣上下、国外国内都彼此相信，没有胡、越的祸患。在那个时候，朝廷索求很少且容易充足，民众安居乐业，相安无事，依靠种田吃饭，通过种植桑麻穿衣，百姓家中有数年的积蓄，朝廷有富余的货财，连乡里那些老人，都蒙受朝廷的恩泽。从那以后，朝廷不用文治而任武功，兴师动众，来征伐西北边塞无用之地，在沙漠里设郡，民众不能自己守卫，只好派兵屯驻，登城守望，通过拉车来补充给养。我私下只看到损失，没有看到成功。”

大夫说：“匈奴以虚假名义与汉家做交易，实际上并不顺从汉家；汉家屡次被这些蛮夷所欺骗，你们对此不感到痛恨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从前高祖皇帝手持三尺剑定天下，如今汉家政令仅限于中国九州，而不能推行到匈奴。乡里普通民众，尚且有主次之分，何况是中国万里江山之主与小国匈奴呢？举中国之力，何坚不摧？凭借中国全体将士民众，何人不服？如今中国天子虽然拥有帝名，但威望却不能伸张到长城之外，反而赠送匈奴财物，助长他们的傲慢，这是五帝所不能容忍、三王必定感到愤怒的事情。”

文学说：“汤侍奉夏朝而最终征服了夏朝，周侍奉殷朝而最终消灭了殷朝。因此，以势力强大的身份侍奉弱小王朝的最终称王天下，以强国地位欺凌弱国的政权最终灭亡。圣明的君主不会困乏一国之众去兼并他国，优秀的车夫不会困乏马匹来加倍赶路。因而造父驾车不失和谐，圣君治国不背仁德。秦王朝攥紧便利的马嚼来统治天下，手执长鞭抽打八方，驾车的马匹早已疲惫不堪，可是鞭子仍然抽打得越来越厉害，因此才有马匹倒仆、马鞭丢失的变故。秦王朝的士兵民众不可谓不众，力量不可谓不多，但民众都内叛秦朝外附诸侯，没有人肯为秦朝所用。这就是高祖皇帝仗剑夺取天下的原因啊。汉家天子与匈奴单于和好，中国与匈奴互通有无，天下晏然安宁，世世代代没有战争祸患，这样的话士兵民众哪有什么战事？三王又能有什么愤怒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秦人始祖伯翳最初封于秦地的时候，土地面积仅为七十里。春秋秦穆公开创秦国霸业，战国秦孝公拓广霸业。秦国地位从低到高，势力从小到大。因而先祖奠定基业，到子孙取得最后成功。轩辕黄帝战于涿鹿，杀死太皞、少皞和蚩尤，成为帝王，商汤伐夏，武王伐商，诛讨夏桀、殷纣王而成为帝王。黄帝依靠战争获得成功，商汤和周武王通过征伐而成就孝道。所以，手足的勤劳是为了奉养腹肠。当代人的战事，可以成为后人的利益。如今四夷内侵中国，如果不外攘四夷，那么后代万世必定有长久祸患。已故武帝发动正义之师，来诛讨强暴的四夷，东边消灭朝鲜，西边平定冉，南边讨平百越，北边挫败强大的匈奴，追逐匈奴，拓广北边的疆域，这是类似于商汤伐桀、武王伐纣的举动，类似于黄帝擒蚩尤的战役。因而圣明君主开疆拓土，并不是为了私利，对外用兵，也不是仅仅为了发泄愤怒，而是为了匡救危难，远避祸害，以此为黎民百姓作长远的考虑。”

文学说：“秦王朝在南边平定强越，在北边驱逐匈奴，竭尽中国之力来征讨四夷，民众疲惫至极而君主不加体恤，国内已经崩溃而皇上却不知情；因此，一介民伕陈涉首倡而天下响应，秦兵被陈涉击破，秦国土地被山东诸侯侵夺，这对秦王子孙有什么好处？《诗经·邶风·瓠有苦叶》说：‘鸿雁雍雍鸣，旭日始东升。’贪得眼前利益，不念及后来灾难。因此吴王夫差只知道北伐齐国的便利，没有料到干遂的灭顶之灾。秦朝只知道进攻夺取的好处，而没有想到鸿门宴上的江山新主。这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十啊。周国谨慎小心而得天下，秦朝欲望太大而亡于小民之手。俗语说：‘前面车子倾覆了，后面车子就要戒慎。’‘殷朝的镜子不远，就在夏后桀的时代’。”

## 诛秦第四十四

本篇以“诛秦”为题，实际上双方所论远不止秦朝功罪问题，而是探讨中国历代王朝的少数民族政策问题。大夫认为用礼义道德治国会导致国家削弱乃至危亡，只有像秦皇汉武那样武力征讨，才能征服少数民族。文学认为，德治才是使四夷归附的最好政策，要通过累世积德，达到不劳而王的效果。双方论争的实质是王霸之争，即究竟是以仁德感化还是以武力征伐的方式来处理夷夏矛盾。

大夫说：“秦、楚、燕、齐都是周天子的封国；战国时期赵、魏、韩三国君主，齐国田氏，他们最初都是晋、齐两国诸侯的家臣；他们对内严守国土，对外讨伐不义，地域宽广，疆土推进，所以都号称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成为诸侯。周王室修行礼教，富于礼乐典章，但国家削弱，不能自我生存，东边畏惧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魏、韩六国，西边害怕强秦，周君自身被秦国流放迁徙，周王室宗庙就这样断了香火。依靠已故武帝的大恩大德，接续周王室后裔，将周室一位名叫姬嘉的后人封于颍川，号称周子男君。秦国兼并天下，东边渡过沛水，吞并消灭朝鲜，南边夺取陆梁，北边驱逐匈奴，西边攻占氐羌，自立帝号，受到四夷朝贡。凡是车船所能通达的地方，人的足迹所至之处，没有人不前来称臣。他们并不是佩服秦王朝的仁德，而是畏惧秦王朝的声威。威力强大就会有人前来朝贡，威力弱小就会向别人朝贡。”

文学曰：“禹和舜是帝尧的辅佐大臣，商汤是夏桀的臣子，周文王是殷纣王的臣子，他们之所以能够使八方顺从、海内朝拜，并不是凭借陆梁地域的广阔，也不是因为兵器、革车的威力。秦、楚、赵、魏、韩号称万乘大国，他们不致力于积累德行，而是互相侵犯，彼此交战争强，最后全都亡国。虽然他们能够拓展疆土，增广地盘，但这些行为如同吃进有毒的荝子一样，希望安全生存，怎么可能呢？以礼让治国的人像大江大海，长久流淌而不会枯竭，这是因为江海本身深厚美好啊。如果失去根本，就像点燃一堆野蒿一样，虽然火力一时猛烈，但却烧不下去，火势熄灭可以立等而待，战国就是这种情况啊。周王室虽然德行衰败，但周室后裔仍然列于诸侯，国脉至今不绝。秦王朝势力散尽之后，被人灭族，又怎么能够使别人朝拜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中原与边境的关系，如同肢体与腹心一样。外面的肌肤受寒，内部的腹心就会生病，身体内外互相影响，这不是内外互动吗？嘴唇没有了，牙齿就裸露在外而受寒，肢体受伤，心里就忧伤哀痛。因此没有手足，肢体就残废了，国家没有边境，国内就会受害。从前，戎狄进攻居于邠地的太王，太王率部越过梁山来到岐山之下定居，泾水、渭水成为周秦的交界，戎狄往东一直到达晋国的陆浑地区，侵扰中原诸侯，中原诸侯为此非常痛恨。如今匈奴不断蚕食，向内地侵犯，距离匈奴遥远的地区可以免遭其苦，唯独边境地区蒙受挫败。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写道：‘心中忧虑不安，想到国家受虐。’如果不征伐备战，那么匈奴的侵害就不会止息。因此已故武帝征发义兵，征讨匈奴之罪，于是攻破祁连山和天山，冲散匈奴聚集的党羽，向北一直打到匈奴单于祭天的龙城，汉家大军合围匈奴，单于丧魂落魄，只身脱逃，汉军乘胜追击匈奴败军，斩首和俘虏匈奴十多万。匈奴引弓的民众，身穿毡袍的君长，莫不吓破了胆，受挫之后便远远遁逃，汉军这才整军回师。匈奴浑邪王率领其众投降汉朝，汉家将其部属安置在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朔方、云中五个属国，以此抵御匈奴，这样，长城之内，河山之外，从此很少再遭受匈奴侵害。皇上于是颁发诏令，减少征戍漕运，放宽徭役。在征讨匈奴之初，汉家虽然劳苦，但最终获得喜庆。”

文学说：“周王朝世世代代积德，天下没有人不愿意以周王为君主，因此周不必劳师动众而称王，周王朝施行恩德由近而远，蛮荒落后邦国自己前来朝贡。秦王朝凭借战争胜利而吞并天下，秦始皇嫌中原太小而贪得匈奴、百越之地，派蒙恬出击匈奴，夺取黄河以南河套地区作为新秦，反而忘记秦国故有的土地，秦朝修筑长城来防备匈奴，结果丢掉了本来最应该守住的中国土地人民。往日，汉家屡次发动征战，频繁调动军队，在长城之北，大路上到处都是倾覆的战车和遗落的箭头。到了李广利等人轻率谋划——统计归来的马匹，没有人不为此感到寒心；汉家虽然得到浑邪王归降，但是不能抵偿所遭受的损失。这不是国家的上策啊。”

## 伐功第四十五

本篇题为“伐功”，并不是自夸功劳，而是如何评价汉家征伐匈奴四十多年的功效。大夫认为，以前齐、赵、燕、秦都曾建立过伐胡的功业，如今汉家久久未能彻底征服匈奴，是由于朝野不能同心协力的缘故。文学指出，齐、赵、燕、秦之所以伐胡成功，是由于当时匈奴处于分裂、离散状态。到汉代匈奴已经变得统一强盛，因此难以制服。文学讥刺大夫给汉武帝出谋划策，导致国库空虚，生民凋敝。汉武帝当初集全国之力征讨匈奴，有它的合理性与正确性。但是后来在基本打败匈奴、汉家民生凋敝的情况下，继续征伐匈奴，就未必是上策了。汉武帝晚年对自己穷兵黩武已有所检讨，后来主政的霍光也意识到这一点，但大夫桑弘羊在此时继续主张伐胡，显然不是正确的主张。

大夫说：“齐桓公率兵越过燕国，讨伐山戎，攻破孤竹，消灭令支。赵武灵王率兵越过句注山，经过代谷，夺取林胡和楼烦。燕国派兵奇袭，赶走东胡，开辟疆土一千多里，度过辽东，攻占朝鲜。蒙恬为秦国驱逐匈奴，像猛鸟驱赶一群燕雀一样。匈奴被蒙恬之势所威慑，不敢向南面窥视，达十余年之久。到了后来，蒙恬被胡亥赐死，诸侯反叛秦朝，中国处于战乱之中，匈奴纷纷蠢动，才敢于重新成为中国边疆的敌寇。以燕、赵这样的小国，尚且敢于击退敌寇，拓展疆土，如今凭借如此强大的汉国，如此雄厚的军民力量，已经不仅仅是齐桓公的兵力和燕、赵的军队了；然而匈奴久未征服，这是由于群臣不能齐心协力，朝野上下未能和谐的缘故啊。”

文学说：“古代用兵，并不是贪图疆土的利益，而是要拯救民众的苦难。人民思念王师，如同大旱之年盼望及时雨，百姓用竹篮盛着饭食，用陶壶盛着米汤，来迎接王师。因此，为人民苦难而忧虑的人，百姓会全心归附他，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啊。不怜惜黎民百姓的死亡，百姓被折磨得精疲力竭，最后众叛亲离，秦王就是这样的人啊。孟子说过：‘君主不走正道，不遵循仁义道德，硬要人民为他作战，即使一时战胜了，最终也会灭亡。’这就是秦朝末年中国发生战乱的原因，并不是蒙恬身死而导致诸侯反叛秦朝。从前西周王朝兴盛的时候，南方的越裳国前来献贡，周边少数民族纷纷敬献贡物。后来周室衰微，诸侯相互以武力征伐，那些蛮荒部落分崩离析，各自聚有党羽，不能相互一致，因而燕、赵才能得意取胜。到了后来，匈奴逐渐变强，蚕食邻近诸侯，他们赶跑月氏国，凭借兵马之威，迁徙小国，使北方善于骑射的牧民，合并为匈奴一家，他们团结一心，协同力量，因而难以彻底制服。以前您替已故武帝筹划抗击匈奴策略：‘汉家兵马占领西域，夺取战略要地，以静候时局变化。凭借汉家之强，来攻击匈奴之众，如同以强弓硬弩击溃毒疮；好比越国擒灭吴国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！’皇帝认为您说得对。皇帝用您的思想，听您的计谋，即使是当年越王勾践任用大夫文种、范蠡也不能超过。您从搜粟都尉升迁为御史大夫，主持朝政十多年，却没有见到类似于文种、范蠡的功劳，只看见浪费钱财、朝政弊坏的效果，匈奴并不为之更加俯首听命，而全国百姓黎民已经家业破败了。这说明您的策略不能使匈奴衰弱，反而使中国衰弱。善于替国家策划的人，难道就像您这样吗？”

## 西域第四十六

本篇讨论汉家的西域政策。汉家为了取得征讨匈奴的胜利，采取了一系列经营西域的举措，如屯田、设置边郡等等，这些举措在经济上有效地充实了汉家的国库，使边疆出现“马牛放纵，蓄积布野”的局面，在军事上等于斩断匈奴的右臂，切断了匈奴与西域其他国家的联系。但是汉武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也掺杂了个人的侈心，如不惜动用重兵去获取大宛的汗血马。大夫充分肯定汉家的西域政策，希望汉家在西域乘胜追击，彻底臣服匈奴。文学则认为匈奴地理条件特殊，根本不可能彻底臣服匈奴，并以汉家伐大宛为例，说明万里伐宛，实在是失策之举。文学进一步指出，征伐四夷已经激化了社会矛盾，导致山东农民起义反叛，因此再也不能继续征伐四夷。

大夫说：“以前，匈奴占据黄河、阴山的险要位置，独占田猎、畜牧的便利，民众富足，兵马强壮，不时入侵中国边境骚扰，雁门关以内为之惊动，上郡以南地区都筑城防胡。文帝时期，匈奴入侵萧关，烽火直通陕北甘泉，朝廷群臣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便请求在京师驻兵来防备匈奴。匈奴在西边役使大宛、康居这些小国，在南边与各支羌族勾通。已故武帝驱逐匈奴，夺回中国宽广富饶的土地，在张掖以西建置州郡，将羌人与匈奴隔绝开来，切断匈奴的外援。所以西域各国，都纷纷抗拒匈奴，这等于斩断了匈奴的右臂，匈奴只好拖着刀剑逃跑。汉家招募民众到河西种田放牧，以便增加国家的财用，长城以南地区，靠近边塞的郡县，民众可以随意牧马放牛，蓄积布满原野。我没有看到朝廷凿通西域、征伐匈奴的计策有什么过错。春秋时期，弱小的越国能够满足心意消灭强吴，估算土地，计算人众，吴越并非均等，越王勾践苦思灭吴，名臣范蠡、文种为之谋划，越人出征灭吴就势在必行了。”

文学说：“吴国和越国为江河湖海所局限，松江、钱塘江和浦阳江三江环绕，处于长荡湖、太湖、射贵湖、上湖、滆湖这五湖之间，土地相连，边境接壤，这种形势使吴越容易互相冲突。军队金鼓之声未起，旌旗尚未舒展，行军部署尚未决定，双方兵器已经交接了。军队不需要军用物资费用，士卒没有精疲力竭的劳苦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在厨房吃完饭再到门外近郊去作战。如今匈奴在广阔无边的水泽草地放牧，东西南北，四方都是无边无际，即使你有轻捷的战车和飞快的战马，也不能追得上他们，何况汉兵是背着沉重的兵器去追赶他们呢？从情势来看汉兵是赶不上的。汉兵奔波在茫茫无际的水泽草原上，不知该停在哪儿，如同在浩淼无边的江海上徒手捕鱼，即使赶上匈奴，三军将士已经疲弊，恰好成为送到匈奴口边的食物。因此，当今英明的君王深知伐胡无利可图，认为不能屡次发动战役，不能无限制地扩张权威，因而下诏让公卿大夫、贤良、文学讨论，提出纠正弯曲、从细微处复兴汉家的路径。你们身为汉家公卿，应该思考百姓之所急，匈奴之所害，根据圣明君主的心意，确定安乐太平的大业。可是现在你们却仍然留心于伐胡的下策，摧败与民休息的根本大计，不顺从皇上心意，不能说你们对皇上尽了忠心。”

大夫说：“当初，贰师将军李广利未能战胜大宛而退还敦煌，朝廷议政的公卿想让皇上不要为发泄忿恨而继续伐宛，认为这样会使有心归汉的西域各国意志瓦解，转而依附匈奴，而匈奴得到西域各国支持之后会变得更加强大。已故武帝拒绝听从这些奇谈怪论，决定施展军事威力，回过头来继续攻袭大宛，大宛举国投降，献上贵器宝物，奉上汗血宝马。乌孙等西域各国闻风丧胆，请求为汉天子臣妾。匈奴失魂落魄，四散奔逃隐藏，虽然未能完全臣服汉家，但他们都住在寒苦贫瘠之地，青壮年都战死在祁连山或天山，他们的孤儿还没有长大。因此群臣经过讨论后以为，匈奴困于汉兵，翅膀折伤，可以成功地将其彻底征服。恰逢武帝弃群臣而去，因而匈奴方面的战事没有什么变化。譬如堆土成山，只差一筐土就停止了，谋划伐胡功业，没有继续将其推向成功的理念，这是将功业丢弃给匈奴而去帮助强敌。中止接近成功的事业，败坏事业的成功，为君主作如此谋划，这也不能说是对皇上尽忠。”

文学说：“主管官员谈论外国之事，议论者都追求一时的权宜之计，不考虑它的后果。张骞对武帝说，大宛国的天马流汗殷红如血，安息国的真玉鸵鸟，朝廷听说之后，便想得到这些异物以快心意，于是大举兴师，征伐大宛，经历几年之后才战胜大宛。途经万里之遥而去攻打他人之国，士兵尚未交战就已死亡过半，虽然攻破大宛得到宝马，但这绝非国之良计。在那个时候，中国将士正在艰苦地征伐四夷，道路上到处都是军队，各郡与封国同时征发，黎民百姓困苦不堪，奸诈之徒开始出现，盗贼四处兴起，郡守与县尉不能禁止，城郭村落无法阻挡。此后朝廷派遣上大夫穿着特使的绣花衣，用军兴之法去讨伐。在那个时候，百姓没有人能够保障自己的生命，因此山东起义军都有反叛之心。幸赖已故武帝在天圣灵的威力才转乱为治。这其中的过错，都在于主管官员一心想完成征服匈奴大业，不考虑庶几可以休战的大计。像这样为君主谋划，能够称得上忠诚吗？”

## 世务第四十七

本篇讨论汉家当世要务。大夫认为，匈奴对于汉家来说如同树木中的蛀虫，必须予以清除。他批评文学关于以仁德怀柔匈奴的说法，认为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施行。根据匈奴贪得无厌、行动迅速的特点，大夫主张汉家要加强军事防备。文学高举崇德旗帜，要求汉家去武行文，废力尚德，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远方异族通过几重翻译前来朝贡，收到永无寇虏的功效。对照双方言论，可以看出文学富于理想主义色彩，大夫则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。

大夫说：“诸位儒生在胡说！议政的人所提的意见应该让人可以具体落实，不要只是说一些过时的话，圆转自如而不可遵循。汉家边境之有匈奴，譬若树木之有蛀虫，又如人有疾病，不治疗就会逐渐加深。因此，谋臣认为汉家应该出击取胜，使匈奴陷入极端困境。诸位儒生说以仁德怀柔匈奴，这只能口头上说而不可施行。诸位儒生上没有类似于三王那样治国安邦的策略，下没有类似近代秦朝富国强兵的方法，你们有办法让主管官员可以拿来在当世施行，能够安定庶民并使边境宁静吗？”

文学说：“从前，齐桓公对内亲附百姓，对外安定诸侯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天下诸侯像风行草偃一般迅速顺从。后来，齐桓公德行亏损衰败，在葵丘诸侯大会上，趾高气扬，骄傲自夸，由此多国诸侯叛离齐国。《春秋》讽刺齐桓公不崇尚仁德而崇尚武力。因此，当齐桓公崇尚仁德的时候，连强大的南楚也宣告服从，远方诸侯国不召而自来；凭借武力，附近的诸侯国不会亲近，就连小国也不会归附。这就是崇尚仁德与崇尚武力的效验。如果朝廷真正向上观察夏、商、周三王政治为什么会昌盛，向下讨论秦朝为什么会灭亡，中间阐述齐桓公为什么会兴起，如果朝廷放弃武力施行文教，废除暴力崇尚仁德，撤除关卡，除掉屏障要塞，用仁义来引导天下，那么北方边陲就没有匈奴的忧患，中国就没有干戈战事了。”

大夫说：“事情如果不事先辨识，就不可以应付猝然变化。国内没有军事防备，就不可以防御敌人。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写道：‘告诉你们民众，谨守诸侯法度，戒备意外事变。’因此国家有文事，一定要有武备。从前宋襄公盲目相信楚国而不预为防备，以至于招致奇耻大辱，被楚人抓住囚禁，宋国差点灭亡。因而即使有诚信之心，但不知道权变，这是危亡之道啊。《春秋》不赞同身为夷狄的楚国抓捕中原诸侯宋襄公，这是因为楚国没有信用。匈奴贪如虎狼，借时行动，乘机出击，像狂飙一样而来，如闪电一般而去。你们却试图以诚信之心去对待他们，赠给他们黄金丝绸宝物，盲目相信没有仁义的欺诈，这如同亲近盗跖、庄蹻而扶助猛虎一样。”

文学说：“《春秋》说‘天子没有匹敌’。意思是说天子仁厚，道德美好，天下归顺服从，没有人敢与天子较量。天子的德行延展到国境之外，凡是舟车所到的地方，足迹所至之处，没有人不蒙受天子恩泽。蛮荒落后的异族邦国，通过几重翻译自己前来归附。在那个时候，天下和平统一，君臣同心同德，国外与国内互相信任，上下和睦相处。建立军队但不需作战，兵器收藏而不使用。老子说：‘犀牛没有使用牛角之处’，‘毒虫没有地方输放毒液。’因此，如果君主仁，没有人不仁，如果君主义，没有人不义。世上哪里有盗跖、庄蹻可去亲近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说话推心置腹，对话展现真情，内有真实诚恳之心，外形见于颜色。春秋宋国大夫华元、楚国司马子反见面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心理像符契一样相合，这的确是他们互相信任啊。如今匈奴抱有不讲信用的心理，胸怀不可预测的欺诈，见了利益就上前，抓住便利就行动，他们偷偷地潜藏到市场旁边，来袭击没有防备的中国民众。这就如同将贵重宝物放在道路上而没有人看守。如此而求得其不灭亡，怎么能做到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君主诚信彰显于天下，纯德流布于四海，那么近处的人就会通过歌颂而使他快乐，远方的人就会手执见面礼而来朝贡。因此纠正近处的人不靠威风，招来远方的人不凭武力，靠的是修德行义，任用贤良。因而民众对于事务，辞去安逸而选择劳苦，对于财物，辞去多的而选择少的。上下相互交让，道路上行人像雁行一样有序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人们轻贱财货而重视德行，重视道义而轻视利益，即使用奖赏的办法让他盗窃他也不会干，还看守什么宝物呢！”

## 和亲第四十八

本篇以“和亲”为题，但所论不局限于“和亲”，而是汉家对匈奴的政策。大夫认为，对匈奴决不能放弃军事防备而侈谈仁义，因为匈奴是从来不讲信用的禽兽之国，屡和屡叛，反复无常，这是他们不可改变的自然天性。文学不赞成汉武帝征讨匈奴的决策，认为汉家伐胡几十年来，边境民众因受战争影响而无法过上和平生活。他希望汉家像公刘、太王、周公一样对戎狄致力于仁德教化。双方的分歧仍然体现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上。

大夫说：“从前徐偃王施行仁义而灭亡，鲁哀公好儒生而公室削弱。他们只知文治而不知武功，只知一个方面而不知两个方面。因此君子厚于仁爱来行事，但一定要修筑城墙来自我守卫，设置器械来自我防备，为的是防止不仁的人坑害自己。所以在古代，春秋打猎，整顿军队，检查车马士卒器械，怕的是民众只顾苟且偷安而忘记戒备灾难。因此兵器、盔甲是用来保卫国家的，城墙、营垒是用来巩固国防的。你们却想取消兵革城垒，这是要去掉国防的外表，展现内里，将自己的心腹要害暴露给匈奴。匈奴人轻装行动，秘密前进，来偷袭国防空虚之处，这如同不披盔甲而站在箭石所射的道路上，灾祸必定不能避免。这是边境所恐惧的事，也是主管官员所担忧的事。”

文学说：“以前，汉家与匈奴开通关卡桥梁，彼此交换有无，从单于到以下的匈奴人，都亲近汉家，愿意内附，与汉家往来于长城之下。后来，王恢错误地谋划马邑之役，于是匈奴断绝和亲，进攻交通要道上的关塞，灾祸纠缠连结而难解，战争连年不息，边塞居民不解盔甲，不敢放松弓弩，经历几十年，穿着铠甲、戴着头盔而耕耘，手里拿着锄头木櫌而守望观察敌情，边关上烽火连片，青壮年挟持弓箭出去战斗，老人赶快躲入堡垒。这些话说起来足以让人流涕寒心，仁义的人是不忍心这样做的。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写道：‘投给我一只桃，报答你一只李。’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以善交往而招来以恶来回报的。因此君子恭敬严肃而没有失礼之处，如果做到与人恭敬而有礼貌，那么四海之内，大家都是兄弟。所以自我内心反省而无愧疚，有什么可忧，又有什么可怕呢！”

大夫说：“自春秋以来，中原各诸侯国君主，会盟结约，多次会盟之后，彼此乖异怀疑随之而来，互相攻伐，战斗不止；战国时期山东六国合纵抗秦，使者冠带相望于道，但是从来就不曾有坚定的盟约。中原如此，何况是像匈奴这样的禽兽之国呢！《春秋·襄公二十九年》慰问羁留在南蛮楚国的鲁襄公，《春秋·定公四年》记载鲁定公参加诘鼬会盟，都是认为夷、狄危险。匈奴屡次与汉家和亲，常常先犯盟约，贪婪侵扰，盗掠得手后撤走，是擅长欺诈的国家。他们反复无信，一百次盟约便有一百次背叛，像尧的不肖子丹朱、舜的不肖弟象一样劣性难移，像舜的不肖子商均一样不能感化。要听信匈奴作用兵的准备，又依靠仁德来亲近他们，这也太难了。”

文学说：“天子居于天下之中而听天下之政，仁德施于国外，远方不同风俗的邦国，都来到天子宫阙朝廷，凤皇停在树上，麒麟在郊野游玩，天下各种生物，没有不蒙受天子恩泽。这并不是天子亲自跑路经办的，而是天子推广仁恩而加以扩大，这是出于天子的诚心啊。范蠡出于东夷越国，由余生长在西戎，他们后来都成为霸王贤明的辅佐。因此只有朝廷发布不可遵从的教令，而世间没有不可教化的民众。《诗经·大雅·泂》说：‘取来路边积水，舀水注到这里。’因此公刘居于戎狄之间，戎狄被公刘所感化。太王离开豳地，豳地民众跟随他迁到岐下。周公修德行义，越裳氏前来朝贡。人们从善如流，如同影之随形，响之随声。朝廷为政，务求以仁德亲近匈奴，那还担忧什么他们天性不改呢？”

# 卷九

## 繇役第四十九

本篇题为“徭役”，其实文中也涉及兵役。汉武帝外伐四夷，不可避免地要征发大量民众从事兵役和徭役。大夫认为，自古以来，明君圣王都要从事征伐和防御。他特别指出，不仅民众要为战争付出劳苦，就是汉武帝本人为了战争也拿出皇家经费，解下车舆上的骖马，减少音乐娱乐，降低伙食标准，来赈济贫困，补给边疆费用。文学主张汉家应该实行文治，不要炫耀武功，因为兵役和徭役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

大夫说：“屠夫解割肉骨时只要合于腠理，就可以从旁侧用手撕开；至于抽筋砍骨，不用斧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圣明君主遵循人性而进行教化，如果有不服从的，也要出兵征伐，所以商汤诛讨葛伯，文王诛讨犬夷。到了后来戎狄扰乱华夏，中国不能安宁，周宣王、仲山甫遏止戎狄侵扰。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写道：‘出兵讨伐猃狁，一直打到太原。’《诗经·小雅·出车》说：‘战车出行彭彭，到那北方筑城。’自古以来，英明君王不能不通过征伐而征服不义之人，不能不修筑城垒而防御强暴。”

文学说：“帝舜让人手执盾牌大斧跳武舞而有苗驯服，文王宣示仁德而怀柔四夷。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说：‘镐京建了辟雍，从西方到东方，从南方到北方，无人想到不服。’普天之下，只要是人类，没有人不伸长脖子而归顺道义。因而只要在地上画个界限，就没有人敢侵犯。孔子说：‘白刀子可以冒犯，但中庸不可侵入。’说的就是最高道德啊。因此善于进攻的人不需要坚固的盔甲而能攻克，善于守卫的人不需要护城沟渠而能固守。周武王讨伐殷纣王，手执黄钺，在牧野誓师，天下士兵没有人不愿为他所用。不久休兵，大臣们插朝笏上朝，天下民众没有人不愿意做他的臣民。周王朝以正义取得政权，以仁德守卫政权。秦王朝以暴力夺取天下，以严刑峻法守卫天下，本末倒置，因而灭亡。文治可以长用，武功难以久行。”

大夫说：“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写道：‘猃狁气焰很盛，形势因此紧急。’《诗经·大雅·江汉》说：‘武士英勇威武，讨伐四面八方。’因此守御边疆，征伐四夷，由来已久。《春秋》充分肯定戎狄尚未侵犯就事先防御。因而四肢强壮就会身体强健，花叶茂盛就会树大根深。因此整治四境是为了安定中原内地，征发戍边漕运是考虑到一劳永逸。君主忧虑时臣下应该多操劳，在上位者危险，在下位者应该为之献身。已故武帝担忧百姓不富足，便拿出皇家经费，解下皇帝车舆上的骖马，减少音乐娱乐，降低伙食标准，来赈济贫困，补给边疆费用。没有看到你们表达报答先皇施的意思，反而听到你们发表沮毁先帝成就的歪理，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西周王道衰微，圣王事迹消亡，诸侯争强称霸，大国欺凌小国。因此强国致力侵犯弱国，弱国设防备战。披甲之士劳于战争，为征战所役使，因而君主辛劳，民众困苦。如今中国成为一统天下，但国内却不安定，因为民众所服徭役的地方很远，境外境内都让人烦心。古时候，没有超过一年的徭役，也没有超过时限的兵役。如今近的徭役有数千里，远的徭役甚至超过万里，历时两年之久。长子不回来，父母就忧愁，妻子就长叹，心里产生愤懑之恨，思念之痛深于骨髓。这就是《诗经·唐风·杕杜》、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创作的原因啊。”

## 险固第五十

本篇围绕国家依靠什么来保证安全的问题展开辩论。大夫认为，国家安全取决于两个要素：一是地理险要；二是战略防备。他以秦国为例，说明秦国之所以吞并山东六国，就是由于秦国处于四塞之地，而蒙恬修筑长城，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。文学不赞成大夫的观点，认为仁义道德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手段，主张“以仁义为阻，道德为塞，贤人为兵，圣人为守”。论辩双方各有偏颇，而文学的观点过于迂腐，如果将双方意见合起来，即既重视国防建设，又注重以德服人，那么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全面的国家安全观。

大夫说：“老虎犀牛之所以能够抓捕熊罴、镇服群兽，是因为它们爪牙锋利，抓捕猎物方便。秦国之所以能够超越山东六国诸侯、吞并天下、兼并敌国，是因为它险阻稳固，地理位置有利。因此乌龟、刺猬有甲壳，狐貉不能捕捉它们；蝮蛇能咬人，所以人类忌怕而不敢轻视。所以有军事防备就控制他人，没有军事防备就受制于他人。因而周宣王名臣仲山甫能够弥补天子履职的缺失，蒙恬修筑长城险固，是用来防备来寇的灾难，从而退敌于万里之外。如今不巩固国家防御，却想安定国内，这就如同百姓不去修筑坚固的院墙，夜里一听到狗吠便会惊起，在黑夜中乱跑躲灾。”

文学说：“秦国东边有殽山和函谷关，西边有陇山，前边有蜀郡和汉中，后边是群山和黄河，四面要塞形成坚固堡垒，如同千里铜墙铁壁，加上良将勇士，手持锐利兵器防守山陉关隘，就像墨子防守云梯一样守护边塞。秦人认为，即使是商汤、周武王再世，蚩尤重生，也绝不敢轻易进攻秦国。但是，有一个名叫陈胜的戍卒，他既无将帅身份，也没有率领众多军队，只是凭借赤手空拳，就打败了秦朝百万之师，仿佛连围墙、篱笆这样的障碍都没有遇到。所以保卫国家的关键在于仁德，而不在于江山险固。如果真能做到以仁义为险阻，以道德为关塞，以贤人为兵器，以圣人为守将，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入侵。这样中国就没有狗吠报警，边境也没有像鹿受惊骇、狼行回顾那样的担忧。又怎么会在黑夜中乱跑躲灾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古时候，治理国家一定要考察土地、山陵、阻险、天时、地利，然后才可以称王称霸。因此要根据地理形势建造内城外郭，修治沟渠堡垒，以此防御敌寇巩固国防。《春秋·庄公九年》记载：‘冬天疏浚洙水。’这就是修整地利啊。三军顺应天时，以实击虚，然而有时会被险阻所困，被坚固城墙所挡。楚庄王围攻宋国，秦军在险峻的崤山惨败，就属于这种情形。因而孟子说：‘天时不如地利。’西羌和匈奴顽固，接近中国边境，现在不把它们打下来，一定会成为中国四境长久的祸患。这就是季孙肥之所以担忧颛臾，勾践变强而为强吴所懊悔的原因啊。”

文学说：“地利不如人和，武力不如文德。周朝能够招来远方异族，不是依靠地利，而是依靠人和。政权几百年不被人夺走，不是依靠江河险阻，而是依靠德政。吴国有三江、五湖的地理形胜，结果被越国兼并。楚国有汝渊、两棠的险要，结果被秦国消灭。秦国有陇阺、崤山关塞，结果被山东六国诸侯推翻。晋国有黄河、华山、九阿险塞，政权被六卿所篡夺。齐国有泰山、大海之险，结果被权臣田常所威胁。夏桀、殷纣王拥有天下，却被商汤、周文王所取代。秦王拥有天下，却被戍卒陈涉所困。以上这些君王并不是地利不够稳固，而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来守卫政权。放弃近处而担忧远方，像吴国一样，不去对内安定国家，而西渡淮河，与齐国、晋国争强；越国利用吴国的疲惫，攻击它的虚弱之处。假使吴王能够重用申胥，修治德政，不去依仗兵多，那么勾践免不了要做吴王海边的籓国之臣，如何敢图谋吴国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楚国从巫山起修筑方城，连接巫山和黔中，设立扞关来抗拒秦国。秦国拥有商山、洛水、崤山和函谷关，以此防御山东诸侯。韩国以宜阳、伊阙为险阻，以成皋、太行山为要塞，以此来安定韩国。魏国在洛水之滨筑城，以华山为险阻，以黄河为纽带，以此来保卫魏国。赵国连接飞狐口、句注山和孟门山，以此来保存赵国。燕国以碣石山为关塞，以邪谷为绝险，围绕辽水来保卫燕国。齐国镇抚东阿和甄城，以荣成山和历山为关隘，背靠泰山，依仗大海和黄河。关隘要塞是国家的坚固屏障，高山大川是社稷的珍宝。徐国人消灭舒国，《春秋·僖公三年》称之为‘取’，这是厌恶舒国没有战略防备，徐国得到舒国是如此容易啊。因此体恤他人会招致外敌来侵，仁义道德会伤害刑罚。君子治理国家，一定要有不可侵犯的战略防范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说：‘设置双重大门，派人敲梆巡更，为的是防范盗贼。’这是说平时要加强防备啊。”

文学说：“以地理险要为关塞，不如以仁义为关塞。从前商汤以七十里封地起家，最终作为天子执政天下。舒国有百里封地，却被敌国灭亡。这就是舒国被《春秋》厌恶的原因啊。假使关隘要塞足以依赖，那么山东六国就不会被秦国兼并；如果大河高山足以保国，那么秦国就不会被楚、汉灭亡。由此看来：战车高大不足以称为强盛，城垒高耸不足以称为稳固。行善就会昌盛，行恶就会灭亡。天子广博仁爱，恩泽远施，朝野内外同心同德，四海诸侯各以自己的职份前来助祭，还需要什么敲梆巡更防备盗贼呢？经典传记上说：‘诸侯国有关隘要塞，庶人拥有爵禄，这不是起于太平盛世，而是从战国乱世开始的。’”

## 论勇第五十一

本篇讨论克敌制胜的两个问题：一是国家安全究竟是靠金城利兵还是靠仁义道德，大夫持前一种观点，而文学坚持后者；二是能否通过勇士刺客行刺来保卫国家安全，大夫认为可以通过勇士刺杀单于的方法来制服匈奴，文学坚决反对动用刺客，主张通过圣贤治国来怀柔远方异族。文学的观点显然是一种理想主义，大夫强调金城利兵本有一定道理，但他想用刺客来臣服匈奴，则未免有失汉家大国风范。

大夫说：“荆轲胸怀数年的刺杀谋略而事情不能成功，是因为他的一尺八寸匕首不足依赖。秦王虽然面对意外刺杀而惊恐万状，但他最终斩杀勇如孟贲、夏育的荆轲，这是因为他依靠手中的七尺长剑。假使专诸赤手空拳，那么他不免会被吴王僚所擒；如果要离没有水上乘船的便利，那么也不能行刺庆忌成功。世上人都说强大的楚国、强劲的郑国，这是因为楚国、郑国有犀牛皮制作的铠甲和锋利的棠溪宝剑。对内依靠铜墙铁壁，对外依赖锐利的兵器，因此声威震撼中原诸侯国，强盛降服了敌对国家。因此孟贲挥动空拳，众人都会轻视；胆小鬼有备在身，勇气自然加倍。何况是以勇猛著称的吴、楚之士，挥舞利剑，脚踩强弩，与匈奴在中原驰骋作战呢？以一当百，是不在话下的！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匈奴就不能与汉家交战，兵力敌不过汉家，其情势一定会向汉家投降。这就如同商鞅逼迫魏国迁都、孙膑两次袭破梁军一样。”

文学说：“楚国、郑国出产的棠溪剑和墨阳剑，并非不锋利，用犀牛皮制作的盔甲，并非不坚固，然而不能使自己生存，这说明利剑是不足以依赖的。秦国兼并山东六国军队，占据崤山、函谷关有利地形而统治天下，如同金石一般坚固，莫耶宝剑一般锋利。然而陈胜没有统治民众的资本，没有坚甲利兵的装备，他们的武器是锄头、木棒、棘棍、锄柄，以此打败秦人高大的战车。秦兵盛大却不堪一击，乌号良弓也不起作用。人们所说的铜墙铁壁，并不是指用土壤高筑城墙，不是指挖掘很深的护城河。人们所说的锐利兵器，不是指吴、越兵器和干将宝剑。铜墙铁壁说的是以道德为内城，以仁义为外郭，没有人敢于进攻，没有人敢于入侵。周文王就是这样的啊。锐利兵器指的是以道德为头盔，以仁义为利剑，没有人敢于抵挡，没有人敢于防御，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啊。如今朝廷不去建筑不可进攻之城，不去铸造不可抵挡的兵器，却想依靠一两个匹夫刺客，施行三尺之刃，这种谋略也太细小了！”

大夫说：“荆轲手持匕首，进入祸福难测的强秦；秦王惶恐万分，毫无防备，卫士们都很恐惧。专诸手持利剑，接近万乘之君，刺杀吴王僚，使庶子吴王僚陈尸于朝，立真正王嗣公子光为吴王，穿着丧服为专诸送葬的人绵延千里。聂政从卫国出发，到韩国朝廷刺杀冤主侠累，大功告成，所求已得，于是退下来在朝廷上自我施刑，被韩国暴陈尸体于市。当今如果真能得到勇士，乘借强盛汉家的威风，凌驾于不讲信义的匈奴，控制他们的生死，对他们的罪过进行责问，就像当年曹刿胁迫齐桓公一样，满足自己的要求。打击匈奴的锋芒，挫折他们的锐气，这样那些住在穹庐的匈奴人就会乱作一团，君臣上下相互遁逃，汉家接着以轻装精锐军队跟随匈奴之后。匈奴人一定会束手就擒，不敢抵抗汉家。”

文学说：“商汤得到伊尹，以小小的亳都统治海内，周文王得到姜太公，疆域由丰、镐而扩大到天下，齐桓公得到管仲后称霸诸侯，秦穆公得到由余，西戎八个国家臣服秦国。我只听说过得到圣贤之后而落后边远邦国前来献享，从未听说过劫杀别国君主来达到怀柔远人的目标。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写道：‘惠爱京师民众，来安定中原诸侯国。’因此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说：‘从那个氐羌，没有人不来朝见商王。’他们并不畏惧中国军威，而是畏惧中国天子的仁德。因此仁义征服不义，比敊马良弓还要快；用仁义招来远人，比飞奔的驿马传车还要迅速。”

## 论功第五十二

本篇围绕征讨匈奴问题展开三轮辩论。第一轮讨论匈奴的难易，大夫从城池、兵器、粮食、礼义、智慧各个层面，力证汉家征伐匈奴之易，而文学则强调征讨匈奴之难。第二轮辩论汉武帝伐匈奴的功过，大夫充分肯定汉武帝征讨不义的匈奴，认为是“圣王累年仁义之积”，文学认为应该效法圣王以道德感化远人的方式，提出在战胜之后就应该退修仁义，不宜穷兵黩武。第三轮讨论要不要继续征伐匈奴，大夫认为要为汉家万世子孙考虑，根绝国家的外患，文学则举亡秦为例，说明战争不仅带来长治久安，反而可能导致国家灭亡。

大夫说：“匈奴没有内城外郭的防守，没有护城河的固垒，没有长戟强弩的兵器，也没有仓廪府库的积蓄，他们上无礼义法则，下无文教理规，君臣轻慢，上下无礼，编织柳条为房屋，用毡席做屋顶。他们的兵器是没有修饰的木弓和用兽骨制作的箭头，马不用谷子喂。在国内他们的防备不足畏惧，在国外他们的礼俗不足称道。中国是天下的中心，为贤士聚合之处，礼义汇集之所，财用繁殖之地。以智慧的中国谋伐愚蠢的匈奴，以仁义的中国讨伐不义的匈奴，就如同秋霜扫落叶一般。《春秋公羊传·庄公三十年》说：‘齐桓公讨伐戎狄，不过是将戎狄驱逐而已。’何况汉家是以天下之力征讨匈奴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匈奴的车辆、器具没有白银、黄金、丝绸、油漆的装饰，用材料的朴素本色制成，务求坚固，丝绸衣服没有花纹、彩色、裙子、蔽膝、交领之类的制作，用整幅布做成，力求完好。男子汉没有雕刻之类的奇技巧工之事，也没有宫室和内城外郭之类的建筑工程。女子没有刺绣花纹图案之类的过于精巧的贡品，也没有纺织花纹丝绢的劳作。事务简省而耐用，容易做成而难以坏掉。匈奴虽然没有长戟强弩，但他们却有战马良弓；家家有准备，人人有事做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挟弓上马就可以战斗。物资粮食虽然不见于食案，但可以支持几十日的口粮，他们凭借山谷作为自己的城郭，凭借天然的水草作为自己的仓廪。法令简约，易于辨别，要求很少，易于提供。因此匈奴刑罚减省，人们却不违犯，长官指挥，人们就服从命令。他们慢于礼节，却厚于信用，文书简略，却办事迅速。因此他们虽然没有礼义书籍，只是在兽骨上刻符记事，卷起木简为书，但是百官有记事的工具，君臣上下有互相传达信息的方法。群臣为朝廷出主意，都说讨伐匈奴容易，其实很难，因此秦朝想驱逐匈奴，结果反而自己灭亡。因此战争是凶器，决不可轻易用它。战争使强者变成弱者，使生者变成死者，也就是一个早晨的事情而已。”

大夫说：“鲁仲连说过：‘秦国用权诈之术对待士人，把民众当做奴虏使用。’因而秦国政治苛急，统治天下的时间不长。高祖皇帝接受天命，平定秦朝暴乱，功德巍巍高耸，只有天与高祖皇帝的功德同样高大。汉文帝、汉景帝继承高祖事业，加以发扬光大。到了已故武帝，征讨不义的夷狄，击退无德蛮夷的骚扰，以彰显仁德圣明的道路，使最高道德基业纯洁，这是圣明的君王年复一年仁义的积累啊。如今文学征引亡国失政的政治，拿当今政治作比，说匈奴难以对付，那是当然的了！”

文学说：“有虞氏时期，三苗不驯服，禹想征伐三苗，帝舜说：‘这是我的仁德未能感化他们。’帝舜于是退身加强政治教化，结果三苗归服天子。未经治理的地方，未能驯服的民众，圣王不会加兵征讨，不会从事武力，认为这不足以麻烦百姓而劳顿中国。如今圣明君主继承圣王事业，施行道德教化，而朝廷却有人使用权诈谋略，崇尚斩首计功之事，我对此感到奇怪。身为人臣，凭借天下之势，发挥国家效用，身享国家利益却不顾其君主，这就是尉佗、章邯称王，秦朝失去权柄的原因。孙子说：‘现在国家的事务，一日之内有上百种变化，然而不会亡国，这是因为可以得到变革的机会。等到叛军出战平原广野之上，战鼓齐鸣，箭矢如雨，此时即使有尧、舜的智慧，也不能扭转大局了。’战胜之后，就要退下来修治礼义，继承夏、商、周三代王道传统，这样仁义就归附了。战胜之后却不知休止，导致身死国亡，吴王夫差就是这样的人啊。”

大夫说：“顺风而呼的人容易运用声气，适应时势行动的人容易借力发挥。周文王、周武王怀有余力，可是他们不为后代继承人考虑去征讨四夷，因此到了第三代周王就功德衰败，周昭王南征荆楚，死于江中而不复还。周大夫凡伯出使途中被夷狄抓捕，结果夷夏信使不通。晋国军队夺取了周王室的郊、柳二邑。周王室军队被茅戎打败。如今的西南各夷狄国家，是楚庄王的后裔；朝鲜君王满是燕国的亡民。南越王尉佗来自中国，自立为南越武王，德行最为浅薄。可是他们都忘记天下之大，各自占据一方，态度倔强，倨傲不敬，自称‘老夫’。已故武帝为汉家万世着想，怕后代再有“凡伯囚执”的牵累和昭王南征不还之类的祸患，于是派遣左将军、楼船将军等将帅平定四夷，兵不血刃，四夷都归附朝廷。战国七雄并立时期，七国都拥有兵车万乘，七国君主都南面称王，彼此势均力敌，互为敌国，经年累世，然而山东六国君主最终不免俯首做了秦国俘虏。如今匈奴势力抵不上汉家一个大郡，他们没有像六国那样的人力物力，也没有六国贤士为他们谋划。由此来观察孰难孰易，显然易见。”

文学说：“秦国消灭山东六国，俘虏七位君王，有着充沛的余力，自以为连蚩尤也不能加害，黄帝也不能排斥。等到秦二世胡亥被杀死在望夷宫，秦王子婴自套绳索投降楚国，就连当年战国七位君王俯首就擒的境遇也不曾得到。假使山东六国仍然并存，那么秦国今天还是战国七雄之一，本来是不会灭亡的。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？自从秦孝公一直到秦始皇，世世代代秦君都在诸侯中称雄，时间长达一百多年。等到秦朝兼并天下，十四年就灭亡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在外没有敌国的忧患，在内自我恣意放纵。自身不是圣人，得志而不骄奢淫逸的人，人们从来还没有见过。”

## 论邹第五十三

本篇记载大夫与文学围绕如何评价战国阴阳家邹衍“大九州说”而展开的论辩。大夫盛赞邹衍学说境界弘阔，借此批评儒生目光狭隘，拘执一端，不知天下之义。文学贤良则认为邹衍学说实属“匹夫荧惑诸侯”，导致诸侯亡国破家的恶果。文学进一步指出，衡量思想学说的标准，不在于它所说的远近大小，而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治理国家。此前汉武帝曾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身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却在官方场合公开褒扬邹衍贬斥儒学，由此透露出一个信息：即使在经学昌明时代，诸子百家之学也并未完全绝迹。

大夫说：“邹衍痛恨后来的儒、墨之徒，他们不知天地的弘阔，不懂得宇宙广阔的道理，看到一个河湾就想通达所有河湾，守着一个墙角就想知道所有方向，这就如同没有测平仪器却想区分高下，没有圆规方矩却想知道方圆。邹衍于是推论《大圣终始》的气运，以此来晓喻王公大人，他先列举中国名山峡谷，以此推论到海外情形。邹衍认为儒、墨之徒所说的中国，在地理上只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，邹衍把中国取名叫赤县神州，中国之内被大禹分为小九州。其实，丘陵陆地隔绝不通，才可称为一州，一州之外有大海环绕着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八方之极，九州的边际就与天地接壤了。《尚书·禹贡》虽然也记载了中国山川高低和平原湿地，但《禹贡》却不能像邹衍那样明白天下大道理。因此秦王朝根据邹衍之说，试图通达天下九州，渡过大海，统治殊方异族，而使万国来朝。儒墨之徒只知道拘执于一田一亩的狭小思维方式，困守着一闾一巷的陋见，不知道天下大义。”

文学说：“尧任命禹为司空，让他平治水土，随着山林形状，砍削树木作为路标，根据高山大河确定九州分界。邹衍不是圣人，他发表怪诞欺人的奇谈，蛊惑六国君主，以求诸侯采纳他的邪说。这就是《春秋》所说的‘匹夫蛊惑诸侯’的情形。孔子说：‘活人尚且不能服事，怎么能服事鬼神？’附近的事尚且不明白，怎么能知道远方的大海情形？因此对实用无补的事，君子不做；对于治国无益的事，君子不为。夏、商、周三王遵信常道，他们的德惠扩展到四海；战国诸侯听信蛊惑人心的动听言论，而破军亡国如同丘山崩溃。从前秦始皇吞并天下之后，想吞并天下万国，结果丢掉了秦朝的三十六郡；他想到达周边大海，结果失掉了秦朝的州县。像秦始皇这样知道邹衍的‘大义’，还不如恪守儒家的‘小计’。”

## 论菑第五十四

本篇讨论天人感应学说中的灾异问题。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来解说《春秋》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理论，汉家以这套天人感应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。在本篇中，大夫向文学提出两个关于天人感应学说的尖锐问题：一是按照五行相胜理论，金得火则死；而按照五行与十二地支相配的学说，金生于火。为什么这两种说法相互矛盾？二是按照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理论，春夏为施行德政的季节，秋冬是实施刑罚的季节，这说明德政与刑罚二者不可偏废，为什么文学只片面强调德政而不谈刑罚？文学对第一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，采取了虚晃一枪的敷衍方法。关于第二个问题，文学认为根据天人感应学说，德始终占据主导地位，刑罚对德政仅起到辅佐作用。

大夫说：“巫与祝不可以一起参与祭祀，诸位儒生不可以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。他们迷信往古圣王，怀疑当今明君，否定他人，自以为是。其实谈论古代的人应该考察当今，探讨远处的人应该合于近处。日月在天上，但它们的征兆却在人间。灾异的变化，短命长寿的期限，阴阳的变化，春夏秋冬四时的顺序，水火金木土运行的终始，凶兆与吉兆的感应，鬼神的灵异，祭祀的福佑，日月的运行，星辰的轨迹，片面言论的缘故，诸如此类，它们的起始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不知道答案就保持沉默，不要随便扰乱人们的视听。”

文学说：“当初江都国相董仲舒推论阴阳之道，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相继，它们的关系如同父亲创生，儿子养育，母亲收成，儿子收藏。因此春天萌生，为仁；夏天成长，为德；秋天收获，为义；冬天收藏，为礼。这是自然界四时的顺序，为圣人所效法。刑罚不能用来形成教化，因而要推广道德教化。讨论远方的事情一定要考察近处的事，因此要用推己及人的方法，对他人施加刑罚，就如同对自己施加刑罚，看到民众勤劳，就如同自身勤劳。这样的话，又怎么能忍心杀害赤子般的民众，来从事无用的征伐，耗尽国家所依赖的人力和物力，而将朝廷势力推到大海边呢？南方越人认为螺蚌味美而轻视猪牛羊盛宴，粗鄙的人喜欢大呼小叫而以汤乐韶濩为怪音。因此那些不懂得气味的人，会以芬香为臭味，不知大道的人，以美妙言论为扰乱视听的奇谈。一个人无论短命还是长寿，都会根据他是行善还是为恶决定他的寿命。羿和敖都是因为具有巧力而不得好死，智伯因为贪婪凶狠而自取灭亡。天灾在人间的验证，吉兆在世上的感应，如同施恩得到报答一样，各自按照它们的不同类别而得到回报。因此乐于行善的人，上天会以福报来帮助他，这就是吉祥的符瑞。《周易·大有卦》说：‘上天保佑，只有吉祥，没有不利。’喜欢行恶的人，上天用灾祸来回报他，这就是妖灾。《春秋公羊传·宣公十五年》曰：‘上天对此产生感应，会有天灾发生。’周文王、周武王尊重贤才，接受劝谏，严肃戒惧，毫不懈怠，他们道德纯粹，无上美好，天神地祇都赐福给他们。《诗经·周颂·执竞》说：‘上天降福很多，天帝降福盛大。’太阳为阳，阳道光明；月亮为阴，阴道黑暗；日月象征着君尊臣卑的意义。因此阳光在天上普照，众多阴类的事物就在地上消亡；天上月儿圆，水中的蚌蛤就会受感应而丰实。因此为臣不尽臣道，那么就会阴阳不调，日月运行就会发生变化；政治教化不协调，就会水旱灾害不时发生，螟螣害虫遍地出现。这就是灾异感应啊。春夏秋冬四时按照顺序更替，人类就效法四时之功，星辰列于上天，人类就模仿它的行动。恒星如同朝廷公卿，众星如同万民。恒星端正，众星就会整齐，恒星混乱，众星就会坠落。”

大夫说：“文学谈到阳刚阴柔之类的事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胜相生。《周易》长于阴阳学说，《尚书》长于五行学说。春生夏长，因此代表夏季的火生于代表春季的寅木，火属于阳类；秋生冬死，因此代表冬季的水生于代表秋季的申金，水属于阴类。春夏秋冬四时和金木水火土五行，按照顺序交替兴废，阴阳属于异类，水火属于不同事物。金得到土而生成，得到火而死去，而代表秋季的金又生于代表夏季的巳，何种说法是正确的呢？”

文学曰：“兵器是凶器。铠甲坚固，兵器锋利，会成为天下人的祸殃。要用仁德这个根本来抑制兵器，这样政权才能久长。圣人效法这个以母制子的法则，压制兵器而不让它发展。《诗经·周颂·时迈》说：‘把盾戟收藏起来，将弓矢收进弓韬。周王追求的是美德，他要把这美德布于华夏。’衰落世道不是这样。违反天道来使残暴之心快乐，僵尸遍地，血流成河，来争夺土地。囚禁他国的君主，灭绝他人的祭祀，杀死他人的儿子，如同割草伐木一样，受刑的人在路上一个挨一个。将自己所厌恶的事情而施于他人。因此国家破灭，自身遭殃，秦王就是这样的人啊。”

大夫说：“代表秋季的金生于代表夏季的巳，此时刑罚逐渐增加，因此荠菜、小麦夏天死亡。《周易·坤卦》说：‘脚踩在霜上，坚冰季节就要到了。’秋天开始降下霜冻，草木凋零，进入冬季就执行死刑，万物全都收藏。万物在春夏季节生长，此时利于施行仁政。万物在秋冬季节肃杀收藏，此时利于施加刑罚。因此不在适当的季节去种植，即使苗儿生出来也不会成长。在秋冬季节施行德政，这叫做违反天道。《礼记·月令》说：‘凉风吹来，杀气萌动，蟋蟀鸣叫，棉衣狐裘制成。天子施行轻微的刑罚，开始秋祭，以此顺应自然节令。’文学混同四时政令，不分阴阳，一味提倡德治而主张废除刑罚。这样的话，鹰隼就变得不凶猛，猛兽不会抓取猎物，秋天不再打猎，冬天不再猎狩。”

文学说：“上天之道爱好生长，厌恶杀人；爱好赏赐，厌恶加罪于人。因而上天让阳居于实处，广宣仁德恩惠；让阴隐藏在虚处，作为阳的辅佐。阳为刚，阴为柔，排序最末的不能居于排序最前的之上。这就是上天以冬为贱，以春为贵，伸阳屈阴的原因。因此君王面向南面治理天下，他的背向着阴，面向着阳，这意味着将德放在前面，把刑放在后面。霜雪如果晚一点到来，五谷仍然能够成熟。而在夏天降下冰雹浓雾，那么万物都会受到伤害。由此看来，用严刑治国，就像依靠在秋冬季节种植庄稼一样。因此法令只是治理邪恶的工具，而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风化境界。所以古时候，英明的君王总是加强道德教化，放缓施加刑罚。法网会漏掉吞舟大鱼，判刑时往往要比法律条文宽松，到了后来，民众没有人违犯禁令。”

# 卷十

## 刑德第五十五

《论语·为政》载孔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以德治国与以刑治国，历来是治国的两条思路。本篇即围绕究竟是以刑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展开论辩。大夫倡导以严刑峻法来治国，通过法令的威慑使民众不敢犯罪。文学则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治国目标，认为当时法令过于繁多，连执法官吏都无法通读，更何况平民阶层？文学进一步以秦朝为例，说明法令愈多国家愈乱，笃于教化是治民唯一可行之道。

大夫说：“禁令是用来教育民众的手段，法律是用来督察奸邪的工具。禁令严格，民众就会谨慎；法律设立，奸邪就会禁止。罗网疏漏，就会失掉野兽；法律空疏，罪犯就会漏网。罪犯如果漏网，民众就会放纵，就容易触犯禁令。因此禁令执行如果不坚决，那么连胆小鬼都会心存侥幸去犯罪；如果诛罚得到坚决执行，那么就连跖、蹻那样的大盗也不会轻易犯罪。所以古时候制作墨、劓、刖、宫、大辟五种刑罚，还有各种肉刑，民众因此不敢逾越规矩。”

文学说：“道路众多，人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；法令繁多，民众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规避。因此君王制定法令，应该像日月一样昭著，这样民众才不至于迷惑；应该像大路一样宽广，才不至于民众困惑。无论是昏暗之处还是远处，都清晰地知道法令，闺妇少女，都知道如何规避。所以法令无人触犯，监狱牢房空虚不用。从前秦朝法令比秋天的枯草还要繁多，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要细密。但是官民上下欺骗隐瞒，奸诈作伪事件层出不穷，主管官员去治理，如同补救烂衣，扑灭烧焦的东西，根本不能禁止；这不是法网疏漏导致罪人脱逃，而是因为废弃礼义而任用刑罚。如今国家律令有一百多篇，法令条文繁杂，罪名设置很重，各郡和诸侯国适用时感到疑惑，有的律令太浅，有的律令太深，就连那些熟悉法令条文的官吏，也不知如何处理案件，何况那些愚昧的民众呢！法律禁令文件布满灰尘，生出蛀虫，被放在藏书阁架之上，连官吏都不能全部看完，何况是愚昧的民众呢！这就是官员断狱案越多，而民众触犯禁令的人也越多的原因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宛》说：‘要被囚系要入狱，手拿小米去占卜，如何才能得大吉。’这首诗所讽刺的就是刑法繁多。五服亲属人数很多，无论是向上减杀还是向下减杀，丧服都不会超过五等。五刑条目多达三千条，无论是向上比附还是向下比附，治罪都不会超过五刑。因而治民的方法，不过是务求厚于教化而已。”

大夫说：“文学说君王立法，应该像大路一样宽广。如今法令的驰道已经不小了，可是民众公然触犯刑罚，这是因为罚罪太轻。千仞的高山，人们不会轻易攀登，千钧的重鼎，人们不轻易抓举。商鞅当年对在道路上倾倒炉灰的人施刑，结果秦国民众大治。因此偷盗马的人死罪，偷盗牛的人枷锁囚禁，这是用来重视农耕根本、杜绝民众乘轻车快马游冶的手段。军队粮草充足，这是用来帮助边防、重视军事装备的方法。偷盗时伤人与杀人同罪，这是使犯罪者心里有所顾虑、谴责犯罪者的犯罪意图的手段。这就如同鲁国借楚国军队征伐齐国，《春秋》对此表示厌恶。因此轻罪重判，浅罪深究，这是有缘故才这样做的。法令的精微者，本来就不是众人所知道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说：‘大路如磨刀石，箭杆一般笔直。’说的是大路平易。《大东》又说：‘大路为君子所走，为小人所注视。’说的是大路明显。因而道德明显就易于随从，法令简约就易于施行。如今天子的驰道穿过丘陵平地，纡回环绕天下，所以万里江山都成为民众的陷阱。罗网张开悬在山谷之口，陷阱设置在大路当中，经过伪饰的短箭安在山上，百姓能不遭殃吗？聚集人们所想要的，开启人们所贪图的，在仁义衰落的情况下，百姓能不越轨吗？因而发展到最后，达到攻陷城邑，抢劫国库金钱，盗窃宗庙祭器的程度，岂只千仞之高、千钧之重呢！管子说过：‘礼、义、廉、耻四大纲纪不能施张，即使是皋陶也做不了执法官。’因此，废弃了道德教化就会导致奸诈作伪盛行，礼义崩坏就会导致奸邪兴起，说的是没有仁义的后果。仁是爱的体现，义是事物的适宜。因此君子爱好仁义，推仁及物，治理近处，推治及远。传记上说：‘凡是有生命的事物，没有比人更珍贵；君主所珍视的，没有比人才更贵重。’因此上天创生万物来奉养人，君主爱人来顺从天。我只听说过以六畜禽兽来奉养人，没有听说过以所养的六畜来加害于人。鲁国马厩失火，孔子罢朝回家，只问人是否受伤，不问马的情况，这是孔子贱视畜生而重视人类。如今偷盗马匹的人被判死罪，偷盗牛的人枷锁囚禁。乘车骑马行于驰道，官吏加以呵斥，如果仍不停止，那么罪同盗马，被判死罪。假如有人在伤害他人之后持其刀剑逃亡，也能说盗窃武库兵器而杀死他吗？君主制定法令而民众犯法，也能说他当面轻视君主法令吗？判罪从严可以定死罪，判罪从宽可以赦免，这并非法律禁令的本意。法是根据人情而制定，并非设定罪名来陷害民众的。因此孔子《春秋》断案，根据犯罪者心理动机来定罪。本意善良而违犯法令的人可以免罪，本意邪恶而合于法令规定的人被诛杀。假使伤了人却无大害，本意不太邪恶而合于法令规定的人，能够说他偷盗伤人吗？或者说是不是执法的人太过分了呢？为什么如此让人不能心服口服呢？古时候，伤害他人且致人重伤的要判刑，偷盗有赃物的要处罚，杀人的人判死罪。如今夺取他人兵刃自卫而伤及他人，与杀人同罪，这恐怕不是制定法令的本意吧？”大夫把头低下，又抬起头来，没有回答。

御史说：“执法的人是国家的缰绳和马嚼子，刑罚是国家的系船大绳和船桨。因此如果马缰绳和马嚼子得不到整治，即使是优秀车夫王良也不能驾车到达远方；如果不设置系船大绳和船桨，即使是优秀船工也不能驾船渡过河水。当年韩非痛恨拥有国家的诸侯不能明白法令和权势，以此来驾御其臣下，实现富国强兵，抵制敌人，抵御灾难，反而被那些愚昧儒生的文词所迷惑，以此怀疑贤士的谋略，举用轻浮不实的蛀虫，凌驾于有实际功劳的人之上，如此而希望国家得到治理，如同放弃阶梯而想登高，没有马衔而驾驭烈马。如今刑法设置完备，而民众仍然犯法，何况是没有法令呢？必定会导致社会大乱！”

文学说：“缰绳和马嚼子是驾驭的工具，得到优秀车手才会协调。法令和权势是治国的工具，得到贤人才臻于化境。执马缰绳的如果不是优秀车夫，马就不听使唤而奔驰不止。掌舵的如果不是优秀舵手，那么船就会倾覆或损伤。从前吴国让太宰伯嚭掌舵，结果船破人亡，秦国让赵高执掌缰绳，结果车覆国灭。假如废除儒家仁义学说，而任用那些迷信刑名之人，那么就会让吴国、秦国的悲剧重演。做君主的人应该效法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，做丞相的人应该效法周公，研究思想学说的人应该效法孔子，这是百世不会改变的道理。韩非诋毁先王，不遵从先王之道，舍弃正确教令而不听从，最终落入陷阱，被囚禁在大牢，客死在他乡秦国。不学习大道，只是掌握小的辩术，这样足致自害其身而已。”

## 申韩第五十六

申不害、韩非是战国法家代表人物，本篇以“申韩”为题，探讨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思想理论问题。御史认为，孔子倡导仁义，伯夷隐遁首阳山，都未能起到感化民众的作用。治国必须设明法，陈严刑，防非矫邪，像吴起、申不害、商鞅那样，依靠法令和权势来威慑民众，使他们不敢犯罪。文学则认为法令不能治本，商鞅变法破坏了秦国的良善风俗而无法恢复，而周国运用德治，不用刑罚达四十年之久。正反例证说明，治国应该从根本清除致乱之源，用道德教化取代严刑峻法。

御史说：“如果一定要等到周公为丞相，那么世上就没有诸多国家。如果一定要等到孔子为师而后学习，那么世上就没有儒家和墨家。衣上有了小缺口，一小块布就可以把它缝补起来，而一定要等到用整匹布来换；政事上有了小缺陷，用法令就可以弥补，而一定要等到用《诗经》的《雅》、《颂》才去治理；这如同舍弃邻近医生，而一定等到求得名医俞跗之后才去治病；不用身边的污池废水，一定要等到运来长江、大海之水然后再救火。宁绕弯路而不走捷径，有了缺陷而没有补救措施，所以法令无人服从而秩序混乱。善于执政的人，有了弊政就加以弥补，有了决口就予以堵塞，因而吴起用法令治理楚国和魏国，申不害和商鞅用法术使秦国和韩国富强。”

文学说：“拥有国家的君主都会从众人中选拔贤才而加以任用，学者都会博览群书择善而从，何必一定要等到周公、孔子！不过是效法他们而已。商鞅违反圣人之道，变乱秦国良善风俗，后来秦国政治变得混乱而不能治理，失去良风善俗而不可恢复。这就如同一个愚蠢的人在沼泽地放火，这片土地就再也不能恢复原貌了；蜂蝎咬了人，即使将蜂、虿放跑弄死，也不能清除它的毒液。烦扰之后加以制止，焦躁之后让其安静，上下辛劳烦扰，混乱越来越厉害。因此圣人的教化，上与日月一起光照宇宙，下与天地一同流转，怎么能说是小的弥补呢！”

御史说：“衣服缺了不补，就会破得一天比一天厉害；堤防漏水不堵塞，漏洞就一天比一天大。黄河当初在瓠子决口，只是涓涓细流而已，到了后来，泛滥成灾，成为中国一大祸害，淹没了梁、楚地区，冲破曹、卫一带，城墙被冲垮，财物在水上漂流，百姓爬到树上栖息，千里看不到房屋，孤儿寡妇没有依靠，老人弱者无处归依。因此已故武帝同情百姓受灾，亲自视察河堤，像当年大禹治水那样治理黄河，黄河决口因此得以修复，梁、楚、曹、卫一带终于恢复安宁。百姓感戴武帝治河之功，歌咏他的大恩大德，歌唱‘宣房堵塞，万福来临’。其他政事也像这样，怎么不要在细小之时弥补呢！”

文学说：“黄河决口最初像瓮口一样细小，最后却冲破千里河堤，何况是礼义决口呢？它的危害也够多了！如今每年断案数以万计，犯法的人越来越多，它所侵害岂止是曹、卫一带呢！你们知道堵塞宣房而幸福来临，却不知道堵塞致乱之源就会天下大治。周国这样做了，结果国家不用刑罚长达四十多年。黎民如果像春夏秋冬四时交替那样自然走完生命历程，那么天下就没有孤儿了。《诗经·周颂·雍》说：‘保佑我长寿，赐给我多福。’这样的赐福，也算不小了！朝廷如果在诚信礼义上做得像塞宣房那样，那么功业早已建立，皇帝垂衣拱手，无为而治，主管官员还有什么需要弥补，法令又有什么需要堵塞的呢？”

御史说：“犀利的大锄，锋利的锄头，对于五谷有利，而对苗间杂草有害。明确的审理，公正的法令，为奸邪之人所厌恶，而对于良民百姓来说却是福音。因此弯曲的树木厌恶取直的绳墨，奸邪之人厌恶公正的法律。所以圣人明辨是非，洞察治乱，因而设置明确的法律，发布严厉的刑法，防止为非作歹的现象，矫正奸邪之人，如同隐括、辅檠矫正曲木一样。因此，水是防备火灾的，法是禁止奸邪的。没有法律权势，即使是贤人也不能进行治理；没有坚甲利兵，即使是孙子、吴起也不能克敌制胜。所以孔子倡导仁义，而民众并不听从；伯夷逃隐到首阳山，而民众并没有被感化。”

文学说：“法律能够给人判刑，但不能使人廉洁；法律能够判人死罪，但不能使人变得仁义。人们看重良医，是看重他能够准确把握脉象的阴阳盛衰，祛除致病的邪气，而不是看重他运用银针砭石来刺激肌肤穴位。人们看重一个优秀官员，是看重他能够在罪恶尚未萌生之际斩断恶念，使人不去犯罪，而不是看重他将犯人关进大牢而将其定刑杀死。现在人们所说的优秀官员，以法律条文苛察加祸于民，以强权暴力残害下属，不根据立法的本意，而专门听凭自己的残暴之心，深文周纳，假借法令名义，来陷害无罪民众，并牵连诸多无罪亲属，儿子牵连父亲，弟弟牵连兄长，一个人有罪，一州一里都为之惊骇，十个家庭为之逃亡，如同毒疮持续溃烂，好色淫乱互相影响，一个枝节牵动，百根树枝动摇。《诗经·小雅·雨无正》说：‘舍弃那些有罪的人，相互牵连多人陷罪。’诗句伤痛的是无罪而受牵连。不怕锄草工具不锋利，怕的是舍弃杂草而锄掉禾苗。不怕没有测量水平的仪器，怕的是舍弃曲木而纠正直木。因此，关系亲近的人犯错不坚决处罚，相当于有锄头而不用；关系疏远的人有功劳不坚决给予奖赏，相当于禾苗得不到养育。因而世上不怕没有法令，怕的是没有坚决执行的法令。”

## 周秦第五十七

本篇以“周秦”为题，西周是礼治的代表，秦朝是法治的代表，因此本篇所辩论的是礼治与法治问题。御史坚持以严刑峻法治国，他的理由是：“立法制辟，若临百仞之壑，握火蹈刃，则民畏忌，而无敢犯禁矣。”文学认为，治国应该运用礼乐教化的方法，刑罚是礼治失效之后所采取的措施，“周其礼而明其教，礼周教明，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。”御史与文学的观点分歧，实际上是法家与儒家在治国思路上的根本差异。

御史说：“《春秋》不书写罪人的姓名与位号，称他们为‘盗’，是以此贱视罪人，不把他们视为人类。因此君主不把罪人视为臣民，士不把罪人视为朋友，罪人在乡里无地自容。因此民众耻于犯罪。如今一些不法之民，触犯国法之后，互相以为光荣，完全抛弃亲属，不能低头认罪，不断地逃窜，他自己陷于犯罪，被官府判刑杀头，不是适宜的吗？一家之中，父兄之间的关系，如同身体各个部位相连一样，一个关节触动，心里都会知道。因此现在从关内侯以下，居地挨近的五家被编为一伍，在家时各家各户相互观察，进出互相监督，父亲不教好儿子，兄长不纠正弟弟，除了父兄，还去追究谁的责任呢？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候，周密地规定礼仪，明确地实施教化。礼仪周密了，教化明确了，然后对不听从的人按照不同等级施行刑罚，刑罚适中，民众不会怨恨。因此帝舜对共工、兜、三苗、鲧四大罪人实施惩罚，天下人都为之信服，这是因为帝舜诛讨的是不仁之人。无论是轻罪还是重罪都各服处罚，坚决实施刑罚而没有赦免，所赦免的只有那些证据不足的嫌疑犯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，那么世上哪里会有不法之人而对他们定罪处罚呢？如今杀人的人可以活着，抢劫盗窃的人当富翁。因此良民百姓内心懈怠，放弃耕作而失去信心。古时候，君子不接近受过刑的人，受过刑的人不能算一个人，他们或被流放，或被杀死，给他们的后代带来羞辱，因此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，没有人不感到羞耻的。如今那些品行不端的人，贪得财利以致身陷牢狱之灾，蒙受刑罚耻辱而捐弃礼义，常年苟且偷生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受宫刑进蚕室之后，创伤还没有愈合，就到皇宫值班守卫君主，出入宫殿之中，还能享受朝廷俸禄，吃御厨赐给的饭食，自己安富尊荣，妻子儿女过着富饶的生活。因此有人身居卿相之位，蒙受刀锯之刑却不见伤心，何况是广大庶民呢？这还有什么羞耻！如今废除了道德教化，却以礼义来苛责民众，这是虐待民众啊。

《春秋公羊传·成公十六年》说：‘儿子有罪，抓捕他的父亲。臣子有罪，抓捕他的君主，这是听讼断案过程中最大的失误。’如今因为儿子犯罪而处罚父亲，因为弟弟犯罪而处罚兄长，亲戚之间互相牵连，十家五家之间互相连坐，这就如同拔起树木根本累及花朵树叶，伤害小指而拖累四肢。这样的话，就因为一人有罪而诛及那些无罪的亲属和邻居，天下没有罪的人就很少了。春秋时期臧文仲治理鲁国，战胜盗贼之后自我夸耀。孔子弟子子贡说：‘民众都要欺骗了，何况是盗贼呢！’因此对执法官员吏来说，不能因为他断案多就称他为好官，对于医生来说，不能因为他针灸多就称他为良医。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大夫子产对两个罪人施刑，杀死一个罪人，结果郑国道不拾遗，民众也没有欺骗之心。因此身为民众父母官，对民众就要像抚养生病的孩子一样，对民众多施厚恩而已。自从汉家设置首谋藏匿罪人互相牵连的法律之后，父子兄弟骨肉的恩情废掉了，受刑定罪的人多了。父母对于子女，即使有罪仍然将他们藏匿起来，不过是不想承担牵连之罪罢了。我只听说过儿子为父亲隐瞒，父亲为儿子隐瞒，没有听说过父子互相牵连。我听说过兄弟之间放缓追究以便让贼人逃脱，没有听说兄弟之间互相牵连。听说过厌恶恶人，仅止其人本身，听说过痛恨始作俑者而诛为首作恶者，没有听说十家五家互相连坐。《老子》第五十七章说：‘在上位者没有过多欲望，民风自然会淳朴；在上位者不要管得太宽，民众自然会富裕。’君像君，臣像臣，父像父，子像子。即使是比邻而居，又何必将五家编为一伍，执政者又何必责令他们互相监督呢？”

御史说：“背负千钧重担，来攀登望不到顶的高峰，接近悬崖峭壁，下临深不可测的深渊，即使有庆忌的敏捷，孟贲、夏育的勇猛，没有人不为之心惊胆战，这是因为他们深知一旦掉下去，就会摔得粉身碎骨，肝脑涂地。因此人们未尝被灼伤而不敢用手握火，是因为他看到有人被灼伤。人们未尝被割伤而不敢用手握刀刃，是因为他看到过有人被割伤。人们已经知道为非作歹，一定要被判罪，而且连累到他的父兄，必定会畏惧而改恶从善。因此制定法律，就如同面临百仞山谷，如同手握碳火，脚踩刀刃，这样民众就会畏惧忌惮，就没有人敢于违犯禁令了。慈母会有败家之子，这是因为她不忍心对孩子的小错误进行惩罚。严厉的家庭没有强悍家奴，这是因为管教严格。如今不制定严厉家庭管教下人的措施，却采取慈母培养败家子的方法，那就十分糊涂了。”

文学说：“殷纣王创造了炮烙酷刑，秦朝有收录罪人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的法律，赵高在朝廷内按照严峻的法律条文定罪，百官在各郡县以酷法斩断刺割民众的身体，被杀死的人相互枕藉，受刑的人相望于道，百姓侧目而视，重足而立，不寒而栗。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写道：‘天空是何等的高，却不敢不弯下身子。大地是何等的厚，却不敢不小步走路。可哀的是当今之人，为何都成毒蛇蜥蜴！’那个时候，岂止是冒着烈火、踩踏刀刃呢？但是父子互相背弃，兄弟互相欺骗，甚至于骨肉相残，上下相杀。这不是由于刑法太轻而执罚不坚决，而是因为法令太严厉而不施仁义恩德。因此政令宽松就会下亲其上，政令苛严就会导致民众谋害其主，晋厉公被大夫幽囚而死，秦二世胡亥被赵高杀害，这哪里是峻法之下无人犯罪，严厉家庭没有强悍家奴呢？圣人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务求和谐而不求威严。因此高祖皇帝简化秦朝苛法，以此安慰对朝廷怨恨、憎恶的民众，培养民众的和睦之心，唯恐刑罚太重而恩德太薄。所以汉家恩德广施无穷无尽，德泽流于后世。商鞅、吴起认为秦国、楚国的法律太轻而增设法令，对上危害君主，对下殃及自身，这或许不是慈母不教育孩子的后果吧！”

## 诏圣第五十八

本篇以“诏圣”为题，“诏”意为“告”，“诏圣”就是告以圣人之道。御史指出，衣服破了要去裁制新衣，法律出了毛病就要重新制定，法令制作随时代变化而变化，因此不能以上古法令简单来否定当代法令繁多。他认为：“礼让不足禁邪，而刑法可以止暴。明君据法，故能长制群下，而久守其国也。”文学描述了成康之治“赏无所施，法无所加”的美好情景，认为“闻礼义行而刑罚中，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”。针对大夫关于殷周为什么出现盛世问题，文学指出：“汤、武经礼义，明好恶，以道其民，刑罪未有所加，而民自行义，殷、周所以治也。”用礼义治民，就是文学所要讲述的圣人之道。

御史说：“夏朝人不违背诺言，殷朝人立誓，周朝人会盟定约，道德信用越来越衰落。没有周文王、周武王时期的人，却想修订那个时期的法律，这就是殷、周失去权势，而被诸侯夺权的原因。因此衣服破了才去裁制新衣，法律出了毛病就要重新制定。高祖皇帝时期，天下刚刚安定，高祖皇帝发布仁德政策，推行一时的法令，这是权变，而不是拨乱反正的正常法令。后来，汉家法令逐渐被人触犯，不能正确处理。因此作奸奸犯科事件萌生而导致《尚书·甫刑》制作，王道衰微而《诗经》讽刺宗旨彰显，诸侯暴虐而孔子《春秋》讥刺。渔网的网眼少了就不能捕到鱼，高祖临时制定的三章之法不能长期用来治民。因此法令不得不增加，法律条文不得不多。唐尧、虞舜时期在犯人衣冠上画图不是出于袒护，商汤、周武王制定肉刑也不是主观故意，这是因为时世不同，治国任务的轻重也不一样。”

文学说：“民众依赖法律，如同鱼依赖水，水清鱼就安静，水浊鱼就烦扰。民众烦扰就不能安居，清静就会乐业；乐业就会富裕，富裕就会仁义产生，丰足就会停止纷争。所以在成、康之世，想奖赏无所施行，法令也无处施加。不是可以判刑而不判刑，而是由于民众没有人犯禁；不是可以奖赏而不赏，而是民众没有人不仁义。像这样，官吏有何事需要处理？当今治民的官员，像笨拙的车夫驾驭马车，马在行走时要它停顿，马停下来又去鞭打它。马的身体被鞭棰抽伤，马的嘴角被马嚼子勒伤，在这种情形下要求马没有失误，怎么可能呢？楚灵王在乾谿土崩瓦解，梁国从内部崩溃，严刑峻法不能禁止。因此疲惫的马不怕鞭棰，疲惫的民众不怕刑法。即使是增加法律，大概是没有益处吧？”

御史说：“高墙三仞，即使是楼季也难以攀登；山脉高耸入云，连牧童也能登上山顶。因为险峻就会使楼季难于登上三仞高墙，因为山坡平缓就使牧童轻易攀登山顶。熔化的黄金在火炉里，连庄蹻都不会看一眼；钱币在路上，普通妇女都会去捡它；这并不是普通妇女贪婪而庄蹻廉洁，而是由于法律处置的轻重不同，利害分明。因此法令可以信赖而不可逾越，可以面对而不可侵犯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说：‘不可空手搏虎，不敢无舟渡河。’因为这样做没有益处。鲁国崇尚礼义却有季孙氏、孟孙氏的灾难，燕哙迷信禅让却导致子之之乱。礼让不足以禁止奸邪，而刑法可以防止强暴。圣明君主依靠法令，因而能够长期统治臣下，长久守住国家。”

文学说：“古时候，宣明仁义的誓约，使民众不违反。不经过教育就杀头，这是残害民众。与其让刑法不可违反，不如让仁义不可违反。我听说过礼义施行而刑罚适中，没有听说过刑罚施行而孝悌之风兴起。在狭窄的地基上修筑高墙，这个高墙是修不起来的。运用严刑峻法来治国，是不能长久的。秦二世胡亥听信赵高的计谋，施行繁重的刑罚管教，路上一半行人是受过刑的人，被处死的人日益增多。官吏以多杀民众为忠，以想尽办法残害民众为能。百姓承受不了官府的苛求，民众忍受不了朝廷的酷刑，国内民众有共同的忧患，都无法生存下去。因此超过能力的事，连父亲也得不到儿子的帮助；无穷无尽的苛求，连君主也得不到臣子的尽忠。死去的不会再生，穷途末路的老鼠也会咬狸猫，匹夫也会奔向万乘君主与他拼命，贵族门下的舍人会因为弓箭折断而杀死主人，陈胜、吴广就是这样的人啊。那个时候，天下共同起义，从四面八方围攻秦朝，听说不到一年，秦朝社稷就成为废墟，哪里能够长期统治臣下，长久守住国家呢？”御史默不作声。

大夫说：“盲人乐师虽然不知道白黑，但他们善于听别人说话；儒生虽然不知道如何治国，但他们善于批评。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应该符合人事，善于讨论古代的人应该考察当今。禁令为什么要施行？刑法为什么要执行？商汤、周武王少用刑罚保全肌骨，殷、周因此得到治理，秦国用刑法治国，法制败坏而受到侵犯。写在二尺四寸竹简之上的法律，古今都是一样，有的因为法律而得到治理，有的因为法律而陷入大乱。《春秋》追究犯罪动机，《甫刑》要求按照刑法断案。现在我想听一听治乱的根本，导致周秦一治一乱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文学说：“春生夏长，圣人取象而制作政令。秋天肃杀冬天收藏，圣人效法而制定法律。因此令就是教育的意思，是用来教导民众的工具；法意味着施行刑罚，是用来禁止强暴的手段。法令二者，是治乱的工具，都有存国和亡国的不同效果，关键在于君主如何运用。商汤、周武王运用礼义，明辨好坏，来引导民众，刑罪尚未施加，而民众自己遵行礼义，这是殷、周实现大治的原因。上面没有道德教化，下面没有法则，任意施刑，坚决诛杀，割下的鼻子装满土筐，斩断的脚装满了车子，整个黄河以西地区，也不足以容纳天下刑徒，最终因此灭亡，秦王就是这样。并不二尺四寸竹简所记载的法律有什么不同，而是秦朝所做的事情违反古代传统而又违背民心。”

## 大论第五十九

本篇题为“大论”，有“总论”之意，双方辩论以礼治国还是以法治国的问题。大夫认为，时世不同，治国方法就要随之而变，不能以虞、夏、商、周的方法来治理当世。文学则认为，民众本性并没有根本改变，变化的是风俗，因此治国要从移风易俗入手，用仁义教化来培养良风善俗，做到防患于未然，这才是治国的根本。辩论到最后，大夫图穷匕首见，将攻击矛头直指儒家祖师孔子，认为孔子具备了强、贪、愚、耻四项恶劣品质。文学则坚决捍卫孔子形象，热烈赞扬孔子拯救乱世的高尚情怀。辩论以双方各执己见而解散。

大夫说：“吟唱干枯的竹简，诵读死人的语句，主管官员不像文学。文学只知道监狱在朝廷之后，但并不知狱中事情，即使是听说一些牢狱事情，也不知如何处理。治理民众，如同木匠砍削，挥动斧斤，符合绳墨就停止。杜周大夫、王温舒中尉等人，将罪人绳之以法，判刑定罪，然后盗寇止息，奸邪禁止。因此射手要根据箭靶射箭，治国者要根据法令。虞、夏运用文治方法，殷、周则以武力夺取政权，时世不同，所用治国方法也就不一样。如今想用敦朴时代的文教，来治理狡诈的民众，这就如同拖延时间去拯救落水者，打躬作揖去救火一样。”

文学说：“文王兴起而民众爱好行善，周幽王、周厉王兴起而民众爱好横暴，这不是民众性格发生变化，而是社会风俗使他们变成这样。因此商、周之所以昌盛，夏桀、殷纣王之所以灭亡，并不是商汤、周武王得到伯夷这样的民众才得到治理，也不是夏桀、殷纣王得到跖、蹻这样的民众才导致大乱，所以治和乱不取决于民众。《论语·颜渊》载孔子说：‘对于断案，我与其他人一样。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才好！’没有诉讼很难做到，有诉讼而去断案是容易的事。不治理根本而从事末端，这就是古代人所说的愚，今天人所说的智。用棰杖荆条来纠正混乱，用法吏刀笔判词来纠正文治，这就是古代人所说的贼，今天人所说的贤。”

大夫说：“现在风俗不是唐尧、虞舜时期的风俗，世上民众也不是许由那样的民众，你们却想废除法律来治民，这就如同不用纠正曲木的工具和斧斤，却想把直的东西弄弯曲、把弯曲的东西弄直一样。因此治国的人不必等待自然善良的民众，制作车轮的工匠不必等待自然弯曲的树木。以前，应少、伯正等人击溃梁、楚官军，昆卢、徐谷等人扰乱齐、赵，关外和关内的暴徒，聚众恃险。在那个时候，不用刑罚，不用武力折服他们，而去设礼节，修文治，这就如同无能的医生，想以短针治疗毒疮，如同孔丘用礼义游说盗跖一样。”

文学说：“糟蹋木材来构建房屋，不算好木匠。残害民众来进行治理，不能算好官。因此鲁班顺应木材所宜，圣人不违背民众天性。所以好木匠少用斧头，好官不用刑罚，政教确立后教化便形成。扁鹊治疗病人经络腠理，断绝致病的邪气，因而毒疮不能形成。圣人在事件未发生之前进行教化，因而动乱根源无由产生。所以治病的砭石收藏起来而不用，法令设置而不用施行。诊断已经明显的病情，处理已经发生的事件，这是平凡的人。治闻未成形的病，看到未发生的事，这是君子。”

大夫说：“文学所称道的圣人和智者，就是孔子。孔子治理鲁国不成功，被齐国驱逐，在卫国得不到任用，在匡地遭到包围，在陈、蔡野地被围困。孔子明知自己不为时人所用，还要游说诸侯，这是固执；知道自己处境困窘而不肯罢休，这是贪婪；不知道自己会被欺骗而前往，这是愚蠢；受到围困之辱而不能死节，这是耻辱。像固执、贪婪、愚蠢、耻辱四者，连平庸的民众也不会去做，何况君子呢！商君是通过景监引荐而见到秦孝公，应侯范雎是通过王稽而得到进用。因此士要靠士的引荐，女子要靠媒人介绍。至于能不能亲近君主飞黄腾达，那就不是媒人或士人的力量了。孔子不是通过他人引荐去进见诸侯，他却自己周游列国，这说明孔子不是贤士才女那样的人啊。”

文学说：“孔子生在乱世，思慕尧、舜之道，东西南北，头顶如火骄阳，足踏泥泞污水，希望诸侯醒悟。天下普遍的情形是，君主昏暗，大夫嫉妒，谁给孔子做介绍人呢？因此丑女嫫母修饰姿容而矜持自夸，美女西施徘徊而无婆家。孔子并不是不知道自身处境困窘而不被诸侯所用，而是伤痛天下乱祸，就像慈母伏在死去的儿子身上一样，他知道不可能有所作为，但他哪里能够停止救世呢？因此他到了齐国，齐景公欺骗他；到了卫国，卫灵公派人围攻他；阳虎批评他，桓魋危害他。欺骗危害圣人的人，是愚蠢困惑；伤害诋毁圣人的人，是疯狂狡诈。狡诈狂惑的人，不是真正的人。他们哪里有什么羞耻感！孟子说：‘观察君主近臣，要看他所接待的人，观察君主的远方之臣，要看他所寄居的主人。’假使圣人伪装欢容曲意迎合，不根据品行选择朋友，那么怎么能成为孔子呢！”

大夫感到失望，内心惭愧，四肢疲乏而不再说话。在那个时候，那些见风使舵、奉承上司的人像编成一排似的，嘴巴张开而合不拢，舌头抬起而放不下，神态黯然，如同怀有重担而被斥责一般。大夫说：“好吧，胶车突然逢雨，请诸位儒生散了吧。”

## 杂论第六十

本篇是《盐铁论》作者桓宽以“客”的名义阐述自己对盐铁会议争辩双方观点的看法。作者首先指出，公卿与文学贤良的学术分歧实质上是义利之辨：文学贤良崇尚仁义，而公卿则致力于权力财利。随后作者对盐铁会议的参加者逐一进行评：他赞美文学贤良高举六经旗帜，探讨天下致太平的根源，文中特别表彰了中山郡儒生刘子雍指斥时政、拨乱反正的风范和九江郡儒生祝先生刺讥公卿、不畏强权的气节。作者肯定御史大夫桑弘羊是博学通才之士，但也严厉地批评他不能坚持仁义准则、不能效法古代圣王以德化民、一味追逐财利的行为，认为这最终会导致他身死族灭的下场。作者不无遗憾地感慨丞相车千秋身为当朝宰相，不能坚持正义，只知明哲保身。至于那些曲意逢上司的一群丞相御史，作者以极其轻蔑的口吻，称他们只是不值得评价的“斗筲之人”。从这篇《杂论》来看，作者桓宽有着鲜明的思想立场，他的学术观点与文中文学贤良完全相同。

客人说：“我看了盐铁官营的争议记录，考察公卿、文学、贤良的辩论，双方思想旨趣完全不同，各有各的理论出处，或者崇尚仁义，或者致力于权力财利。

“我所听到的与此不同。周朝与秦朝就是明显的例子，他们两家都拥有天下而南面称孤，但周秦安危状况与享国长短却完全不同。当初汝南朱子伯曾经对我说过：朝廷召开盐铁会议的时修，豪杰纷纷出席，四方人才荟萃。贤良有茂陵唐先生、文学有鲁国万先生之辈，总共有六十余人，都一齐聚集朝廷，他们推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的风教，讨论天下致太平的根本。智慧的人出谋划策，仁厚的人阐明如何施行，勇敢的人明断是非，善辩的人慷慨陈词。有的儒生发言时正直恭敬，有的儒生说话时温和快乐，虽然不能展现所有儒生风度，但从他们身上已经见出大概了。然而朝政被云雾笼罩，儒生之论最终被废弃而不用，真是可悲啊！朝廷公卿只知道凭借武力可以开疆辟土，而不知道广施仁德可以使远方异族归附；只知道权力财利可以拓展财用，而不知道勤于耕种可以富国。如果邻国亲近归附，远方异族喜欢仁德，那么做什么不能成功，追求什么而得不到呢？可惜的是公卿执政不是按照这个思路，而是致力于聚集财富，炫耀军威，这样做岂不是荒谬吗？

“中山郡儒生刘子雍宣讲王道，矫正当世弊政，以期复归正途，务求回到王道根本。他说话正直而不蹈袭前人，切实而不空泛，文质彬彬，可以说是一位广博君子。九江郡祝先生发扬子路的精神，继承史鱼的气节，抒发愤懑之情，刺讥公卿之弊，耿直而不屈服，可以说是不畏强权。桑弘羊大夫凭借当朝执政地位，迎合时势变化，推行法家道术，崇尚权力财利，开辟小辩之术，虽然不是王道正确方法，但他让那些大儒博学之士面带惭色，不能自我解免于窘境，他可以说是一个博学通才之士。不过他居于卿相之位，不能援引正确的准则，以王道教化下民，依从末利，不能效法上古。《周易·离卦》九四爻辞说：‘向上焚烧，弃之于道。’桑大夫如同九四爻一样，处于为众所弃的危险地位，其行为不合正道，最终丧失了自己的性命，殃及他的宗族。车千秋丞相居于周公、吕望的地位，像车轴一样处于朝廷的核心，可是他却闭口不说，保全自身而离去，那个人啊！那个人啊！至于那一群丞相御史，他们不能通过发表正确议论来辅佐宰相，只是成全同侪官员，助长同行之人，曲意苟合，以此讨好上级，这些见识狭小的人，这些阿谀逢迎之徒，哪里能把他们算数呢！”